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



荣新江/著

名家专题精讲

/汉唐中西关系史——对新旧史料的一个概观
/《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及其旨趣
/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
/敦煌学：二十一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
/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

荣新江/著

名家专题精讲

/汉唐中西关系史——对新旧史料的一个概观

/《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及其旨趣

/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

/敦煌学：二十一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

/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荣新江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
(名家专题精讲)
ISBN 7-309-04581-5

Ⅰ.中…　Ⅱ.荣…　Ⅲ.中国-古代史-研究　Ⅳ.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2655 号

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
荣新江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浙江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9.25　　插页　2
字　　数　238 千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6 000

书　　号　ISBN 7-309-04581-5/K·158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录作者有关中外关系史、西域史、隋唐史与敦煌学四个方面的论文和书评十五篇，主要是对以上四个领域学术史的分析以及研究展望。这些论文和书评的主旨，是作者对中古史研究领域中上述四个方面的成就的肯定和不足的批评，并指出今后的研究取向。

名家专题精讲系列

第一辑
◎《中国经学史十讲》 朱维铮/著
◎《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 陈允吉/著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 李欧梵/著
◎《域外中国学十论》 葛兆光/著
◎《中国大学十讲》 陈平原/著
◎《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 陈思和/著

第二辑
◎《科学史十论》 席泽宗/著
◎《中国古代文明十讲》 李学勤/著
◎《传统十论》 秦　晖/著
◎《近代中国史学十论》 罗志田/著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许纪霖/著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 王德威/著

第三辑
◎《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十论》 谢稚柳/著
◎《中国古代典籍十讲》 胡道静/著
◎《当代文艺问题十讲》 钱谷融/著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 乐黛云/著
◎《中国古代建筑十论》 傅熹年/著
◎《法兰西文学大师十论》 柳鸣九/著

第四辑
◎《中古文论要义十讲》 王运熙/著
◎《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 裘锡圭/著
◎《元明清绘画研究十论》 徐建融/著
◎《德国哲学十论》 张汝伦/著
◎《社会天文学史十讲》 黄一农/著
◎《晚明清初思想十论》 王汎森/著

第五辑
◎《先秦史十讲》 杨　宽/著
◎《现代汉语语法十讲》 张　斌/著
◎《欧美文学研究十论》 方　平/著
◎《莎士比亚研究十讲》 陆谷孙/著
◎《中西文化研究十论》 张隆溪/著
◎《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 荣新江/著

装帧设计 孙　曙

序　言

承蒙复旦大学出版社陈麦青先生的好意，让我编一本论文集，给复旦的“十论”或“十讲”丛书。我答应下来，但很晚才交出稿子。原因是我每编一本论文集，除非十分必要，一般不想重复收录已出版的专著或论集中已收入的篇章。这样一来，我很难像前面已刊的诸位名家那样，把所论的题目，集中在一个方面。因为我平日治学，颇为庞杂，涉及中外关系史、西域史、隋唐史、敦煌学等方面。于是转念一想，不妨把自己这些年来有关这几方面的文字，各选一二，汇集成书。结果一看，所得篇章主要是关于这几个方面研究史的述评和展望，这些文章有长有短，长的数万言，短的二三千字；而且有的重在“论”，有的重在“讲”，不过总是有一些议论之处。这些文章的主体内容涉及我所主要从事的中古史研究领域，也有的上溯两汉，下迄民国，但也都是以中古史研究为出发点的，因此姑名曰“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

本书收录的文章按照内容分成中外关系史、西域史、隋唐史、敦煌学四组（目录以空行区别之），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写作的一些背景和目的，以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章的内容。

1. 中外关系史

我现在主要研究的对象是中外关系史，这个领域虽

然是近年来才重点去做，但我对中外关系史的兴趣确实很早就有。记得上大学后写的第一篇习作就是印度天文星占对唐朝的影响问题。我现在的主要研究时段是汉代到五代宋初，其实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一段，尤以唐代为主。从内容上来讲，我选择伊朗民族和文化进入中国后的情形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特别是在中古中国社会上异常活跃的粟特人，有许多问题值得仔细分析。这方面我已经出版了《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 2001 年版)，有关粟特的专题研究论集也正在准备当中。

在收入本书的三篇文章中，《20 世纪的唐代中西关系史研究》一文，主要是想清理以唐朝为主的中西关系史的学术史，虽然因为要符合收载该文的《20 世纪唐研究》一书的体例，用了不少文字全面介绍研究史，但在叙述中还是有轻有重，并对这方面的研究做了展望。其实，中外关系史研究限于交流的障碍，有不少争论的问题应当做出严肃的学术史回顾，此即第二篇《海路还是陆路——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和流行区域研究述评》一文的意图，它是对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的一些论述的批评，希望把这项研究导入正轨。而作为本书首篇的文章《汉唐中西关系史——对新旧史料的一个概观》，则主要是根据新史料对汉唐中西关系史研究的一个展望，也是我自己对这个领域中的某些问题所做的研究趋向性的思考。

2. 西域史

我对西域史的研究过去比较集中在于阗史上，虽然也曾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讨论过西域史上的若干问题，但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展开。《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

是应《历史研究》之约，给 20 世纪西域史研究做的全面回顾，内容包括从先秦到明清。但是，严格来说此文应当叫做“中国的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因为有很多更为重要的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在这个回顾当中。从中国学术的立脚点出发所做的展望，文字虽短，可能更有意义。

西域史研究近年来在中国有衰微的迹象，从我本人来讲，希望在《于阗史丛考》（与张广达先生合著，上海书店 1993 年版）之后，继续唐代西域史的探讨。

3. 隋唐史

因为自己的兴趣多年来为敦煌学、西域史、中外关系史所吸引，所以对于隋唐史的研究是很有限的。但是，自 1995 年以来，我一直尽心尽力地主编大型学术专刊《唐研究》，迄今已出版十卷。通过这个刊物，我觉得对于唐代历史、文学、宗教、考古等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有所推动。我自己对于《唐研究》学术使命和学术成绩的说明，就是收入本书的《〈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及其旨趣》和《〈唐研究〉十周年纪念专号献词》两篇文章，其中后者也有我对《唐研究》的一些展望。

至于我本人的隋唐史研究，主要希望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隋唐长安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这个方面我所主持的长安读书班已经进行了多年，但我除了《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外，只写过几篇小文章，我对长安社会变迁和物质与精神文化的解说还没有真正动笔。另一个关心的方面是唐代宗教史。本书收入的《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新问题与新探索》一文，是我主编的《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年版）一书的前言，

有些就事论事，但其中也有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4. 敦煌学

迄今为止，我在敦煌学的汪洋大海里浸泡的时间最长，对于敦煌文献、敦煌历史、敦煌写本学、敦煌艺术、敦煌学史、敦煌探险史等等都有浓厚的兴趣，并发表过多少不等的论著。我目前对于敦煌学的关心，一是敦煌学的发展，表现在《敦煌学：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和《敦煌文献：新材料与新问题》两文中，它们都是在世纪之交时写的展望敦煌学未来发展趋势的文字。二是敦煌学的学术史，这方面已经发表过若干文章，而收入本书的《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是我对贯串整个敦煌研究的核心问题的论述。三是学术性书评。写严肃的书评是我治学的一个努力方向，所以我一直坚持写书评，特别是我现在不太专门做敦煌的研究，但对敦煌学各个方面的研究进展仍然非常关心，所以就用写书评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尤其是从方法和学术史上提出一些建议。我已经出版的《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与方法论的探讨》（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版）、《敦煌学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都收录了我历年所写的敦煌学书评。本书收入的四篇书评，是这两年所写的，比较偏重在探险史和敦煌文献辨伪问题上。

最后，感谢我的研究生王媛媛、朱立峰、李丹婕三位同学帮我整理文稿，校对文字。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陈麦青、宋文涛两位先生为拙稿付出的辛勤劳动。

2005年6月23日

目 录

序言 1

1 汉唐中西关系史——对新旧史料的一个概观 1

2 陆路还是海路？——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与流行区域研究述评 15

3 20世纪的唐代中西关系史研究 45

4 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21

5 《唐研究》与唐研究 163
《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及其旨趣 164
《唐研究》十周年纪念专号献词 173

6 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 181

7 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新问题与新探索（《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导言） 195

8 二十一世纪的敦煌学 213
敦煌学:二十一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 214
敦煌文献:新材料与新问题 222

9 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 227

10 敦煌学书评四则 255
《曼涅尔海姆在中亚(1906—1908)》评介 256
《〈泰晤士报〉上的斯坦因》评介 264
《英国所藏斯坦因收集品手册》与《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目录》评介 270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评介 279

汉唐中西关系史

——对新旧史料的一个概观

一

从汉朝到唐朝，是中国与西方各国交往的最盛时期。在此期间，中国接受了许多西方文明要素，大到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思想，小到音乐舞蹈、穿戴服用，它们在许多层面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也向西方世界提供了丝绸、纸张及其制作技术等等，为西方各国物质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汉唐中西关系是一个涉及中西史学两方面的重要课题，相对于中国断代史和某些专题史来讲，它的研究难度较大，其中，史料的零散是阻碍研究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汉唐中西关系是一个涉及中西史学两方面的重要课题，相对于中国断代史和某些专题史来讲，它的研究难度较大，其中，史料的零散是阻碍研究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1930 年，张星烺先生编撰《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计六册，把传世的中国史籍和部分外国史籍中的有关记载辑录出来，并加以注释和考证，成为迄今为止这一领域最好的史料合集[①]。周一良先生在《〈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序》中对此书给予很高评价："我国学者中，筚路蓝缕开创中西关系史（不包括近代外交史）研究者当推张星烺先生。张先生创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煌煌六卷巨著，参考西贤成果，辅以新知，举凡交通路线、人物往来、物产传播等等，无不囊括。虽名为交通，实即文化交流之内容。"[②]我非常赞同周先生的话，虽然今天许多人在其论著中常常不提张先生的书，但我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 册，辅仁大学，1930 年；张星烺编，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 册，中华书局，1978 年。

② 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年，1 页；收入《周一良集》第 4 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586 页。

相信,这些研究著作必然是以张先生的大著作为起点的。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陆续公布了大批新的文献材料,如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也新发现了许多石刻类史料。同时,20世纪初出土的大批迁居中国的胡人留下的胡语文献,如粟特文、中古波斯文、梵文、叙利亚文文书和典籍,陆续翻译成现代西方文字。此外还有日新月异的考古文物资料在不断出土,不断刊布。这些材料更加分散,研究的难度也更大。但是,“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这是陈寅恪先生号召大家利用敦煌发现的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的名言,发表的时间也正好是在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的同一年[①]。新史料对于汉唐中西关系史来讲,意义更加突出。新材料不仅可以补写历史,而且能够提出新问题,使研究者开拓出更多新的领域。多年来,许多研究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发掘、整理出了丰富多彩的中西关系史料,使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汉唐中西关系史,已经远远地超过了1930年时所知道的状况。

新史料对于汉唐中西关系史来讲,意义更加突出。新材料不仅可以补写历史,而且能够提出新问题,使研究者开拓出更多新的领域。

二

尽管我们对新史料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积累及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是零散地、陆续不断地刊布出来的。而且,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学术领域(如

①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册,1930年;此据《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266页。

敦煌学)来说比较薄弱,迄今为止也没有一本可以依赖的“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目录”,来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先行研究的指南,使得不少研究成果不够充实,顾此失彼,甚至重复劳动。虽然有些新材料在发现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但事过境迁,有些慢慢地被人们遗忘。有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在专业领域里受到很高的评价,但却很少转化成史学界、乃至中外关系史学界的通识,因此在中国通史或中外关系史的通论性著作中,往往总是老调重弹,而没能把这些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

在中国通史或中外关系史的通论性著作中,往往总是老调重弹,而没能把这些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

在告别 20 世纪、跨进 21 世纪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新史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做出总结。我和我的研究生们正在编辑《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目录》,希望能给学界提供一份有用的参考。在此,我仅就有关新史料做一些概要的介绍。所谓“新史料”,我的一个主要的参照物,就是张星烺《汇编》未收的史料,我曾编过一个“《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引用书目”,把它作为一个判断新史料的参照。

新史料主要来自出土文献,以下分别加以论述,间或提到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但本文不是对这些成果的全面总结,文中仅就各类资料的研究前景提出一些展望。

1. 简牍帛书

近年来,新疆、甘肃的汉晋时期的遗址和长江中下游沿线的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简牍和帛书材料,如尼雅出土的汉文和佉卢文文书,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江苏等地出土的秦汉简帛,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等等,都多少不等地包含了一些珍贵的中外关系史

料。有些材料还在继续整理当中,有的则已经陆续发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悬泉汉简中的西域史料,大大丰富了前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悬泉的发掘简报已经发表①,但全部简牍的图版和释文尚未刊布。胡平生、张德芳编著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一书,发表了部分重要的有关汉朝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史料②。张德芳、王子今、殷晴等先生已经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做过探讨③。最近,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又利用悬泉汉简贡献给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④。相信随着这批汉简的全面公布,将会引起更多的讨论,取得更新的研究结果。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悬泉汉简中的西域史料,大大丰富了前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

继20世纪初楼兰、尼雅发现佉卢文资料之后,近年中日尼雅考古队发现的佉卢文简牍数量不少,但目前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我们期望其中会有不少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材料。尼雅新发现的汉文简牍不多,但1930—

---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4—20页。参看吴礽骧《敦煌悬泉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98—106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文物》2000年第5期,21—26页;又《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27—45页。

②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3—174页。

③ 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91—95页;王子今《〈长罗侯费用簿〉应为〈过长罗侯费用簿〉》,《文物》2001年第6期,76—77页;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10—17页。

④ 提交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11月15—16日。

1931年斯坦因在尼雅发现而没有带走的汉文木简，最近在英国图书馆找到了它们的照片①。林梅村先生发表《尼雅汉简中有关西汉与大月氏关系的重要史料》，揭示了其中保留的一些重要史事②。

江淮地区近年来发现了大量的简帛资料，其中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材料不多，但有些零散资料对于理解早期中国与南海的交通，颇有帮助，如饶宗颐先生最近揭示的王家台秦简《归藏》所提到的"周穆王卜出师而枚占"，尹湾汉墓简牍中的"象林候长"，均值得重视③。数量更多的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因为主体部分尚未发表，因此还不清楚到底能够提供给我们研究中西关系史多少有用的新资料。

目前，简帛研究蔚为大观。我们应当从纷纭复杂的研究文献里，辑录有关中西关系的史料，在文字专家解读的基础上，加以历史学的研究。

简帛材料十分难得，总体来讲数量不多，但价值很大。目前，简帛研究蔚为大观。我们应当从纷纭复杂的研究文献里，辑录有关中西关系的史料，在文字专家解读的基础上，加以历史学的研究。在这方面，还应留意流散海外的汉晋简牍的收集和整理，因为有不少资料尚无清晰的图版发表。

2. 敦煌吐鲁番文书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包含着大量的新史料，但由于大

---

①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50—290页；Wang Jiqing, "Photograph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of Documents and Manuscripts from Sir Aurel Stein's Fourt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24.1, Spring 1998, pp. 23-74；后者包括清晰的图版。

② 原载《九州》第1辑，中国环境出版社，1997年；收入作者《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256—264页。

③ 饶宗颐《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华学》第5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2—3页。

部分有价值的文书在20世纪初就流散国外,给全面利用这批文书资料造成极大困难。由于各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一些重要的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已经整理出版,如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沙州图经》、三种摩尼教残经、两种景教文献和敦煌文书《唐天宝十载敦煌县差科簿》,早已是中外关系史学界经常引用的资料。吐鲁番、库车、焉耆发现的梵文、吐火罗文佛典和伊朗语、突厥语摩尼教残卷,也是西方学者迄今为止热衷的研究课题。近二十年来,由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学者有机会到海外调查,而通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首的几家出版社的努力,近百分之九十的海外所藏敦煌文书资料已经用清晰的图版印成大型图录[①],极大地便利了我们的全面整理和研究工作。

通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首的几家出版社的努力,近百分之九十的海外所藏敦煌文书资料已经用清晰的图版印成大型图录,极大地便利了我们的全面整理和研究工作。

由于资料的全面公布,我们可以系统地收集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资料,特别是散见于敦煌寺院账目中的资料。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英国图书馆等编《英藏敦煌文献》,1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敦煌文献》,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立图书馆合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合编《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艺术博物馆合编《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98年;上海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史树青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11—12卷,东京柳原书店,1994年;同书编委会《甘肃藏敦煌文献》,6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在这方面，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为我们检索文献提供了方便[1]，但因为他们所依据的缩微胶卷和《敦煌宝藏》的图版不够清晰，有些文字仍需再斟酌，而《俄藏敦煌文献》的资料在当时根本见不到，因此大多数未予收录。吐鲁番文书的情形与敦煌文书类同。其中1959—1975年间新发现的汉文文书，已经由唐长孺先生为首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整理出版，而且新刊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图文兼备，极便学者对照使用。

《历代法宝记》中，就有一段十分珍贵的有关摩尼教和景教的记录，大概因为《历代法宝记》是一部剑南道禅宗和尚编纂的灯史，因此未能引起中西关系史研究者的注意。实则这条材料对于已经几乎穷尽的汉文摩尼教和景教史料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

姜伯勤先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一书，依据专题钩稽了大量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资料，并给予精辟的解说[2]。但敦煌吐鲁番文书数量庞大，其中仍然有许多重要的史料值得研究者发掘利用，如早在1928年就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全文公布的《历代法宝记》中，就有一段十分珍贵的有关摩尼教和景教的记录，大概因为《历代法宝记》是一部剑南道禅宗和尚编纂的灯史，因此未能引起中西关系史研究者的注意，实则这条材料对于已经几乎穷尽的汉文摩尼教和景教史料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3]。像这样的材料，我想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不断地被发现，一些旧有的资料也会获得

---

① 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年。

②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③ 参看荣新江《〈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与弥施诃——吐蕃文献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来历》，王尧编《藏学研究丛刊·贤者新宴》，北京出版社，1999年，130—150页；收入拙作《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343—368页。

新的解释。

3. 石刻碑志和题记

中国各地保存有大量石刻史料，主要有石碑、墓志和造像题记三大类。近年来，出版了大量石刻史料的合集，包括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千唐志斋等处所藏碑志的拓片，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出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墓志的照片，其中许多是首次发表的新材料①。这些石刻材料中包含有较多的外国来华人士和外来宗教的内容，我曾经检索收集过其中粟特人的墓志，迄今已经有上百方之多。近年有关入华粟特人研究的进步，部分就是因为利用了粟特人墓志。在这类墓志本身的整理工作方面，罗丰先生的《固原南郊隋唐中亚史

这些石刻材料中包含有较多的外国来华人士和外来宗教的内容，我曾经检索收集过其中粟特人的墓志，迄今已经有上百方之多。

① 其中图录有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上下，文物出版社，1984 年；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 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 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总编辑委员会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30 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 年；录文集有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吴钢编《全唐文补遗》，7 辑，三秦出版社，1994—2000 年；图文对照本有毛汉光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8 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1994 年；昭陵博物馆(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 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等《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贰、陕西壹贰、重庆壹)，文物出版社，1994 年、2000 年、2002 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 年；王锦厚等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墓志精粹》，文物出版社、日本中教出版社，2000 年；史树青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 10 卷《墓志拓片》，日本柳原书店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年。

波斯人李素的墓志，不仅提供了一个曾任唐朝太史令的重要人物的事迹，而且也牵涉到希腊、波斯星占学的传入中国和景教传播的问题，对石刻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将会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史料革命。

氏墓志考释》，可以说是一个典范①。这些石刻资料里面，有时包含有极其重要的有关中外关系的新信息，比如波斯人李素的墓志，不仅提供了一个曾任唐朝太史令的重要人物的事迹，而且也牵涉到希腊、波斯星占学的传入中国和景教传播的问题②。由于仍有不少石刻材料尚未出版，我们相信，对石刻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将会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史料革命。

4. 胡语文献

在敦煌吐鲁番乃至中原地区，都多少不等地出土过来华外国人所留下的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西方考古学者攫取到手，带回西方。经过各国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近一个世纪的解读研究，已有相当一批文献被译成现代英、法、德文，其中有许多极其珍贵的中西文化交往史料；如敦煌长城烽燧下面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③、吐鲁番出土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序》④，许多都还没有完整

---

① 原载《大陆杂志》第 90 卷第 5 期，1995 年，13—33 页；第 6 期，17—38 页。又见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 年。

② 参看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原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 2 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82—90 页；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38—257 页。

③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SOAS*, Ⅻ, 1948, pp. 601-615; J. Harmatta, "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1979, pp. 153-165.

④ F. W. K. Müller,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aischen Hymnenbuch* (*Mahrnamag*), Berlin 1913, pp. 3-40. H.-J. 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93.

的或令人满意的汉文译本。中国考古工作者发掘所得也有一些重要的资料,如黄文弼得自吐鲁番的《高昌回鹘摩尼教寺院文书》[①]、新疆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墓地发现的《粟特文奴隶买卖契约》[②]、西安出土的汉语与婆罗钵语的《苏谅妻马氏墓志》[③]等,也异常珍贵。这类文献的语言属于古代死语言,要准确译出,需要做大量的对证和考释工作。近年来随着这些语言研究的进步和相关的对比材料的增加,对这些胡语文献的解读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比

近年来随着这些语言研究的进步和相关的对比材料的增加,对这些胡语文献的解读有了相当大的进步。

① 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497—516页;又《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529—548页。

② 吉田丰、森安孝夫、新疆博物馆《麴氏高昌国时代ソグド文女奴隶卖买文书》,《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Ⅳ,1988年,1—50页+图版一;汉译文载《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108—115页;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49—54页;收入作者《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68—79页。

③ 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年第9期,458—461页;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195—202页;W. Sundermann & Th. Thilo, "Zur mittelpersisch-chinesischen Grabinschrift aus Xi'a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11. 3, 1966, pp. 437-450; J. Harmatta, "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asanian Relation", *La Persia nel medioevo*, Roma 1971, pp. 363-376; H. Humbach and Wang Shiping, "Die Pahlavi-chinesische bilingue von Xi'an", *Acta Iranica* 28, 1988, pp. 73-82;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295—305页;林梅村《唐长安城所出汉文——婆罗钵文双语墓志跋》,《西域文明》,251—258页;张广达《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国学研究》第10卷,2002年,1—22页。

尽管把这些胡语文献译成汉语难度很大，但价值也大。我们希望中国学者能克服困难，把这批胡语资料系统全面地译出，使之成为中国历史文献的一部分。

如粟特文古信札，使我们有了更为可靠的英文译本①。这些胡语文书，从内容或者词汇上有不少与汉语文书相关，马小鹤先生关于东西方摩尼教词汇的对比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工作的样板②。尽管把这些胡语文献译成汉语难度很大，但价值也大。我们希望中国学者能克服困难，把这批胡语资料系统全面地译出，使之成为中国历史文献

① N. Sims-Williams, "Sogdian Ancient Letter Ⅱ", *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 eds. A. L. Juliano & J. A. Lerner,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with The Asia Society, 2001, pp. 47-49;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Ⅱ",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ember* 2001, hrsg. von Maria Gabriela Schmidt und Walter Bisang unter Mitarbeit von Marion Grein und Bernhard Hiegl,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 2001, pp. 267-280. 此前，中国学者主要利用J. Harmatta 的翻译，见上引"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可喜的是，过去我们无法利用的第五号古信札，最近也已翻译发表，见 F. Grenet, N. Sims-Williams and E. de la Vaissière,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Ⅴ",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12, 1998, pp. 91-104.

② 比如，马小鹤《摩尼教宗教符号"妙衣"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59辑，1999年，153—185页；又《摩尼光佛考》，《史林》1999年第1期，11—15、82页；又《摩尼教佛教符号"大法药"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145—163页；《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中的"大医王"研究》，《欧亚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243—258页；又《摩尼教宗教符号"明珠"研究——帕提亚文 mwrg'ryd(珍珠)考》，《学术集林》卷17，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290—301页；又《摩尼教宗教符号"珍宝"研究——梵文 ratna、帕提亚文 rdn、粟特文 rtn、回纥文 ertini 考》，《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53—60页；又《摩尼教的"光耀柱"和"卢舍那身"》，《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2000年，104—113页。

的一部分。

5. 传统古籍

如果对比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所利用的书籍,还有一些传世的史籍不知何故为《汇编》所漏收。如《水经注》,其中包含大量中印关系史的珍贵文献,也保留了不少求法僧的记录,大概因为当时无善本可依,因此《汇编》全未采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较好的《水经注》的整理本①,可以对照伯戴克(L. Petech)对有关部分的译注②,加以重新钩稽和整理。此外,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传世古籍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材料,如新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影印古籍中,因为发表了一些过去没有公布的文献资料,所以可以从中辑出一些相关的内容。而有些《汇编》已收录的书中,亦可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发掘出新的史料。

6. 文物考古材料

与出土石刻资料相似的是新出土的文物材料,最近五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材料,包括罗马、波斯与粟特系统的文物,如罗马金币、萨珊银币、罗马和伊斯兰玻璃器、波斯与粟特锦,以及表现宗教人物、神祇、胡人及外来文化的塑像和壁画,亟待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全面的研究。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按发现的地点做过概要的

罗马金币、萨珊银币、罗马和伊斯兰玻璃器、波斯与粟特锦,以及表现宗教人物、神祇、胡人及外来文化的塑像和壁画,亟待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全面的研究。

① 其中以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最为详尽,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

② L. Petech, *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 Roma 1950.

总结①。最近，姜伯勤《中国祆教画像石的“语境”》、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出土胡商文书》、齐东方《丝绸之路与伊斯兰玻璃》、罗丰《中国境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等文对相关专题做了透彻的研究②。我想，今后通过学者们对大量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所进行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可以大大补充文献材料之不足，而且文物材料的形象性，可以和文献材料相互补充，互相印证。

今后通过学者们对大量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所进行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可以大大补充文献材料之不足，而且文物材料的形象性，可以和文献材料相互补充，互相印证。

三

近年来，我的一项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收集整理上述这些文献材料（也包括考古文物资料），并加以考释研究。《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一书收录的一些文章，就是该项工作的部分成果。我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把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以来所发现的新材料汇为一编，把零散的史料系统全面地展现出来，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方便；也希望在收集整理和研究的这一过程中，揭示出一些汉唐中西关系史上不为人知的史实，并根据新的材料，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以此来丰富我们对汉唐间中西文化交往史的认识。

（原载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 年 1 月）

---

① 《燕京学报》新一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291—344 页。

② 以上均为提交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 年 11 月 15—16 日。

陆路还是海路？

——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与流行区域研究述评

一、争论的缘起

在古代中国与外界的交往史上,印度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历时最长,范围最广,而且无间断地延续下来。佛教在中国的成功传播,远非中古时期陆续入华的“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所可比,甚至本土宗教道教也难望其项背。因而,佛教如何传入中国,如何在中国社会逐渐站稳脚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处理中外关系史上一些问题时一开始就要给予回答的问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事关早期传播史的重要问题,由于史料记载语焉不详,所以异说纷呈,且不同观点之间分歧很大。本文主要讨论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和早期流传区域的问题,目的不在于说明已经有了足够的材料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利用足够的论据,把这一问题的讨论矫正到更合乎逻辑的思路中来。这样就要本着学术争鸣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对一些偏离正道的说法予以批判。

本文主要讨论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和早期流传区域的问题,目的不在于说明已经有了足够的材料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利用足够的论据,把这一问题的讨论矫正到更合乎逻辑的思路中来。

关于佛教的传入途径问题,主要的说法可以梁启超和汤用彤为代表。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主张海路输入说,他说:“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之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①]伯希和(P. Pelliot)也抱有相似的观点[②]。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则主张陆路输入

① 《佛学研究十八篇》,《饮冰室专集》卷五二。

② 伯希和撰,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华书局,1955 年。

说，他说："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似无可疑。"他从汉代佛教的地理分布出发，厘清前后的关系，反驳了梁、伯二氏的说法①。汤氏的结论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为学界遵循的定论。

关于早期（汉代）佛教流行的区域问题，汤用彤上引书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根据文献记载，论述了从伊存授经、楚王英为浮屠斋戒祭祀、桓帝并祭浮屠老子，到安世高与支谶洛阳译经、笮融事佛、牟子作《理惑论》等事，指出"东汉洛阳为首都，西通西域，遂为佛教重镇"。而后来又独盛于齐楚以及江淮之间，原因是这一带方术盛行，佛教初来，也被视作一种道术。而楚王英、笮融、襄楷所在地域，与道教发源地不远，因此黄老道教和黄老之术与佛教同行于一个区域②。

迄今为止，在文献方面还没有超出汤用彤先生所论范围的资料被发现。然而，可喜的是 1980 年以来，中国学术开始复苏，考古资料也不断被发现，视野不断扩大。一批佛教图像资料备受学界特别是考古和美术史界的学者瞩目，一些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把佛教早期传播的范围，扩大到今四川和更靠近江苏沿海的地域。与此同时，在这些考古新发现的推动下，佛教海上传入说又开始重被提起，而且大有取代陆路说并成为定论的倾向。而这种说法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说文献中的

迄今为止，在文献方面还没有超出汤用彤先生所论范围的资料被发现。一批佛教图像资料备受学界特别是考古和美术史界的学者瞩目，一些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把佛教早期传播的范围，扩大到今四川和更靠近江苏沿海的地域。

①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1938 年初版，此据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57—61 页。

② 同上书，34—61 页。

佛法流布区域，特别强调沿海地区的情况，甚至否定洛阳的核心地位。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其间已历二十余年，这使得我们非常有必要回顾一下考古学界揭示的新材料，以及相关的讨论，或许可以去伪存真，找寻出这些材料所能说明的问题，也可以判断它们的局限性。

二、考古资料所见的汉代佛教图像

近二十年来有关早期佛教研究主要的进步在于考古方面，但有些问题也出在这里。

近二十年来有关早期佛教研究主要的进步在于考古方面，但有些问题也出在这里。所以，我们先把相关的有代表性的论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并把各家的不同观点也揭示出来，最后再谈我们的认识。这些主要的论文如下：

1980年，俞伟超先生发表《东汉佛教图像考》，考释、归纳了一系列早期佛教图像材料：

(1)内蒙古和林格尔小板申M1前室顶部南壁，绘有白象上骑着身穿红衣的佛或菩萨像，有墨书榜题"仙人骑白象"；北壁绘有一盘状物内放四个圆球形物品，有榜题"猞猁"(即舍利)。整个墓室顶部象征天空，东壁绘青龙和东王公，西壁绘白虎和西王母，南壁绘朱爵(雀)和仙人骑白象及凤凰从九韶，北壁绘玄武和舍利及麒麟、雨师。仙人骑白象、舍利与东王公、西王母等道教图像相对应，则是作为一种神仙来供奉的。此墓年代在东汉桓、灵时期。(2)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室的八角擎天柱的四个正面上，东面和西面的顶端刻东王公和西王母，南面和北面的顶端是带项光的立像，《考古报告》以为是童子像，但受

到佛教艺术形式的影响[①]。作者从项光、腰带垂流苏、衣裙作垂幛状以及与东王公、西王母的位置上考虑,认为是佛像。还对比其他东汉画像石墓,认为墓葬的年代在东汉桓帝前后,而不是有些学者认为的魏晋时期。(3)河南滕县出土的一块东汉画像石残块上,有两个六牙象的图像,表现的显然是佛教传说,年代属于东汉晚期。(4)四川乐山城郊麻濠东汉崖墓,中间后室的门额上,有用浅浮雕的技法刻出的一尊坐佛像,头带项光,结跏趺坐,手做施无畏印。乐山柿子湾东汉崖墓的两个后室门额上,也都刻一尊带项光的坐佛像。(5)四川彭山东汉崖墓出土一陶座,系摇钱树之座,底部是双龙衔璧图像,身部中间是结跏趺坐佛像,有高肉髻,手作施无畏印,两旁为大势至和观音菩萨,年代为东汉后期。(6)新疆尼雅遗址一座夫妇合葬墓中,发现两块白地蓝色腊缬棉布,一块上有半身菩萨像,年代是东汉末年。其结论是最迟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从新疆到山东,从内蒙到四川,佛教图像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传布。佛教信仰与早期道教、神仙思想乃至传统的地方崇拜杂糅在一起,并处于附属地位。最初传入的佛教是小乘佛教,佛教艺术带有外来风格,也与本土传统艺术混合[②]。

最迟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从新疆到山东,从内蒙到四川,佛教图像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传布。佛教信仰与早期道教、神仙思想乃至传统的地方崇拜杂糅在一起,并处于附属地位。

1980年,史树青先生访问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指出其石刻中的佛像,引起有关孔望山佛教造像的讨论。

① 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65、66页。

② 《文物》1980年第5期,68—77页。修订本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330—352页。

1981 年第 7 期《文物》发表连云港博物馆的《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介绍了摩崖上的佛像,并初步判定为东汉晚期之作①。同期所刊俞伟超、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一文,认为孔望山摩崖造像是东汉桓、灵之时道教寺院——“东海庙”祭坛上供奉的神像,有道有佛,是其时佛教依附道教的反映②。又阎文儒《孔望山佛教造像的题材》,考释了其中的涅槃像、舍身饲虎图、佛像、力士像等③。李洪甫《孔望山佛教造像的内容及其背景》④、阎文儒《再论孔望山佛教造像的题材》⑤、步连生《孔望山东汉摩崖佛教造像初辨》⑥、李洪甫《孔望山造像中部分题材的考订》⑦等文章,皆认定孔望山摩崖造像是东汉的佛教造像。由于孔望山地处东海之滨,因此一些研究者把这里的佛教遗迹和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⑧。1986 年,

只有宣传佛教教义、在佛教仪式或习惯做法上使用的物品,才是佛教艺术品。

巫鸿(Wu Hung)发表《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公元 2 至 3 世纪)》,对应国内 80 年代初以来关于东汉佛教图像的讨论,认为要确定哪些是严格意义上的“佛教艺术品”。他认为只有宣传佛教教义、在佛教仪式或习惯做

① 《文物》1981 年第 7 期,1—7 页。
② 同上书,8—15 页。
③ 同上书,16—19 页。
④ 《法音》1981 年第 4 期,2—5 页。
⑤ 《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4 期,111—114 页。
⑥ 《文物》1982 年第 9 期,61—65 页。
⑦ 同上书,66—70 页。
⑧ 贾峨《说汉唐间百戏中的“象舞”——兼谈“象舞”与佛教“行像”活动及海上丝路的关系》,《文物》1982 年第 9 期,53—60 页。

法上使用的物品，才是佛教艺术品，而仅仅靠形式上相似或相同是不能决定其内涵的，应当注意艺术品的功能，其产生所处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他觉得现在研究者主要关注于比定这些作品和印度佛教图像的相同点，但更重要的是要关注这些作品的混同处和歧异处，这样可以一方面找出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另一方面了解汉代普通民众对佛教的理解。

巫鸿从这一看法出发，先讨论了属于东汉的资料。关于麻濠摩崖佛像，他提出为什么埋在俗人的墓里，他以为这个神像不再是公共场合的被供奉者，而是死者希求死后保持不朽的象征了。之后依次讨论了沂南、和林格尔等材料，结论是：在汉代普通人的心目中，佛是可以不朽的胡神，可以飞行，可以保佑人，因此，佛也和其他中国仙人如西王母一样，被纳入汉代流行的神仙信仰中，并镶入中国传统的丧葬仪式中，佛也进入各种不同的地方祭祀，成为人们供奉的对象。佛教故事和佛教象征物作为神仙和动物的征兆，被纳入祥瑞思想中。由于这些不同祭祀的非系统性，佛教艺术的主题也是片段地使用和吸收，成为一些孤立的图像和符号。因此，尽管这些因素来自印度佛教艺术，但它们没有佛教的内涵，也不具备佛教的宗教功能，只是作为丰富中国本土信仰和传统思想的表现形式。它们只是汉代通俗艺术所随意吸收的佛教因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教艺术。他还详细讨论了孙吴到西晋时期的佛教艺术品，如铜镜和魂瓶。关于孔望山，他认为总体上说是道教的，尽管有佛教的因素，佛像和其他中国传统仙人像都是道教万神殿的组成部分，这

尽管这些因素来自印度佛教艺术，但它们没有佛教的内涵，也不具备佛教的宗教功能，只是作为丰富中国本土信仰和传统思想的表现形式。它们只是汉代通俗艺术所随意吸收的佛教因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教艺术。

里只能说是最早的道教艺术的代表作①。

1991年,吴焯出版《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一书,其第四章《丝路交通与佛法东渐》,结合考古新发现讨论佛教传入中国问题。第一节讨论由于孔望山佛教造像而引起的海上传播的问题。作者考察了史籍关于汉代与印度的海上交通,认为"印度佛教由海路传入中国,最早亦当在桓帝末世,此时中原地区已流行佛教,并有译经的胡僧,则海路迟于陆路,固不待言"。而涉及印度佛教经海路传入的内容,则迟到西晋时才有明确的记述。因此"印度佛教沿海路传入中国的最早可能在汉末吴初,比由陆路传入要晚,而且止于交趾、广州一带"。作者进而考察了楚王英到笮融在彭城、徐州一带奉佛的事迹,指出楚王英并祀黄老浮屠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汉末,因此沂南、滕县、孔望山等徐州范围内的佛教造像都是受这一传统影响的产物,而从整体来考虑,徐州及其周边地区的佛教传播,应当划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佛教传播圈内,其来源是陆路,而非海路②。

关于四川彭山、乐山麻濠、柿子湾三处佛像,吴焯先生认为具有西北印度犍陀罗早期佛教艺术特征,年代也比沂南、孔望山的佛像要早,可以认定是东汉末年的遗物。他比较了四川与印度交往的三条道路,认为最有可

① Wu Hung, "Buddhist Elements in Early Chinese Art (2nd and 3rd Centuries A. D.)", *Artibus Asiae*, 47. 3-4, 1986, pp. 263-352。

② 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15—133页。

能是取羌中道,即经西域(新疆)、青海而传到四川的[1]。有的学者认为四川的造像是从印度经缅甸、云南传入的[2]。吴焯发表《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对此看法予以全面的批判。他依据原始史料和相关史实的历史背景,对法人伯希和以来论证川滇缅印古道在汉代就已沟通,并且成为传播佛法之路的观点,一一做了批判。他所辨证的问题有:一,从史料看,汉武帝经略西南,主要是要控制西南夷,而张骞指求的从西南通身毒(印度)的道路,实未开通。二,《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记永昌有"身毒之民",被看作是印度人经西南丝路而来的例证,但据《慧琳音义》,此身毒实际上是指两晋之际西南夷中的哀牢夷,与印度无涉。三,《高僧传·慧叡传》记其从蜀之西界而游历诸国,最后到南天竺。对比《高僧传》其他"蜀之西界"的用法,可知为由蜀入吐谷浑,经西域入印度,与滇缅道无关。四,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轮传》记古时有中国僧人二十余"从蜀川牂柯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从蜀川牂柯道的开辟是针对南粤,论证此牂柯道绝非川滇缅印道,而是由川入粤,由广州入海到印度的。五,对于印度佛教是否由川滇缅印道入四川,再至中原的问题,从史料看不出汉代这条道路已经贯通,从印度方面看,靠近滇缅的印度迦摩缕波国到玄奘时仍不

① 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133—150 页。又见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 年第 11 期,40—50 页。

② 这方面的看法,集中体现在阮荣春《佛教南传之路》一书中,该书由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四川、云南考古发现的一些胡俑和外来物品，大多数来自广西和广东沿海，而非川滇缅印道。

信佛法，因此佛教经此道传入的可能性极小。六，四川、云南考古发现的一些胡俑和外来物品，大多数来自广西和广东沿海，而非川滇缅印道。由此，作者将前人的解说一一击破，认为汉代四川与印度的沟通，不是走的川滇缅印道，而是经牂柯道或蜀交趾道到广州和交趾，然后经海路到印度的①。

杨泓先生也一直关注早期佛教文物，并发表过一些文章，他的观点集中反映在1997年出版的《美术考古半世纪》中《汉魏时期佛教造型艺术品》一节，对相关的早期佛教艺术品做了通盘的解说。关于彭山东汉中晚期墓的摇钱树座，可确定中间是佛像，但两边是供养人，而不是菩萨像。四川绵阳何家山出土东汉晚期崖墓摇钱树上之佛像，是祈求钱财的仙人和神兽，而不是作为宗教敬奉的礼拜尊像。乐山麻濠一号墓，1985年首次测绘，年代在东汉晚期到蜀汉时期，其时佛教尚为传统的早期道教、神仙思想之附庸，而不是独立的宗教。沂南和和林格尔的图像也是如此。孙吴到西晋时期江南地区的佛像，只能表明当时许多器物的装饰图纹已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并把佛像列入传统所熟知的神仙图像行列，但还都不是人们虔信的宗教中顶礼供养的尊像②。

孙吴到西晋时期江南地区的佛像，只能表明当时许多器物的装饰图纹已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并把佛像列入传统所熟知的神仙图像行列，但还都不是人们虔信的宗教中顶礼供养的尊像。

最近发表的一篇是罗世平《汉地早期佛像与胡人流寓地》。他以洛阳为中国佛教最初立寺之地。佛教从洛

① 《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38—50页。

② 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182—190页。

阳流向民间的第一站是楚王英所在的彭城地区，加之沂南和孔望山的造像，形成以徐州为中心的齐楚早期佛教美术流布区。他指出，有人以孔望山临海而提出佛教由海路传入说，“从佛教初传中国时的各方面因素综合来分析，海路一说的依据尚不够充分”。至于南方吴地的佛教美术，年代最早在孙吴时期，而且仍与东王公、西王母并行杂处，反映民间对佛教的认识依然停留在祈福禳灾的神仙信仰阶段。四川佛教遗迹有犍陀罗风格，加之地域与西域相近，有理由将四川佛教与西域佛教及佛教传播者联系起来。不论在什么地方，早期佛教的传播与胡人的流寓是相关联的。他还总结了早期佛像的图像学特征①。

四川佛教遗迹有犍陀罗风格，加之地域与西域相近，有理由将四川佛教与西域佛教及佛教传播者联系起来。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学界在以下几个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第一，我们排除明确属于三国和西晋的材料，就俞伟超先生提示的东汉佛教图像来说，尼雅出土白地蓝色腊缬棉布上的所谓菩萨像，现在一般认为是希腊的丰收女神像②，除此之外，其他图像学者们基本认定为佛教图像，只是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是独立的佛像或与中国神仙相对等的图像，有的学者则把它们看作是一些佛教因素，它们属于中国传统信仰或道教信仰的组成部分。

尼雅出土白地蓝色腊缬棉布上的所谓菩萨像，现在一般认为是希腊的丰收女神像。

第二，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四川佛像所具有的犍陀罗

① 《艺术史研究》第1辑，1999年，79—101页。

② 参看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165页；林梅村《公元3世纪的西域纺织物》，同作者《古道西风》，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380—381页。

艺术的风格受到广泛的关注,吴焯还进一步讨论了四川佛教自西域传来的途径问题,认为是经过青海、西域的交通道路而传到四川的,同时他也反驳了从西南丝绸之路传到四川的可能性。

这些考古资料的年代大多数在桓帝以后(147 年后),较文献记载的东汉佛教开始流行的年代要晚。

第三,这些考古资料的年代大多数在桓帝以后(147 年后),较文献记载的东汉佛教开始流行的年代要晚。大多数学者仍然把洛阳看作是东汉佛教的中心,其他地区(四川可能是例外)的佛教是从洛阳流传过去的。洛阳发现的东汉末年佉卢文井栏题记①,可以补充这种看法。

沂南画像石和孔望山造像,标志着以徐州为中心的齐楚地区是早期佛教美术的流布区。

第四,沂南画像石和孔望山造像,标志着以徐州为中心的齐楚地区是早期佛教美术的流布区。这是楚王英所在的彭城地区佛教发展的结果,而楚王英的佛教信仰来自洛阳,与海路没有关系。

三、汉代佛教的性质

考古资料的增加,对于人们理解汉代佛教的性质提供了帮助。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有许理和(E. Zürcher)《汉代佛教与西域》一文。在综合讨论了文献和考古材料之后,许理和归纳了汉代佛教的特征:(一)以宫廷为中心的混合崇拜:浮屠与黄老同祀,佛教只不过是西汉以来流行于宫廷的方士道教的外来变种。最早的有力证据是公元 65 年汉明帝给楚王英的诏书。(二)以僧伽为核心的规范化佛教:有组织严密的寺院,有外国僧侣和中国居

① 林梅村《洛阳所出佉卢文井栏题记》,《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387—404 页。

士，有正规的教义。以148年安世高至洛阳为标志，这个教团与宫廷佛教没有关系。（三）中国本土信仰和宗教崇拜对佛教因素的广泛和盲目的吸收。山东沿海和四川、内蒙发现的佛教图像，地理范围广泛，但与佛教传播无关。因为这些形象通过实物传播，易于进入边远地区，同时也易于丧失原本的含义。比如这些资料常常见于坟墓，作为随葬品出现，不是佛教的本义。但这些图像表现的是公元2世纪兴起的犍陀罗艺术的风格和汉代的艺术传统。

山东沿海和四川、内蒙发现的佛教图像，地理范围广泛，但与佛教传播无关。因为这些形象通过实物传播，易于进入边远地区，同时也易于丧失原本的含义。

许理和指出，佛教的传播是有条件的，因为僧伽是佛教这种宗教生活的核心，所以佛教的传播实为僧伽的传播。而一个僧伽建立一个根据地，就应当有一个供奉它的基础，即要有供食的施主。一旦一个地方供应不足，则僧伽中的一些僧侣就要出行他方，寻求新的立脚点。大寺院要有城市基础，有商人、贵族施舍，最好是统治者的支持。迦腻色伽时代，佛教从西北印度和东部阿富汗发展到北面的巴克特里亚和粟特地区，这里文明发达，希腊化文化影响深远。这一地区发现许多早期（2世纪）佛寺遗址，为康居和安息僧最早到达中国提供了解释。相对来讲，汉代时期的西域（塔里木盆地诸国）却没有佛教，因为那里没有高度发达的经济来维持僧伽这样的寄生组织。对比前后汉书《西域传》，可以知道2世纪时西域人口大爆炸，可能是汉代的密集型灌溉农业通过屯田传到那里的结果。农业的发达，推动了城市的出现、商业的发展和城市贵族的形成，具备了建立僧伽的条件。于是，3世纪中期，佛教在西域的真空被打破。因此，汉代佛教不是“接触佛教”，即把完整的宗教体系、教义、

相对来讲，汉代时期的西域（塔里木盆地诸国）却没有佛教，因为那里没有高度发达的经济来维持僧伽这样的寄生组织。

汉代佛教不是“接触佛教”，而是“远程传递”。

经文、组织等等，近似地、连续地、具有反馈性地从一处带到另一处。而是“远程传递”，即它的接触是偶然的、断断续续的，传播不完善，脱离原来的背景，在新的文化环境里面目全非[①]。

许理和的分析给我们以很多启发，但他对考古图像资料的分析主要是受到了巫鸿的影响，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些考古资料反映的佛教从宫廷由各级官僚带到地方的趋向。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肯定考古资料对我们过去仅仅依靠文献所获认识的补充。

汉代佛教分成两个系统，一个是从宫廷到地方各级官吏的盲目崇拜，另一个是东汉末年在洛阳开始建立的僧伽教团。

现在，我们可以在许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把汉代佛教分成两个系统，一个是从宫廷到地方各级官吏的盲目崇拜，这可以把从洛阳到齐楚地区的情形作为例证，他们把佛陀看成一种仙人，浮屠与黄老同祀，并没有接受佛教的教义，也没有为了传教而宣扬佛教知识，其他考古资料也反映了同一倾向。另一个是东汉末年在洛阳开始建立的僧伽教团，他们是出家的胡人，如安世高，生活在寺院当中，以传教为职业，译经讲道，教授生徒。

中国佛教从汉代开始就已有了自己的特征，既有盲目崇拜的信徒，也有穷究哲理的高僧。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这两条主线一直存在，有时它们相互结合在一起，有时是各自独立地进行，可以说，中国佛教从汉代开始就已有了自己的特征，既有盲目

① E. Zürcher, "Han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 *Thought and Law in Qin and Han China. Studies dedicated to Anthony Hulsewe on the occasion of his eightieth birthday*, ed. by W. L. Idema and E. Zürcher, Leiden 1990, pp. 158-182。吴虚领汉译文《汉代佛教与西域》，载《国际汉学》2，河南大象出版社，1998 年，291—310 页，惜删掉注释。

崇拜的信徒，也有穷究哲理的高僧。

四、海路传入说批判

在讨论东南沿海的佛教考古遗迹的考古学者当中，对于佛教自海上传入的说法一般都抱谨慎的态度，甚至是批判的态度。有趣的是，近年来力主海路说者多为沿海的地方学者和一些历史学家，这里可以举 1995 年吴廷璆与郑彭年先生合作发表的《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为代表论著，他们从七个方面来申论佛教是先由海上输入中国的。这七条理由是：

第一，两位作者认为东汉明帝永平求法的说法不足信，因为当时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断绝。而始自四川的滇缅路开通较晚，所以《后汉书》所记楚王英信佛的事迹，“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而且最可靠的史料”，由于南海航路早在一百多年前的西汉武帝时已经开通，“因此，楚王英所信的佛教只有来自海上，别无他途”。

第二，作者说“楚王英所信之佛教不是经由西域诸国，而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原因是山东人襄楷引用的《四十二章经》，即该经第一个译本直接译自印度古代俗语，用“浮屠”而不是“佛”字，而据季羡林的研究，“比‘佛’更古的‘浮屠’却没有经过西域语言的媒介，而是直接由印度方言译过来的”①。而且，《后汉书·西域传》没有关于西域佛教的任何记载，其资料来源于班勇，班氏父子于

① 作者所据为季羡林《浮屠与佛》，《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 年，20 页。

明帝永平十六年(73)至顺帝永建二年(127)一直在西域地区,表明127年以前西域诸国还没有信佛。

第三,外来宗教初传入时,必须和接受国的固有信仰结合,不论是楚王英还是后来的桓、灵二帝,都把佛教看作与黄老相同的一种神仙方术。佛教之所以能在彭城一带安家落户,与当地接受佛教的气候和土壤分不开,同时江苏、山东是沿海地方,与佛教海上传来有关。

第四,根据吴焯关于"已知西域遗存的佛教文物的年代未超过公元二三世纪"的看法,认为中国南方发现的佛教文物时间较早,他们举出的资料有:(1)河北石家庄北宋村二号汉墓出土的两尊铜像,说"这两尊佛像是在中国发现的最古的佛像,从此墓的年代推测,制作于后汉至魏晋时代"。(2)山东中南部沂南北寨村发现的画像石墓,有几幅图像受佛教影响,年代为灵帝末年至献帝初年,即190年前后。(3)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像中的佛像,年代为后汉末年,"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像雕刻"。

第五,作者接受梁启超的中国佛教分南北两宗的看法,即南宗传小乘佛教,北宗传大乘佛教,海道在先,陆道在后。并说洛阳桓帝合祭黄老与浮屠,是来自南方楚王英的做法。

第六,《高僧传》关于147年到中国的佛教史上第一位佛经翻译家安世高的记载不可信,他可能是随商人从海上来中国的。

第七,佛教从陆上传入中国的可靠记载最早不过二世纪末叶即后汉末年,洛阳教派是二世纪末开创的,比江

南教派要迟百余年[1]。

这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长文不能不让人感到失望,因为上述七点论证不仅无法驳倒汤用彤先生的证据,而且对有些基本概念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以下略加论辩:

第一,作者以王莽到永平时西域交通路断,来证明永平求法传说之不可能。其实汉王朝与西域诸国间政治联系的断绝,并不能证明其他交往也都断绝,史书的记载并不是完整的。同样,海路与印度的交通和陆路一样,都是早在汉武帝时就开通了的,但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佛教是从海上还是陆上传来的。楚王英原是从洛阳受封到彭城地区的,其合祀黄老与浮屠的做法也可能来自洛阳。没有理由绝对地说"楚王英所信的佛教只有来自海上,别无他途"。

楚王英原是从洛阳受封到彭城地区的,其合祀黄老与浮屠的做法也可能来自洛阳。没有理由绝对地说"楚王英所信的佛教只有来自海上,别无他途"。

第二,作者引用季羡林先生的研究成果,以"浮屠"一名来证《四十二章经》第一个译本直接译自印度古代俗语,而不是西域的语言。关于"浮屠"的来源,季先生在作者发表此文前五年,就在同一本杂志中,有《再论浮屠与佛》一文,指出《四十二章经》中的"浮屠",应当是来自流行于中亚(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大夏语(即巴克特里亚语/Bactrian),原文是 bodo、boddo、boudo,比从西域(古代新疆)流行的语言所翻译的"佛"字要早进入中国[2]。事实上,季先生在《浮屠与佛》中,也没有说"浮屠"的原语是从海路来的,而后来更明确证明是从中亚经陆

① 《历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20—39 页。

② 《历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3—11 页。

路传来的。

第三，关于江苏、山东沿海地方较早接受佛教的问题，汤用彤先生已经有所论说，吴焯和罗世平两位有更细致的分析和发挥。这里由于方术盛行，也是早期道教流行之区，所以易于接受外来宗教，使之与本地宗教杂糅在一起。与经过遥远的海上路程相比，经陆路从洛阳传入，是最容易理解的。而且，这一地区最早信佛的楚王英，本人就来自洛阳。楚王英的佛教没有根据说来自海上。

第四，两位作者所举的三条材料地域都在北方，并不在作者想要论证的南方。第一条石家庄出土的材料，上述讨论早期佛教考古资料的权威学者都未引用，而作者本人也说年代从后汉到魏晋，既然到了魏晋，就不能作为最早的佛教文物之证。第二、三条材料是前人已经讨论过的材料，年代都在汉末或更晚，因此很难证明其早于西域的说法。还有无法回避的一点是，佛像起源在印度西北地区，不在印度南部。公元 1 世纪印度南方佛教特别是佛教艺术的发达程度并不明了，而贵霜地区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却盛极一时，贵霜王朝后期的国王也大力推行佛教，中国发现的早期佛像具有犍陀罗艺术的风格。这些说法都与海路说相违背，若要建立海路说，就有必要对这些说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佛像起源在印度西北地区，不在印度南部。公元 1 世纪印度南方佛教特别是佛教艺术的发达程度并不明了，而贵霜地区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却盛极一时，贵霜王朝后期的国王也大力推行佛教，中国发现的早期佛像具有犍陀罗艺术的风格。

第五，至于南北分宗的说法，汤用彤已经做过批判。安世高在洛阳时所译的经典，过去一般认为是小乘的①，

① 参看王邦维《安息僧与早期中国佛教》，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84—92 页。

最近有的学者又认为是属于大乘的[1]，事实上，当时佛教在中国尚处于初传阶段，大小乘的区分不是非常明显，很难区分南北的宗派特征。梁启超划分大小乘的说法，现在看来略显粗糙。王邦维认为："在中国佛教史上，从没有出现像印度和中亚那样的大小乘并峙的局面。"[2]这一观点是可取的。至于说桓帝信佛的做法是来自楚王英所在的南方，则只是一种推想。

第六，有关安世高记载的史源学考察，汤用彤已经有所论辩。根据王邦维更仔细的分析，安世高最有可能来自安息国东境，佛教曾在那里流行过。他在从桓帝建和二年(148)到灵帝建宁中(168—171)之间，在洛阳译经传教。汉末洛阳动乱，他才到南方传教[3]。其生平的基本事迹还是清楚的，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安世高是从海上到中国来的。

第七，作者以东汉末来华的译经僧来作为北方佛教开始的标志，以为较江南佛教迟百余年。但对于洛阳、内蒙、山东等地的考古资料却避而不谈，这样的论证方式是

---

① A. Forte, *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s*, Kyoto 1995; Wang Bangwei, "Mahāyāna or Hinayāna: A reconsideration on the yāna Affiliation of An Shigao and His School", 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 2 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107—114 页；王邦维《论安世高及其所传学说的性质》，王尧编《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年，667—682 页。

② 王邦维《论安世高及其所传学说的性质》，王尧编《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下)，681 页。

③ 王邦维《安息僧与早期中国佛教》，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82—86 页。

难以让人苟同的。

总之,《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一文并没有给海路说提供任何实证性的材料,只是把前人的旧说和自己的理解糅合在一起而已。但是,这篇文章发表在影响很大的《历史研究》上,而且在 1995 年发表以后一直未见回应,所以不得不加以辩驳,希望把这个问题的讨论矫正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我并不是反对海路传入的可能,但要建立这种说法,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来。

我并不是反对海路传入的可能,但要建立这种说法,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来。

五、西域与汉代佛教的曙光

迄今为止,在西域(新疆)范围内尚未发现确切属于汉代的佛教遗迹,这成为佛教从海路传入说的理由之一。实际上,在印度和中国东南沿海之间,同样有着无法解释的空白,甚至路程要比陆路还要长。相对而言,两汉时期汉代与中亚通过陆路的交往,远比汉代与印度通过海路的交往要频繁得多①。

另外,持海路说者往往以《后汉书·西域传》没有关于西域佛教的任何记载为由,否定西域佛教的早期存在。但《后汉书》的资料来源于班勇,所记为班勇顺帝永建二年(127)从西域退出以前的事情。即使把汉朝势力完全退出西域的 175 年作为西域没有佛教记录的下限,也不能说明 175 年以后西域诸国是否已经信了佛教。因为安

① 除《汉书》、《后汉书》等史料记载外,近年发现的敦煌悬泉汉简中有大量的中亚和西域使者往来的记录,参看胡平生、张德芳编著《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103—174 页。

世高是桓帝建和二年(148)到洛阳的,佛教考古资料的年代大多数在桓帝(147年)以后,因此,在175年以后佛教传入西域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按照许理和的说法,在班勇所记的127年以前,西域的农业发达,推动了城市的出现、商业的发展和城市贵族的形成,具备了建立僧伽的条件,所以,佛教在公元2世纪的后半,即东汉后期在西域开始传播,或许是情理中的事。

还有,西域(新疆)没有佛教并不能说明没有佛教徒经过其地而到达中原。问题是我们不应忽视在塔里木盆地的西面,即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的古代大夏(巴克特里亚)和贵霜王国佛教的情形,因为文献记载的早期译经僧大多数来自贵霜王国的范围里,《魏略·西戎传》记"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汤用彤先生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最初佛教传入中国之记载,我们也不应当忽视。

我们不应忽视在塔里木盆地的西面,即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的古代大夏(巴克特里亚)和贵霜王国佛教的情形,因为文献记载的早期译经僧大多数来自贵霜王国的范围里。

巴克特里亚地区发现的希腊文和阿拉美文阿育王(前268—前237年)石柱,表明公元前3世纪时,佛教已经传至这一地区[①]。尽管这一地区经过了从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朝到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的转化,其间还有其他民族建立的大大小小政权,但佛教的影响却延续下来。

佛经中的《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pañha)透露出,

① 比较方便的参考资料,见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2卷第十六章《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塞人王国的语言与文字》,徐文堪等中译本,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316—326页,又245页。

这位印度-希腊君主米南德(Menander,前 150—前 135 年在位)曾对佛教颇有热情[①]。而且,在希腊人占据犍陀罗地区的末期或稍后,一位当地的总督梅里达赫·提奥多鲁斯(Meridarch Theodorus)曾供奉斯瓦特(Swat)地区的佛舍利[②]。而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地区的发掘,以及学者们对塔克西拉(Taxila,即坦叉始罗)遗址资料的再评价,也使得某些学者把第一尊佛像的出现时间定在公元前 1 世纪[③]。

过去有人提到过贵霜第一王丘就却(Kujula Kadephises,大约公元 30—80 年在位)钱币上有佛像,主要依据是钱币的铭文中有"信法"的字样,但因为马土拉(Mathura)发现的不信佛法的胡韦色伽(Huvishka)的钱币上也有同样的铭文,这个证据目前难以成立[④]。在迦腻色伽(Kanishka,大约 100—126 年在位)的钱币上,已经有完好的佛像和用大夏语拼写的"佛陀"字样[⑤]。这个年代比东汉中晚期的佛像要早一些。迦王时代曾着力于佛教传播,而且贵霜帝国范围内的犍陀罗、马土拉迅速发展起来的佛教雕像艺术,很快传布到印度、阿富汗和中亚各城镇,留下了哈达(Hadda,位于贾拉拉巴德南)、贝格拉姆

---

① 《中亚文明史》第 2 卷,82 页。

② 同上书,82 页。

③ 同上书,286 页。

④ 同上书,248 页。

⑤ E. Errington and J. Cribb (ed.), *The Crossroads of Asia. Transformation in Image and Symbol in the Art of Ancient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Cambridge 1992, pp. 199-201.

(Begram,喀布尔东北约 64 公里)等一系列遗址,出土了许多精美的佛教造像[①]。所以东汉后期的考古图像较多,大概不是偶然的,应当与贵霜有着密切的关系。

东汉后期的考古图像较多,大概不是偶然的,应当与贵霜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更为重要的材料则是近年来在阿富汗发现的文献材料。

1994 年 9 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购得五个陶罐,内装有桦树皮写本,是用佉卢文字母书写的犍陀罗语佛教文献,据说来自阿富汗,推测应是哈达地区。这位善人把这些珍贵文物捐赠给了英国图书馆。1996 年 6 月,英国图书馆向外界报告了这一消息[②]。

在英国图书馆公布获得这批写本大约四年之前,东京“日佛交易社”的栗田功氏,曾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拍摄过几个陶罐,其中有桦树皮写经,陶罐上面有“属于法藏部所有”的字样,定方晟教授因此撰文介绍这些发现[③],但当时尚不知道这些古物后来到了英国图书馆。由此可以知道,这些桦树皮写本是从白沙瓦流散出来的。

---

① 参看《中亚文明史》第 2 卷,259—315 页。

② “British Library acquires oldest Buddhist manuscripts”, *The Japan Times*, June 28, 1996; John Darnton, “Fragile scrolls cast new light on early Buddhism”, *The New York Times*, *Intrenational*, Sunday, July 7, 1996; “Buddhisms unrolled?”, *OIOC Newsletter*, *British Library*, No. 53/54, 1997, pp. 2-5. 参看林梅村《古代大夏所出丘就却时代犍陀罗语三藏写卷及其相关问题》,作者《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115—130 页。

③ 定方晟《西北印度的法藏部》,《春秋》1996 年 10 月号,20—23 页;A. Sadakata, “Inscrptions Kharoṣṭhi provenant du marche aux antiquites de Peshawar”, *Journal Asiatique*, 28. 4,1996, pp. 301-324。

英国图书馆将这批写本交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邵瑞祺(Richard Salomon)整理。1997 年，邵瑞祺发表《英国图书馆最近所获一些早期佛教写本的初步研究》，介绍了初步研究的结果①。1999 年，他又主编出版了《来自犍陀罗的古代佛教经卷——英国图书馆所藏佉卢文残卷》一书，全面介绍了这批写本的外观和内容②。

一批写在桦树皮上的古代经卷，装在五个大陶罐中，罐上都有佉卢文的供养题记。

根据上述报道和研究，这是一批写在桦树皮上的古代经卷，装在五个大陶罐中，罐上都有佉卢文的供养题记。写本总共有十三捆，包含了三十二个残片，送到英国图书馆时，一共二十九件，编为二十九号码，文字用佉卢文(Kharoṣṭhi)，语言是犍陀罗语(Gāndhārī)，或称西北印度俗语(Prakrit)。邵瑞祺教授仔细分析了这种陶罐的产地和上面的题记、桦树皮写经及这种把佛经装在陶罐中的做法，还有此前已经发现的所有佉卢文写卷的情况，认为这类写经主要来自阿富汗东部贾拉拉巴德地区，特别是哈达(即《法显传》、《大唐西域记》的醯罗)地区，因此推测这批写卷也来自同一地区。这里曾经是佛教圣地，5 世纪以后受到哌哒的破坏。法国考古队 20 世纪 20 年代曾在此发掘，所获艺术品十分丰富，皆为犍陀

① Richard Salomon,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some early Buddhist manuscripts recently acquired by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7.2, April/June 1997, pp. 353-358.

② Richard Salomon, with contribution by Raymond Allchin and Mark Barnard,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i Frag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Washington Press, 1999.

罗风格的雕像。

这些经卷在古代就已残破，但它们原本应属于一个犍陀罗的佛教寺院，很可能是法藏部的一个寺院。已知的内容有：

这些经卷在古代就已残破，但它们原本应属于一个犍陀罗的佛教寺院，很可能是法藏部的一个寺院。

1. “经”及注疏：包括《众集经》(Saṅgīti-sūtra)和来源不明的《众集经》注疏。还有讲“四禅定”的经书和内容与巴利藏《增支部》接近的一部经典。

2. “论”及注疏：数量较多，内容大多数可以在巴利藏《小部》中的《经集》、《自说》、《法句》、《如是说》以及《长老偈》中找到对应段落。

3. “偈颂”文献：包括《无热恼池偈颂》(Anavatapta-gāthā)断片、《犀角经》(Khaḍgaviṣāṇagāthā)及《法句经》(Dharmapada)片段。

4. “譬喻”及相关文献：其中一个故事提到吉霍尼迦(Jihonika)和阿斯帕瓦尔曼(Aśpavarman)。

5. 其他文体及杂类文献：有“佛赞”(stotra)，还有梵文不知名医学文献[①]。

关于这批佛典的年代，一个陶罐(陶罐 A)上的供养题记说道，这是苏诃索摩(Suhasoma)的夫人瓦萨瓦达荼(Vāsavadattā)所供养的，而这位瓦萨瓦达荼是一件公元6年的铭文上提到的阿帕拉卡(Apraca)王子因陀罗瓦尔

---

①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i Fragments*, pp. 15-55。汉译名的翻译，参考了王邦维的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5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343—353 页。

曼(Indravarman)的姐姐。苏诃索摩出现在一件金叶佉卢文铭文中，他是犍陀罗的乌苌(Oḍi)王色那瓦尔曼(Senavarman)的王亲及官僚，该金叶铭文提到公元1世纪上半叶(大约30—80年在位的)贵霜统治者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的儿子萨达斯卡那(Sadaṣkaṇa)，由此可知这批残卷是公元1世纪上半叶之物。

另外，一件残片上提到的吉霍尼迦和阿斯帕瓦尔曼，都是在其他出土铭文或钱币上有名可查的历史人物。吉霍尼迦见于塔克西拉出土公元35年瓶器铭文和钱币上，而阿斯帕瓦尔曼是上述阿帕拉卡王子因陀罗瓦尔曼的儿子，他也见于塔克西拉出土银盘铭文上，并且也有自己发行的货币。因此，吉霍尼迦和阿斯帕瓦尔曼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俩都是西北印度地区印度－月氏(Indo-Scythian)小王之一，而且他们和陶罐题记所提到的人物也有关系。

如果以公元30年为贵霜王朝建立的起点，那么这批写卷就是贵霜王朝建立之前犍陀罗地区印度－月氏系小王国中佛教寺院的遗物了。

由此，再加上文字和语言的证据，邵瑞祺认为这批写卷写成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1世纪早期，而且他更倾向于大约公元10至30年之间①。

还值得注意的是，编号为D的陶罐上，有佉卢文的题记，说这些经典是属于法藏部的②。这些经典是有意存放的，它们原本应当是属于一个法藏部的寺院。

如果以公元30年为贵霜王朝建立的起点，那么这批

①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â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i Fragments*, pp. 141-155.

② *ibid.*, p. 151.

写卷就是贵霜王朝建立之前犍陀罗地区印度-月氏系小王国中佛教寺院的遗物了，如此早的佛典在大月氏地区的发现，证明了西北印度地区早期佛教寺院和佛典藏经的存在，而且当时的印度-月氏小王中，有不少是佛教的有力支持者。

这样，我们回过头来看《魏略·西戎传》中"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就可以说是可能的事情了。

这样，我们回过头来看《魏略·西戎传》中"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就可以说是可能的事情了。

在我们为学术界获得这批极其珍贵的佉卢文犍陀罗语佛教文献而欣喜不已的时候，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伦敦传来，一批据说是来自阿富汗巴米扬的梵文、佉卢文写本在伦敦古书店中露面，写本数量非常庞大，约有一万片以上。这批写本后被挪威富商 Martin Schoyen 购得，收藏在奥斯陆南 Spikkestad 小镇附近的山庄里①。幸运的是，这些资料很快就被交给学者研究，陆续发表。1997 年，以阎子伯(J. Braarvig)为首的研究小组开始整理这批写本，发现它们来源不一，有些可能是从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地区来的（这里的一座佛塔在 1931 年曾发现三千叶桦树皮佛经）。写本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七八世纪都有，总数超过一万片，有些是很碎的断片。文字有佉卢文、各种书体的梵文，质地有贝叶、桦树皮、动物皮三种。

① Sam Fogg, *Catalogue 17: Manuscripts from the Himalayas a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London 1996, pp. 46-49；松田和信《从阿富汗到挪威》，《佛教大学总合研究所报》13，1997 年 12 月，24—28 页；松田和信《现藏挪威的阿富汗出土佛教写本——访 Martin Schoyen 收藏品》，《月刊しにか》1998 年 7 月号，83—88 页。

到目前为止，已经比定的文献，有佉卢文犍陀罗语《大般涅槃经》，有贵霜时代的梵文《小品般若》，有大乘佛典《胜鬘经》、《诸法无行经》、《阿阇世王经》、《法华经》，有摩诃僧祇部和说出世部的戒律，还有巴克特里亚语的佛典，等等①。这批写本中的早期经典的解读，一定会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和西域（新疆）的早期佛教问题。

在上述两批写本中，都有《法句经》的发现，特别是英国图书馆所藏犍陀罗语《法句经》，对于西域佛教的研究意义重大。我们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俄两国的考察队和外交官曾经从和田地区购得一部写在桦树皮上的犍陀罗语《法句经》，是此前发现的最古老的佛教文献写本②，但因为没有可资对照的材料，所以年代也不确定，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3世纪，各种说法都有③。邵瑞祺认为，和田出土佉卢文《法句经》的语言是一种明显受到翻译过程影响的书面语言，而这批新发现的写卷，一部分也带有“翻译味”，但一部分则具有“口语”的特点④。显然，和田的《法句经》要较哈达的《法句经》晚，但因为字体、语言、书写材料基本相同，也不会晚得太远，既然哈达

① Jens Braarvig (ed.), *Manuscripts in the Schoyen Collection I: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 I, Oslo: Hermes Publishing, 2000；松田和信《挪威Schoyen收集品梵文法华经断简的发现》，《东洋学术研究》38.1，1999年5月，4—19页。

② J.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1962.

③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a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i Fragments*, p. 119.

④ 参看39页注①王邦维的书评。

的写本是公元1世纪早期的，那么和田《法句经》的年代推测在公元2世纪是不无可能的。

虽然目前尚无确切年代的西域佛教典籍和美术品被发现或被确定，但随着阿富汗新出写本的陆续解读，相信西域以及汉代佛教的面纱或许可以陆续被揭开。

虽然目前尚无确切年代的西域佛教典籍和美术品被发现或被确定，但随着阿富汗新出写本的陆续解读，相信西域以及汉代佛教的面纱或许可以陆续被揭开。

六、结　语

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牵涉到文献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交通史等许多学科，资料丰富，但却十分零散，而且时代久远，记载不够明确。要回答是陆路还是海路传入的问题，最好首先把各个方面的材料举出，并考虑各方面专家的解说。相对而言，目前的海上传入说，还没有特别过硬的材料予以支持，有些论证也不够严谨。

综合已有的历史文献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图像资料，特别是考虑到阿富汗最近新发现的公元1世纪早期的佛教文献，我认为佛教从西北印度大月氏（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经陆路传入汉代中国的说法最为合理。在进入中国以后，与初期道教及中国传统方术结合，佛教图像受到盲目的崇拜。而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是东汉末年安世高来洛阳后，通过翻译佛经和教授弟子而传播开来的。

我认为佛教从西北印度大月氏（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经陆路传入汉代中国的说法最为合理。

（原载《北大史学》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20世纪的唐代中西关系史研究

隋唐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特别是唐朝，在政治文化上继承了汉魏以来的传统并加以总结、凝聚、提高，又接受了南北朝民族融合、疆域开阔的新局面，形成一套完整的政治、文化系统。唐朝以其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把势力扩张到中原王朝前所未至的地区；又以宽广的胸怀，吸收东西方各种文明的营养。东西方文化的汇聚使得隋唐文化绚丽多彩，经过整合的唐朝制度文化又强烈地影响着周边各国。以唐朝为中心自此时开始形成东亚文明的特征，影响深远，以至于今。对外关系史是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由于史料缺乏，涉及的语言种族不一，相对而言，研究的难度较大，其成果也不能与其他领域相比。以下择要介绍有关的研究成果。

一、通　　论

（一）中外关系史

在中外关系史的通史类著作中，都有关于隋唐五代的篇幅，多少不等。但这类包含东西方各国的通论著作却不多见。早年，向达著有《中外交通小史》（商务，1930），但篇幅不大。陈佳荣著《中外交通史》（香港学津，1987）、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教，1993）、张广达与王小甫合著《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香港中华，1988）、黄新亚《丝绸之路·沙漠卷》（浙江人民，1993）、刘迎胜《丝绸之路·海上卷》（浙江人民，1995）、《丝绸之路·草原卷》（浙江人民，1995）都有关于唐朝的一些章节，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概貌。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

流史》(河南人民,1987)是一部全面论述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集体著作,按国别和地区分成若干篇,由各方面的专家执笔,概要叙述中国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关系、文化交往、交通路线等。其中涉及隋唐五代的篇章轻重不一,以下还会提到几篇有分量的论文。日本学者撰写了许多有关东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的通论性著作,比较集中于唐朝的一种,是山田信夫编《波斯与唐》(《东西文明的交流》2,平凡社,1971),其他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可参考《日本有关中亚研究文献目录(1879—1987年3月)》(东洋文库,1988)。日本学者较新的论说,见《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中华的分裂与再生》和11《中央欧亚大陆的统合》(岩波,1999、1997)。薛爱华(E. H. Schafer,一译谢弗)《撒马尔干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加州大学,1963;吴玉贵汉译本题《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科,1995)收集了大量汉文正史、政书、类书、诗歌、笔记、小说中的材料,分成各种身份的人、家畜、野兽、飞禽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工业用矿石、宝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书籍等十八类,来研究唐朝的外来文明,通过对具体的外来物品的讨论,说明舶来品对唐朝社会、文化的影响。这是一部全面探讨唐代中外关系史的著作,包括了波斯、粟特等伊朗系文化的东传,而作者所谓的"撒马尔干的金桃",不过是舶来品的象征而已。季羡林《糖史》(收入《季羡林文集》9至10,江西教育,1998,其第1编以《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为名,先由经济日

谢弗《撒马尔干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通过对具体的外来物品的讨论,说明舶来品对唐朝社会、文化的影响。

报社1997年刊行)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了蔗糖及其制造技术的交流。

专门研究隋唐时期外国侨民的论著,有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1978),讨论了蕃人在唐朝的分布及生活情形,唐朝政府对他们的管理和入唐蕃人对唐朝文化生活的影响。谢氏又有《唐代诗人与在华外国人之文字交》(台湾文史哲,1981),于诗歌材料收罗颇富。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联经,1986、1990),则以研究入唐蕃将为主,虽所论以唐史本身为主,但书后列有详细的《唐代蕃将表》,颇便省览。马驰《唐代蕃将》(三秦,1990)对蕃将在唐朝的作用论述更为系统。他还撰有《试论蕃人仕唐之盛及其姓名之汉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1994)。此外,苏庆彬《两汉迄五代入居中国之蕃人氏族研究》(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据正史、姓氏书和碑志材料,将入居中国之蕃人,分为北狄、东胡、西羌、西域、东夷五部,列出世系表,无世系可考者,则附在表后。本书分两编,下编为唐五代,表或附录均具出处,便于核查。

作为工具书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大百科,1986—1994)中国历史、考古学、宗教等分册,有不少出自专家手笔的相关条目,极富参考价值。另外,前嶋信次与加藤九祚编《丝绸之路事典》(东京芙蓉书房,1975)、朱杰勤与黄邦和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湖北人民,1992)、石源华主编《中外关系三百题》(上海古籍,1991)、长泽和俊编《新丝绸之路百科》(东京雄山阁,1994)、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词典》(新疆人民,1994),也可用为一般性参考书。

（二）中西交通史

比较而言，有关中西交通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著作相对多一些，其论述范围包括中亚、西亚、欧洲，有些还有南洋与非洲，是不限于一国或一个地区的通论性著作。近代以来，用社会科学方法和理念来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先驱者，应当是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汉学家。在一系列中西交通史料的整理著作中，尤以玉尔（H. Yule）原著、考狄（H. Cordier）增补的《契丹纪程录丛》（又译作"契丹路程"、"古代中国闻见录"等，*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4卷，伦敦，1913—1916）收集的史料最为丰富。与之相媲美的，是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辅仁大学，1930）。此书自中国古籍中辑录出大量史料，并依据玉尔、考狄书，译出相关的外文史料，分欧洲、非洲、西亚、中亚、印度五部分编排，可以说是一部集中西交通史料之大成的著作。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朱杰勤对此书的校订本，于原书有增有删。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校订本所增补的资料不多，此书应当有包含更为广泛的续编。

近代以来，用社会科学方法和理念来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先驱者，应当是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汉学家。

有关中西交通的通史类著作，主要有方豪《中西交通史》（5册，台北华冈，1977；上下册，岳麓，1987）、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1985）两种，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所作的综述。仅从隋唐五代部分来看，方书较沈著更为全面而且深入。最近出版的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1994），每一时代都由三部分组成：概述、年表、条目解说，以总结各时代中西关系史重大史事及其特征的概述为纲，以大事年表为主体，以百科全书式的条目为辅，并附有一定数量的图版、

插图、地图和索引。全书体裁新颖，各部分组合严密，混为一体，是一部多功能的中西关系史工具书。书中的概述由主编撰写，隋唐部分的年表和词条则主要由卢向前编写，在吸收欧美学者的成果方面，略显不足。

以人为中心来收集史料加以论述的著作，颇具规模者首推桑原隲藏《隋唐时代来往中国之西域人》(《内藤博士还历记念支那学论丛》，1926；收入《桑原隲藏全集》2，东京，1968；何健民汉译本题《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中华，1939)，但现在看来，稍嫌简略。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除收集了大量流寓长安之西域人的材料外，还论述了西域文明对唐朝都城的商业、生活、艺术、娱乐、宗教等多方面的影响，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名著。

以地域为中心来收集史料加以论述的著作，首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学报》专号2，1933；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1957)。此书除收集了大量流寓长安之西域人的材料外，还论述了西域文明对唐朝都城的商业、生活、艺术、娱乐、宗教等多方面的影响，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名著。石田幹之助《长安之春》(创文社，1941；讲谈社，1979)所收各文，也主要是以长安为背景的，内容涉及胡旋舞、当炉的胡姬、胡人采宝和买宝故事、伊朗系文化的流入等等。关于长安，还有护雅夫《以长安为中心的东西文化交流》(《东洋学术研究》8:4，1970)、武伯伦与武复兴《国际交往与长安的繁荣》(《理论导刊》1991.3)。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1992)对洛阳在隋唐时期中外交流方面的作用多有陈述，但出于众手，水准不一。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余太山编《欧亚学刊》2，中华，2000)从高昌对外来客使的供应制度、对外来商胡的管理、对西方移民的安置、对外来宗教的包容等

方面，说明吐鲁番的高昌王国对中西交通的贡献，以及高昌王国存亡与丝路通畅与阻绝的关系。

(三) 文物考古资料

文物考古资料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上显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学科也越分越细，而新的考古材料从出土到发表总要有一个认识和研究的过程，治史者往往不能及时利用考古资料，上述历史著作有些尽管在这方面有所努力，但相对于丰富的新出土文物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以及近年创刊的许多地方文物考古期刊中，陆续发表了许多涉及中外关系史的材料，其中陕西出版的《文博》、《考古与文物》和河南出版的《中原文物》，颇多有关隋唐两京的出土资料，可以说层出不穷。但这些材料散在四方，收集十分不易。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1，1995)按地区概述了全国范围内出土的外国输入的材料，并注明出处，便于查找。这些材料，以隋唐五代时期的居多，也反映了隋唐在古代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性。贺梓城《唐王朝与边疆民族和邻国的友好关系》(《文博》1，1984)主要是依墓志材料写成，取材不广。

文物考古资料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上显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学科也越分越细，而新的考古材料从出土到发表总要有一个认识和研究的过程，治史者往往不能及时利用考古资料。

(四) 综合研究

对于隋唐时期中外关系，尤其是对文化交往的综合研究并不多见，这种理论的思考要建立在对唐朝的世界地位的判定上。罗香林《唐代文化的新认识》(《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1946)通过对国际关系、法律体系、学术思想等方面的考察，高度评价了唐代文化的开创性、适应性及其所具有的世界性。邱添生《唐代文化与外来文化》

(《台湾师大学报》16,1971)探讨了唐朝对于外族的态度和外族入唐及其活动情况。李树桐《唐代四夷宾服的文化因素》(《幼狮》47:5,1978)从胡汉融合、政治制度完备等方面,说明唐朝初年国势强盛,而四夷来归。牛致功《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唐史论丛》3,陕西人民,1987)从先进的社会制度、东方文化的渊源、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等方面,说明这一问题。方亚光《从中外交往看唐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社科战线》1990.1)也从另外的角度说明唐代的地位。葛承雍《述论唐帝国的世界性》(《法门寺论文集》,陕西人民,2000)从十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葛晓音《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中国科学》1997.3)从文学的角度探讨了交流的影响。

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和晚清的中西文化冲突》(《中国社科》1986.3)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在唐代达到了它的高度发展阶段,原因在于它既能条贯折衷前此数百年的遗产,继承了汉魏南北朝以来由民族纷扰和社会动乱而流散到江南、河西等地区的中国传统文化,又能兼容并包地摄取外来的各种文化营养,使其对中国文化起补阙增色的作用。唐朝具有一整套自成体系的典章制度,因而外来的宗教、艺术等文化因素只是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未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唐代文化在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同时,出现了保守的倾向,这种倾向助长了后代封建社会的强化,把社会秩序和伦理准则过分绝对化的儒教约束了中国文化的创新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利作用。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

唐朝具有一整套自成体系的典章制度,因而外来的宗教、艺术等文化因素只是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未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

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大学报》1985.4;收入《西域史地丛考初编》,1995)对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和汇聚的最重要地区之一西域进行了重点研究,指出西域既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同时也向中原输送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宗教、艺术和某些科学技艺,中原和西域的传统文化各随自身的需要而摄取对方相应的成分。文化的交流过程是相关民族各自发挥所长进行共同创造的过程,并不等于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甚至有所取舍。他还在《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兼论山脉、沙漠、绿洲对东西文化交通的影响》(《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1985;收入《西域史地丛考初编》,1995)中指出隋唐五代时期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依然主要通过陆路,即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进行。欧亚内陆山脉、沙漠对人类文化的汇聚、贸易的开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因素,但文化的交流、文化的汇聚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民族的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民族斗争或政治斗争形势,不同民族的不同阶级往往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从中选择某些成分,并在吸取过程中加以综合改造,用以丰富自身的固有特色的文化。自然条件的影响往往和社会发展的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是地理环境支配人类的交往,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支配人类克服地理环境的障碍,寻求接触和交往。草原之路、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利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方亚光《唐代对外开放初探》(黄山,1998)阐述了唐朝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环境、物质基础、交通条件,以及开放的形式、途径和取得的成就,并对唐代社会对外开放做了历史反思。

中原和西域的传统文化各随自身的需要而摄取对方相应的成分。文化的交流过程是相关民族各自发挥所长进行共同创造的过程,并不等于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甚至有所取舍。

欧亚内陆山脉、沙漠对人类文化的汇聚、贸易的开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因素,但文化的交流、文化的汇聚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民族的社会发展。

二、与中亚的关系

(一) 通论

隋唐时期中西交往主要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的,处于交通干线上的中亚地区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包括今天中国新疆、阿富汗、巴基斯坦、原苏联中亚地区的广大领域,更是由于东西各种文化的汇聚以及和本地文明的融合,在文化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同时,这里也是周边几个强大政治势力相互争夺、控制的战略要地,不仅大唐帝国苦心经营,突厥、吐蕃、大食都曾先后在这一地区积极进取。因此,中亚地区堪称为当时世界文化交汇的中心之一,西方文化经此地东传,有时便带上了中亚的风格;中国文化也以此为开放的门户,间接地西渐。

中亚地区堪称为当时世界文化交汇的中心之一,西方文化经此地东传,有时便带上了中亚的风格;中国文化也以此为开放的门户,间接地西渐。

中亚各王国本身没有传存下来什么重要的相当于隋唐时期的典籍,自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这一地区发现了大批古代文物和多种语言的写本,从而掀起了一个中亚史研究的高潮,吸引了大批中外学者参加研讨,迄今已取得很大的成就。中亚地区气候干燥,文物古迹保存较好,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文物文书仍然层出不穷,研究也处在日益更新的进步中。

比较系统地讨论唐朝与中亚关系的著作有以下几种。沙畹(Ed. Chavannes)《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圣彼得堡,1903)收集了正史、《册府元龟》和僧人传记中以西突厥为中心的中亚史料,探讨了 6—8 世纪隋唐与西突厥及中亚的关系

史。此书对东西方学术界影响至巨,迄今仍未失去其学术价值。有冯承钧汉译本(商务,1932;中华,1958),但略有删节改订,应对照原文使用。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1958)对沙畹书有所补充和订正。吉布(H. A. R. Gibb)《阿拉伯征服中亚史》(*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纽约,1923)依据阿拉伯史料来探讨这一进程。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1936)和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68)主要是以汉文史料为基础,研究唐朝与突厥、吐蕃、大食争夺控制中亚的过程。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东京,1970)、吴玉贵《唐代安西都护府史略》(《中亚学刊》2,1987)都对有关西域的汉文史料有更为深入和系统的整理。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的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8)则对有关西突厥的唐朝、罗马、吐蕃史料作了新的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森安孝夫发表长文《吐蕃的中亚进出》(《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科篇》4,1984)、白桂思(Ch. Beckwith)《吐蕃帝国在中亚》(*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普林斯顿大学,1987)都比较系统地引入了有关中亚的藏文史料,而且特别强调了吐蕃在中亚各种政治势力角逐中的重要地位。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大,1992)利用了汉、藏、阿文文献材料和突厥碑铭、敦煌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等原始材料,对唐朝与中亚关系史中有争论的问题,做了系统的考述,使读者对七八世纪的葱岭东西、天山南北的政治形势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书后附有大事年表和王统世系及将相年表,便于查找相关史事和人物(参看荣新

江书评,《北大学报》1994.1)。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科,1998)重点研究突厥第一汗国(552—630)和西突厥汗国(611—658)与隋、唐两朝的政治关系史,在《西突厥汗国的内乱与唐朝进兵西域》和《西突厥汗国的覆亡与唐朝在西域统治秩序的确立》两部分中,对唐朝与西突厥的关系史做了明晰的论述,并且澄清了一些长期不明的疑团,如指出贞观十三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居地与唐朝扶植的泥孰系居地以伊列河(伊犁河)为界东西互换,是乙毗咄陆向东发展的结果;贞观、永徽之际西域形式的遽变原因,与唐高宗想要放弃太宗建立的"四镇"有关(参看荣新江书评,《唐研究》5,北大,1999)。

以上有关中亚史的通论著作,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以汉文史料为主要依据,所以都可视为中国与中亚关系史来读,它们基本构成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唐朝与中亚关系史的主要画面。

(二)粟特地区

粟特地区处于中亚西部丝绸之路的干线上,粟特民族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担当者。隋唐时期,他们大批进入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是中国与中亚等地区物质和精神文化交往的沟通者。因而,中文史料中有不少粟特地区的记载。白鸟库吉《粟特国考》(《西域史研究》下,岩波,1944)、蔡鸿生《〈隋书·康国传〉探微》(《文史》26,1986)、马小鹤《七一二年的粟特》(《新大学报》1986.1)、《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2,1987)、《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中亚学刊》3,1990)于隋唐时期的粟特史料

有所考释。

相对来讲，对于属于唐朝羁縻州时代的粟特本土研究不多，这也应当是唐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序雅《唐代米国、何国疏证》(《浙江师大学报》1998.6)主要是梳理唐朝的文献记载。他的博士论文《唐代文献所记中亚史地考辨》(杭州大学，1998)主要是对《大唐西域记》、《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西域传》、《册府元龟》有关粟特记载的辨析。这篇论文经修订增补，成为《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2000)一书。

利用考古资料来研究粟特与唐朝关系史，往往可以揭示一些文献材料所不明的地方。冈崎敬《中亚发现的唐镜》(《田村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1968)汇集了原苏联中亚地区发现的唐镜、金银器皿、铜钱等，说明唐朝文化对中亚的影响。影山悦子《撒马尔干壁画所见中国绘画的因素》(《西南亚研究》48，1998)指出阿夫拉西亚卜发现的壁画可以看出唐朝宫廷绘画的影响，其正壁很可能描绘的是外国使臣和康国王拂呼缦的禁卫军赭羯。对于中国钱币在粟特地区的流行和影响，近年的研究有茨马尔(E. V. Zeimal')《5—8世纪早期中古时代中亚钱币的流通问题》(*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8，1994；1996年出版)、吉田丰(Y. Yoshida)《〈中国和印度间的粟特商人〉补记》(*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 ed. A. Cadonna e L. Lanciotti，佛罗伦萨，1996)。总体来讲，有关中国文化西传粟特地区的专门研究比较缺乏，然而从前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到的材料来看，唐代中国的艺术和技法显然对粟特地区有所影响。

总体来讲，有关中国文化西传粟特地区的专门研究比较缺乏，然而从前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到的材料来看，唐代中国的艺术和技法显然对粟特地区有所影响。

粟特地区与唐朝在文化上的交往也相当丰富多彩。姜伯勤《敦煌壁画与粟特壁画的比较研究》(《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1990)探讨了敦煌唐代壁画与8世纪粟特壁画的联系。最近,他又在《莫高窟隋说法图中龙王与象王的图像学研究——兼论有联珠纹边饰的一组说法图中晚期犍陀罗派及粟特画派的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1,1996)中,研究了隋代壁画受粟特影响的问题。至于来自粟特的联珠纹织锦,见薄小莹《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联珠纹织物》(《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1990)。

近年来,有关波斯萨珊和粟特系金银器的讨论增多,一个新的进步是,越来越多的粟特银器被分辨出来。

近年来,有关波斯萨珊和粟特系金银器的讨论增多,一个新的进步是,越来越多的粟特银器被分辨出来。马尔沙克(B. I. Marshak)在《粟特银器》(*Sogdian Silver*,莫斯科,1971)一书中,讨论了粟特银器与唐朝艺术的联系,特别是对唐朝的影响。桑山正进《1956年以来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及其编年》(《史林》60:6,1977)系统整理了已出土数百件金银器的年代和地域分布,分成8世纪前半、8世纪末至9世纪初、9世纪中叶三组,并认为有些金银器与粟特银器和吐火罗地区的银器有密切关系。桑山正进《唐代金银器始源》(《*MUSEUM*》337,1979)整理新出材料,进一步强调粟特的影响。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北大学报》1992.2)考证出内蒙古李家营子辽墓出土的一组银器,当来自粟特地区,年代为7世纪后半至8世纪中叶。他由此进而探讨了经北方草原到粟特地区的丝路走向,以及粟特人在这条草原

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另外,齐东方与张静合撰《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2)系统地分析了粟特银器的类型,区分出现存的输入品和仿制品,把粟特系统的金银器与萨珊系统、罗马-拜占庭系统相区别,鼎足而三。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1996)所收《凸瓣纹银器与水波纹银器》和《七鸵纹银盘与飞廉纹银盘》两文,仔细分析了中国出土的金银器,指出其中大部分是直接或间接来自粟特,并分析了它们的花纹和工艺等问题。徐庭云《从唐代金银器看唐代民族文化》(《民大史学》1,1996)对粟特银器也有论说。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7)利用国外中古伊朗语专家协助解读的铭文含义,对每件器物做了考释。尚刚《唐代工艺美术史》(浙江文艺,1998)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和唐代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讨论了唐代金银器,特别是造型与装饰,并附录了相关史料原文。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科,1999)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和一系列已刊论文的基础上,对中国出土的粟特、波斯萨珊、罗马-拜占庭系统的金银器所作的详细的论述。全书共分三编,即"唐代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金银制造业的发展"、"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最后一编主要是讨论各类中国发现的粟特银器,和唐代金银器对粟特银器的影响,资料丰富,论证严谨,图版精美,是有关金银器的集大成之作。

粟特舞蹈对唐朝的影响早就是熟知的事实,近年来又发现了一些更为形象的材料。韩志刚《宁夏盐池唐墓

石刻所反映的胡旋舞》(《文博》1994.3)、罗丰《隋唐间中亚流传中国之胡旋舞——以新获宁夏盐池石门胡舞为中心》(《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1994)介绍了宁夏粟特人墓室所发现的舞乐资料。

(三)昭武九姓粟特人的东迁

昭武九姓粟特人以经商著称,"利之所在,无远弗至"。从北朝到隋唐,大批经商的粟特人进入中国,有的定居下来,他们不仅带来了中亚、西亚的物质文化,也带给唐朝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

昭武九姓粟特人以经商著称,"利之所在,无远弗至"。从北朝到隋唐,大批经商的粟特人进入中国,有的定居下来,他们不仅带来了中亚、西亚的物质文化,也带给唐朝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更由于这些中亚侨民的遗物和文献也大量地在中国境内出土,使这一领域成为中外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

早年,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东方杂志》27:17,1930;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1957)、桑原隲藏《隋唐时代来往中国之西域人》(《内藤博士还历记念支那学论丛》,1926;《桑原隲藏全集》2,1968)收集了传统史料中的九姓胡材料。在唐朝境内,粟特人的分布很广,两京及丝绸之路上的许多城镇,都有他们的足迹。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的康居聚落》(*Journal Asiatique*,VII,1916;冯承钧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1957)根据敦煌发现的唐抄本《沙州都督府图经》,考证出蒲昌海(罗布泊)南有一粟特人聚落。他指出,7世纪上半叶,粟特首领康艳典率人到蒲昌海南筑四城,定居下来。他还认为这里的粟特人对佛教的流传和景教的东渐都起过作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学报》专号2,1933;《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1957)对流寓长安的粟特人以及他们对唐朝文艺、宗

教等方面的影响,做了详细的研究。作者利用了出土墓志和唐人诗文材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此文也因此成为研究唐朝中西交通史的名篇。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内蒙古的粟特聚落》(*T'oung Pao*,41,1952)考察了唐代六胡州的粟特聚落。他又在《安禄山叛乱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伦敦,1955)一书中,研究了安禄山家族的来源,支持安禄山为粟特与突厥混血说,并分析了从粟特经突厥迁到营州的历程。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欧亚文化研究》1,1965;辛德勇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9,中华,1993)主要利用敦煌文书来研究敦煌的安城粟特人聚落,力图阐明这个粟特移民聚落的地位和内部结构。安城位于敦煌城东五百米处,是沙州敦煌县从化乡所在地。该乡有三个里,750年时有户三百,口一千四百人,其中大部分居民来自康、安、石、曹、罗、何、米、贺、史等中亚昭武九姓王国,聚落大致是7世纪初形成的。在安城,有当地粟特人和汉人祭祀的祆祠,佛教也在粟特人中流行。8世纪初期,聚落成员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唐地方政府对他们的统治不如对汉人严格。居民也有贫有富,由于和汉人通婚并定居农耕,几代以后,逐渐汉化。8世纪中叶,由于中亚地区唐朝与大食斗争激化,加之安史之乱和吐蕃入侵,聚落突然离散,一些人成为佛寺的农奴。到了8世纪末,除了留下祆祠外,聚落完全消失。

吐鲁番文书研究推动了对当地粟特移民的研究。姜伯勤《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季刊东西交

涉》5:1、2、3,1986;《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1994),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细心地区分出唐代西州登籍的粟特人和未登籍的粟特商胡,确定了西州崇化乡和沙州的从化乡一样,实为在籍粟特人组成的聚落。他进而比较了敦煌吐鲁番两地两种粟特人的状况。此外,他还探讨了唐朝铜钱输入粟特地区的情况和粟特“番锦”、“胡锦”输入敦煌吐鲁番的过程。荣新江《吐鲁番出土〈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校考——兼谈胡人对武周政权之态度》(《民大史学》1,1996)首先复原了大谷探险队获得的这一重要碑刻,然后分析了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和对武周政权的支持。李方《唐西州九姓胡人生活状况一瞥——史玄政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4,1999)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保存丰富资料的史玄政一生,展现了粟特人在吐鲁番的具体情况。吴震《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考古资料所见的胡人》(《敦煌吐鲁番研究》4,1999)从文献和考古两方面的资料考察当地的胡人,也主要是粟特人。

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大学报》1986.2;收入《西域史地丛考初编》,1995)指出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在唐朝达到极盛,长安、洛阳、蒲昌海、播仙镇、西州、伊州、敦煌、肃州、甘州、凉州、蓝田、范阳、营州等地都有他们的移民聚落,但对唐朝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粟特聚落,首推灵、夏二州南境的六胡州。他利用新出土的《陆胡州大首领安菩墓志》等材料,分析了六胡州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唐与突厥斗争中的角色。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民族研究》1988.3)、王北辰《唐代

河曲的"六胡州"》(《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5)于六胡州的粟特人活动有更进一步的研究。陈国灿《魏晋隋唐河西胡人的聚落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1)论说了河西走廊粟特人的状况,特别留意于这些聚落与祆教流行的关联。李健超《汉唐时期长安、洛阳的西域人》(《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号,三秦,1990)利用墓志材料考察两京的粟特人。卢兆荫《唐代洛阳与西域昭武九姓诸国》(洛阳文物工作队编《洛阳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1996)也是依墓志材料补充洛阳粟特人的情况。他还有《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考古》1986.9)一文。韩香讨论了《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民族研究》2000.3)。李志敏则有《"纳职"名称考述——兼谈粟特人在伊吾活动的有关问题》(《西北史地》1993.3)。

在粟特人东来的西域地区,由于缺少汉文史料,以往人们对这里的九姓人活动情况不甚了然。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1994;初稿载《西域研究》1993.2)利用当地出土的伊朗语文书材料,补充了于阗、楼兰、疏勒、据史德、温宿、拨换、龟兹、焉耆等地粟特人的情况。他的《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6,1999)根据文献、文书、石刻等各种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接续前文所考西域聚落,由西向东,依次描绘出且末、鄯善、高昌、庭州、伊州、兴胡泊、敦煌、常乐、酒泉、张掖、武威、原州、长安、洛阳、灵武、六胡州、太原、雁门、蔚州(兴唐)、卫州(汲郡)、安阳、魏州、邢州、定州、幽州、营州的粟特人,全面揭示了入华粟特人的

迁徙和建立殖民聚落的情况，以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加以总结提高。至于薛宗正《唐代粟特人的东迁及其社会生活》(《新大学报》1997.4)一文，没有比《西域粟特移民考》多出多少内容。

固原南郊发现隋唐时期昭武九姓史氏墓地，出土史氏墓志七方，安姓一方，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粟特人及其来历的认识。

近年，固原南郊发现隋唐时期昭武九姓史氏墓地，出土史氏墓志七方，安姓一方，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粟特人及其来历的认识。但由于这些考古材料是陆续发表的，有关其中史道德的族属问题，曾在学术界展开争论，见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5.11)、赵超《对史道德墓志及其族属的一点看法》(《文物》1986.12)、罗丰《也谈史道德族属及相关问题》(《文物》1988.8)、马驰《史道德的族属、籍贯及其后人》(《文物》1991.5)、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院学报》1992.3)、又《史道德族属问题再考察》(《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大，1993)、邓文宽《史道德族出西域胡人的天文学考察》(《法门寺论文集》，陕西人民，2000)。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史氏墓志考释》(《大陆杂志》90.5、6，1995)发表了这一组史氏及安氏粟特人墓志，其他异说已没有再讨论的必要。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1996)发表了这个粟特人墓地的所有材料，可以看出粟特人的多种文化面貌和汉化的情形。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编著《唐史道洛墓——原州考古调查报告之一》(东京勉诚，1999)发表了其后同一墓地发现的另一座粟特人的墓葬资料。罗丰从固原的材料出发，进而详细论述了《流寓中国的中亚史国人》(《国学研究》7，2000)。

河西走廊的粟特人资料较多,但有关的问题也不少。富安敦(A. Forte)《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京都,1995)和《桑原骘藏关于安国的误导和安姓》(*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6.4, 1996)否定武威安氏出自粟特安国,而认为是安息王子安世高的后人。荣新江《安世高与武威安姓》(黄时鉴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1998)对此有所批评。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3,北大,1997)更全面地研究了武威安氏的历史,并反驳了富安敦的观点。敦煌文书中有关粟特的资料更为丰富,吐蕃统治敦煌以后(786)到归义军时期(848—1036)仍有粟特人后裔在敦煌活动。郑炳林连续发表《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1996.4)、《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敦煌研究》1997.2)、《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大,1997)、《〈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3,1998)等文,陆庆夫撰《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1996.6),两人还合撰《唐五代敦煌的社与粟特人聚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1997),对这一时期的粟特人作了细致的研究,但其所用的有些史料是否是指粟特人还不能肯定。陈海涛《敦煌归义军时期从化乡消失原因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2000)从粟特人汉化和居地变迁来说明原因。

有关五代时粟特人的情况,则有芮传明《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史林》1992.3)、徐庭云《沙陀与昭武九姓》(《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

建立后唐、后晋的沙陀族中，混杂着许多粟特后裔。史称沙陀三部落之一的“萨葛”，即“粟特”的音转，又写作索葛、薛葛等。后晋皇帝石敬瑭可能就源出昭武九姓的石国，石敬瑭的曾祖、祖、父都娶粟特女子为妻。

集》，1993)两文的研究。建立后唐、后晋的沙陀族中，混杂着许多粟特后裔。史称沙陀三部落之一的“萨葛”，即“粟特”的音转，又写作索葛、薛葛等。后晋皇帝石敬瑭可能就源出昭武九姓的石国，石敬瑭的曾祖、祖、父都娶粟特女子为妻。

上述论文在考证入唐粟特人的聚落的同时，有些也探讨了他们的发展变化。粟特人在唐朝政治、经济、生活、文艺等方面的贡献，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往中的作用，也有学者做了专题研究。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文史》31，1988)考察了九姓粟特胡入贡的路线，统计出从 624 年至 772 年共入贡九十四次，以玄宗朝最多，原因是阿拉伯人对中亚地区的入侵。这些贡品主要有动物、植物、矿物、织物、器物、食物六种，其中有粟特土产，但转贩品更多，可以看出粟特人在中西贸易上起的作用。上述薛爱华《撒马尔干的金桃》一书，也涉及许多粟特的舶来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文史》35，1992)系统地条理出了入华粟特人家庭、婚姻、丧葬、居室、服饰、饮食、岁时、节庆、兴贩、胡名十方面的胡俗。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1998)进一步系统论述了昭武九姓的城邦制度和东方聚落，又补充了对九姓胡礼俗和贡品的考述，还特别钩稽了前人较少措意的毕国史事(参看荣新江书评，《唐研究》5，北大，1999)。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中国和印度间的粟特商人》(*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1996；参看荣新江书评，《唐研究》3，北大，1997)利用粟特文资料，揭示了

粟特人不仅是中亚和中国贸易的中间人，也是印度与中国之间贸易的中间人。他还具体分析了粟特文《古信札》所反映的粟特商人贸易和宗教活动的情况，并总结了粟特对中国的贡献和中国对粟特的贡献。吉田丰《粟特语资料所见粟特人的活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1《中央欧亚大陆的统合》，东京，1997)利用粟特文资料，阐述粟特人的东方活动及其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关系，并根据佛教粟特语文献，讨论了入华粟特人皈依佛教的问题。荒川正晴《粟特人的移住聚落与东方交易活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5《商人与市场》，东京，1999)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概要叙述了粟特聚落的形成和分布，北朝和隋代的聚落独立性质、构成、规模、职能和萨宝的性质，唐帝国的成立和粟特聚落的州县化、萨宝官制的变质，以及在唐朝支配下的外来粟特商人的贸易活动。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比较正确地把握粟特聚落问题的一篇概说，但有关聚落演变和萨宝的性质问题，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粟特人不仅是中亚和中国贸易的中间人，也是印度与中国之间贸易的中间人。

羽田明《粟特人的东方活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1971)概述粟特人的东迁活动及其在东西交往中的作用。芮传明《粟特人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自公元六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中华文史论丛》1985.1)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说明了这一问题。纪宗安《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暨南学报》1989.3)综述了粟特人在丝路上的殖民和活动。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1)根据墓志、经幢、碑铭等石刻材料，讨论隋唐五代时期入居中国的粟特人迁

徙和散居、婚姻、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及汉化等问题。他又有《粟特人在突厥与中原交往中的作用》(《新大学报》1994.2),论说了入华粟特人在外交上的重要性。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文献》1997.1)据《唐代墓志汇编》中的粟特人资料,概述了有关种族、婚姻、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关于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叶德禄《唐代胡商与珠宝》(《辅仁学志》15:1、2,1947)、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1987)、芮传明《唐代“酒家胡”述考》(《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3.2)、程越《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活动》(《西北民族研究》1994.1)等文讨论了入华粟特人在商业上的种种角色。利用吐鲁番新出文书来研究粟特人的商业活动,有程喜霖《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西域研究》1995.1)、冻国栋《唐代民族贸易与管理杂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9、10,武大,1988)。吉田丰、森安孝夫、新博《麹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女奴隶买卖文书》(《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Ⅳ,1988;译文载《新疆文物》1993.4)发表了属于唐朝初年的粟特文买卖奴隶契约。荒川正晴《吐鲁番出土〈麹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女奴隶买卖文书〉的理解问题》(《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Ⅴ,1989)、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9)对此续有讨论。高子华《唐代前期粟特人的经济活动》(《中外关系史论丛》4,1994)把粟特人的经济活动区分为贡使贸易和私人贸易两类。荒川正晴《唐帝国与粟特人的交易活

动》(《东洋史研究》56:3,1997)分析了粟特商人来唐朝贡的性质,并利用吐鲁番文书,阐明外来粟特商人入境、交易的实态,还从律令制的角度,把粟特人看作是唐朝羁縻州府的百姓,指出他们与南北朝时期作为外国人的粟特商胡之不同,从吐鲁番文书可以看出,粟特商人来唐朝内地交易活动的展开,是唐朝在粟特地区设立羁縻州府以后的事。

在政治方面,李鸿宾《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中央民大学报》1996.6)揭示了粟特人在唐朝的另一种角色。粟特人在政治上对唐朝的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安史之乱。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伦敦,1955)从政治、经济、种族等方面分析了叛乱背景。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7)则从种族谈到由种族聚落形成的军事力量和由共同的宗教信仰形成的凝聚力,用粟特聚落的研究成果,对安禄山叛乱提供了新的解说。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安史之乱以后,河北地区的胡化也和粟特人有关。森部丰《〈唐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志铭〉试释》(《吉田寅先生古稀纪念アジア史论集》,东京,1997)和《略论唐代灵州和河北藩镇》(史念海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1998)对此有所讨论。

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如此活跃,使得他们成为隋唐王朝与周边许多国家和民族交往的外交使者,他们在进入隋唐本土的同时,也早就进入了北方的突厥和后来回鹘汗国的领地。外蒙发现了属于突厥汗国早期的布古

特碑和属于回鹘汗国最盛期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前者用粟特文撰写，见克里雅施托尔内(S. G. Kljastornyj)与李夫什茨(V. A. Livšic)《布古特发现的粟特文碑铭新探》(*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 XXVI-1,1972；龚方震译载《中外关系史译丛》3,1986)、护雅夫《有关粟特人在突厥帝国内部作用的一条资料——布古特碑文》(《史学杂志》81:2,1972；收入《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Ⅱ,1992)、林梅村《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民族研究》1994.2)等；后者是粟特文和汉文双语镌刻，见韩森(O. Hansen)《喀喇巴尔嘎顺三体碑中的粟特铭文》(*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XLIV-3,1930)、吉田丰《关于喀喇巴尔嘎顺碑文中的粟特文部分》(《西南亚研究》28,1988)、《喀喇巴尔嘎顺碑中粟特铭文的一些新释读》(《中亚出土文书与档案论文集》，京都，1990年)都说明了粟特人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政权中所承担的书记官作用。实际上，羽田亨《漠北之地与康国人》(《支那学》3:5,1923；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1957)已经注意到突厥中的康国人。护雅夫《东突厥国家内部的粟特人》(《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Ⅰ,1975)据文献材料全面探讨了粟特人在突厥汗国中的情况。林梅村等《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欧亚学刊》1,1999)利用新释粟特文和汉文部分内容，对所记史事有新的研究。

粟特人的东来，不仅带来他们本身的粟特地区的文化，而且，他们还是西亚宗教文化的主要传播者，这在下面的有关部分加以论述。

三、与西亚的关系

(一)波斯

波斯萨珊王朝(224—651)和隋唐两朝,是丝绸之路上东西两大文明的代表。以萨珊为中心的伊朗(又称伊兰)文化与以隋唐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交流,是中古世界历史的重要篇章。应当说明的是,在国际东方学界,有与印度学、汉学等并称的伊朗学,其所包含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古代的波斯和今天的伊朗,伊朗学所讲的伊朗文化范畴极为广泛,凡讲各种伊朗语的民族历史文化,都是伊朗学的研究对象,如上述粟特人、粟特语,都被看作是伊朗文化的一个方面。所以,国外学术著作中的伊朗概念,往往包含了中亚相当大的领域。以下介绍的一些西方和日本研究伊朗文化的著作,与现代汉语中的观念不同,为了方便读者,这里还是把它们放在中国与波斯关系史下,但其内容往往更加广泛。

以萨珊为中心的伊朗(又称伊兰)文化与以隋唐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交流,是中古世界历史的重要篇章。

古代波斯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记载,早年,费琅(G. Ferrand)《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é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ks, relatifs à l'Extrême-Orient du VIIIe au XVIIe siècles*,巴黎,1913—1914;耿昇、穆根来汉译本,中华,1989)收罗了这方面的材料,并加以考释。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和波斯交往史的著作,是罗佛(B. Laufer,一译作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芝加哥，1919；林筠因汉译本，商务，1964），其主要内容是以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与伊朗之间栽培植物和产品的交流，尤重于中国对伊朗的输出。薛爱华《撒马尔干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也是以物质文明的交流为主。法籍伊朗人阿里·玛札海里（Aly Mazaheri）《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La route de la Soie*，巴黎，1983；耿昇汉译本，中华，1993）译注了有关波斯的波斯、中国、希腊罗马史料，并讨论了经丝路西传的中国谷子、高粱、樟脑、肉桂、麝香等植物材料，但其考证不够严密。

阎宗临《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山西师院学报》1958.2）、朱杰勤《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历史研究》1978.7）、威廉·沃森（W. Watson）《伊朗与中国》（*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Ⅲ（2），剑桥大学，1983；马小鹤汉译文载《中外关系史译丛》3，1986）、叶奕良《古代中国伊朗文化关系略论》（《中外关系史论丛》4，1994；《中外文化交流史》，1993）对包括唐代的中波关系都做了全面的论说。郝贵近《唐朝时期中国波斯友好往来的见证》（《世界历史》1995.3）也有论说。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全面介绍了此前发现的波斯文物材料，并探讨了相关的问题。武伯伦《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收入《古城集》，三秦，1987）介绍和研究了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反映唐代与波斯交往史的文物材料，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义宁坊的景教寺、唐《苏谅妻马氏墓志》、唐《李元谅碑》、昭陵六骏、乾陵

石人和石狮、玻璃碗、银杯、镶金牛首玛瑙酒杯、壁画上的打马球图、驯豹图、猎犬图及陶俑中的骆驼俑和牵驼俑、波斯银币等，比较全面地利用了考古文物材料，来说明唐朝与波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

1955年在西安城西土门村附近发现的汉文和波斯婆罗钵文（又译作巴利维文）合刻的《苏谅妻马氏墓志》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中国古代和波斯交往而遗留至今的重要双语文字材料。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9）确定此墓志在波斯文的东传和祆教史的研究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他还对苏氏的左神策军散兵马使一职和其生卒年月做了诠释。但他认为这是婆罗钵文传布的最东界限一点，似乎已被后来日本发表的材料所否定。对于志文本身，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2；日文见《西南アジア研究》13，1964）对两种文字都做了考释。他把此志与伊朗巴斯的一些墓志加以比较，发现二者风格一致，从而认为马氏和苏谅家的一员是萨珊波斯的遗民，并且是祆教的信徒。他推测这一家族的一员因穆斯林对波斯的进攻，由呼罗珊经毛韦拉那尔（乌浒河外），特别是粟特地区来到东方，曾在唐初的安西都护府服过兵役。马氏卒于咸通十五年（874），时年二十六岁。此后，陆续有宗德曼（W. Sundermann）与梯楼（T. Thilo）合撰《西安发现的中古波斯文汉文墓志铭》（*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 für Orientforschung*, XI-3, 1966）、哈玛塔（J. Harmatta）《西安发现的中古波斯文汉文合璧墓志铭与唐朝与萨珊的关系》（*La Persia nel medioevo*，罗马，1971）、

1955年在西安城西土门村附近发现的汉文和波斯婆罗钵文合刻的《苏谅妻马氏墓志》，在波斯文的东传和祆教史的研究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以及洪巴赫(H. Humbach)在王世平的帮助下所撰《西安发现的巴列维文汉文双语墓铭》(*Acta Iranica*,28,1988)、林梅村《唐长安城所出汉文——婆罗钵文双语墓志跋》(《西域文明》,文物,1995)等文章,发表了对该志的补充或修定意见,但有些词句的理解尚未获共识。

另一方比较重要的入唐波斯人墓志,是端方陶斋所藏的《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铭》,端方将之收录于《陶斋藏石记》并撰有跋文。羽田亨《波斯国酋长阿罗憾丘铭》(《东洋学报》3:3,1913;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1958)对铭文所记阿罗憾的生平做了考释,但发明不多。羽田亨判断阿罗憾是景教教徒,其名字的原文是Abraham。罗香林《景教徒阿罗憾为武则天皇后营造颂德天枢考》(《清华学报》新1:3,1958;收入《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也赞同阿罗憾是景教教徒,并就他在武后时参与主持造天枢一事做了详细的论述。最近,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东方,1995;又载《学术集林》4,1995,似是旧稿)又指阿罗憾为犹太人,只是用了Abraham的另一种意思而已。文章指阿罗憾即乾陵石人像中的"波斯大首领南昧",是新的假说。然而,这些学者都没有注意到榎一雄《有关唐代拂菻国的一个问题》(《北亚细亚学报》2,1944)指《阿罗憾墓志》中的拂菻为吐火罗的Khulm。富安敦《所谓波斯"亚伯拉罕"考——一个错误比定的例子》(P. Pelliot,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 edited with supplements by A. Forte,京都

与巴黎,1996)、《为阿罗憾正身——一个供职唐朝宫廷的波斯贵族》(*La Persia e l'Asia Centrale da Alessandro al X Secolo*,罗马,1996)两文也对阿罗憾做了详细的考证,他反驳把阿罗憾看作是景教徒的观点,认为出使拂菻,宣扬圣教,是指显庆三年唐朝占领西域后到中亚宣传唐朝声威,立碑地点即榎一雄所考的吐火罗地区的 Khulm,而不是东罗马。阿罗憾是 679—708 年间在华波斯人中的最高首领,摩尼教的传播和天枢的建造,都是在他任在华伊朗人首领时的事。他的原名很可能是 Vahram,与波斯王 Yazdegerd Ⅲ之子同,但难以确定是同一人,但至少阿罗憾应当出自波斯王族。

阿罗憾是679—708年间在华波斯人中的最高首领,摩尼教的传播和天枢的建造,都是在他任在华伊朗人首领时的事。

1980 年发现的波斯人李素及其夫人卑失氏墓志,是有关在华波斯人的重要资料。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2,北大,1998)初步整理了这两篇志文,并探讨了李素与波斯天文历法的输入、《景教碑》的建立的关系,对李素一家入仕唐朝的情况作了全面的论述。

1980年发现的波斯人李素及其夫人卑失氏墓志,是有关在华波斯人的重要资料。

除了两京之外,岭南的波斯人颇受瞩目。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州,1991)依据考古材料,讨论了南朝经南海丝路与东伊兰间的通商关系。王承文《唐代岭南的波斯人与波斯文化》(《中山大学史学集刊》1,1992)则探讨了波斯佛教和景教徒在岭南的活动,以及波斯香药植物等在岭南种植的情形。其最后一点,还可以参看罗香林《系出波斯之李恂及其海药本草》(《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2,1964)。

研究唐朝某地与波斯关系史的，还有蒋华《扬州与波斯》(《江苏商专学报》1990.1)、姜伯勤《敦煌与波斯》(《敦煌研究》1990.3)等。

对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的研究是唐代中波关系史的又一个重点课题。日野开三郎《关于唐代的波斯钱问题》(《石田幹之助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史论丛》，1965年)据文献材料，指出随着唐朝与西域的交往，波斯人进入中国，经营高利贷等商业活动。夏鼐在一系列考释新发现的这种钱币的文章基础上，撰《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1)，对截止到他撰文时所见到的材料做了系统的研究，对银币进行统计、分类，并分别考证出它们的铸造年代、地点、埋藏年代、用途及东传的历史背景。桑山正进《东方之萨珊式银币的再检讨》(《东方学报》54，京都，1982)对这些萨珊钱的形制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新材料也还不断出土，如罗丰《宁夏固原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述》(《故宫学术季刊》12:4，1995)介绍了固原南郊粟特人墓中出土的两枚萨珊银币和三枚东罗马拜占庭金币的仿制品。斯加夫(J. K. Skaff)《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和萨珊-阿拉伯银币——兼论其与国际贸易和地方经济的关系》(《敦煌吐鲁番研究》4，1999；英文载 *Asia Major*, third series，10:2，1998)收集并亲自观察了吐鲁番出土的银币材料，从东西方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论述萨珊银币和萨珊-阿拉伯银币在吐鲁番地区流行的时间和原因。

有关波斯萨珊和粟特系金银器的讨论，齐利万尼(A. S. M. -Chlirvani)撰《伊朗银器及其对唐代中国的影响》

(*Colloquies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No. 1,伦敦大学,1976),齐东方《中国古代的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大,1993)、齐东方与张静合撰《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2)。另外,孙机、徐庭云也有论说。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科,1999)对中国出土的粟特、波斯萨珊、罗马-拜占庭系统的金银器作了详细的论述,其中也有相当篇幅讨论中国出土的萨珊银器。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4)分析了出土唐代玻璃中的波斯和罗马制品。她在《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2,北大,1983)中,指出壁画所绘80%来自波斯和罗马。齐东方与张静合撰有《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凸出圆纹切子装饰玻璃器》(《创大亚细亚研究》16,1995;《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2,1998)。

(二)大食

大食即7世纪在西亚地区兴起的阿拉伯帝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和大唐帝国相提并论的强盛国家。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献材料,其有关东方的许多资料见载于上引费琅《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1989)中。龚方震《古代阿拉伯人记中国》(《中外关系史论丛》3,1991),对阿文材料做了概述。在这些阿文著作中,以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最为著称,其所保存的材料年代较早。宋岘将此书译出(中华,1991),并据之写有《唐代大食通中国之海道》(《中外关系史译丛》3,1986)。华涛《伊本·忽尔答

兹贝关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及其在阿拉伯——伊斯兰地理文献中的地位》(*China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ute*,福建人民,1991)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该书关于大食中国间的海上丝路。《中国印度见闻录》是另一本涉及中国的阿拉伯著作,又叫《苏莱曼东游记》,有索瓦杰(J. Sauvaget)所刊阿拉伯原本及法译对照本(*Relation de la Chine et de l'Inde, rédigée en 851*,巴黎,1948)和藤本胜次日文译本(《シナ・インド物语》,关西大学,1976),穆根来、汶江、黄倬参考上述两本,译成汉文,题《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1983)。

中文史料中留下的关于大食本身的记载不太多。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1937)、桑田六郎《〈旧唐书·大食传〉解》(《岩井博士古稀记念典籍论集》,东京,1963)考释了正史的记录。唐朝人杜环在怛罗斯战役中被俘,却因此得以亲访阿拉伯世界,写下一部行记——《经行记》。此书早佚,片段保存在杜佑《通典》中,桑田六郎《校勘杜环〈经行记〉》(《和田博士古稀记念东洋史论丛》,讲谈社,1960)有初步的辑校。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1963)做了比较详细的辑佚校注。此外,丁克家有《〈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1984年发现的《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记录了贞元元年(784)唐朝派遣内侍省内给事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从南海乘舟而行,经过万国,如期返回的经历。张世民据此撰成《中国古代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杨良瑶》(《唐史论丛》7,陕西师大,1998)一文。

唐与大食最著名的直接接触是以唐军失败而告终的

1984年发现的《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记录了贞元元年(784)唐朝派遣内侍省内给事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从南海乘舟而行,经过万国,如期返回的经历。

怛罗斯之战。自此以后,加之唐朝内部出现了安史之乱,唐朝势力渐次退出西域,大食东进,伊斯兰教也逐渐在中亚占统治地位。有许多学者撰文探讨怛罗斯之战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其影响,较早的一篇是白寿彝《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收入《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1982)。文章详细分析了高仙芝在石国的所作所为及其战败的过程,认为唐朝对西域霸权的没落在怛罗斯之战以前就有迹象显现,战后唐朝势力并未马上绝迹于西方,战争的结果改变了西域政治关系,使唐朝与大食在中亚霸权消长表面化。他认为这次战役对唐和大食国本身的关系影响并不显著,而且,这次战争带来了两个偶然的后果,即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和伊斯兰教教义开始有了中文记录。有关怛罗斯战役的具体考证,以前嶋信次《怛罗斯战考》(《史学》31:1、2、3、4;32:1,1958—1959;收入《东西文化交流的诸相》,同书刊行会,1971)为详。卢苇《唐代中国和大食在中亚地区斗争的发展和变化》(《西域史论丛》2,新疆人民,1985)试图从当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导出唐朝和大食在中亚地区关系转变的规律。他认为唐代中国和大食在中亚的斗争经历了7世纪下半叶、8世纪上半叶和8世纪下半叶三个阶段,其发展脉络是矛盾冲突开始、激烈复杂到矛盾转移到大食与吐蕃的对抗,故其与唐朝保持了友好关系。

8—15世纪是中阿两地通过陆路、海路频繁往来,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不断交流,中国的造纸术、火药等重大发明藉以西传的伟大时代。前嶋信次《东西文化交流的

诸相》(1971)收录了作者有关唐朝与阿拉伯文化交流的一些论文,如《唐文化与阿拉伯文化》、《杜环与库法——中国古文献中所见西亚情况的研究》、《里海南岸诸国与唐朝的交往》、《有关黄巢之乱的阿拉伯语史料价值》、《阿拉伯医学与中国医学》等。三上次男《唐三彩与伊斯兰陶器》(《东洋学术研究》8:4,1970)探讨了两者的联系。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收入《西域史地丛考初编》,1995)首先考释了阿拉伯之被称作“大食”,是由于唐朝采用了中介语言即波斯语来指称阿拉伯的缘故。由于穆罕默德·本·卡西姆和悉底波·并波悉林于713年前后在印度西部边境和中亚地区建立了阿拉伯人的统治,所以在8世纪上半叶,唐朝、吐蕃、突骑施、大食在中亚地区屡次发生错综复杂的纠葛与冲突;商业的发达导致阿拉伯人在海外的势力增长。8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取代犹太人、波斯人、印度人而取得了海上优势;唐朝的长安与阿拔斯朝的巴格达是当时世界上的两大文明中心。他还考述了一些唐代阿拉伯来华人物和中国去阿拉伯世界的人员的事迹。马文宽《从考古资料看中国唐宋时期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1,科学,1994)详细叙述了中国发现的钱币、玻璃、陶瓷、建筑遗物及石刻和伊斯兰世界出土的唐宋中国的陶瓷、钱币、铜镜、纺织品,并讨论了双方的联系和伊斯兰教传入的问题。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考古》1990.12)考察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陈炎《阿拉伯世界在陆海“丝绸之路”中的特

8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取代犹太人、波斯人、印度人而取得了海上优势;唐朝的长安与阿拔斯朝的巴格达是当时世界上的两大文明中心。

殊地位——兼论中国同阿拉伯之间的文化交流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朱杰勤教授纪念论文集》,广东高教,1996)除概述交往外,还探讨了中阿间的科技交流和中国瓷器、阿拉伯香药对对方的影响。加法尔(Gaafar Karrar Ahmed)《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唐研究》5,北大,1999)也全面地阐述了中阿关系史。

20世纪60年代,在西安市西窑头村晚唐墓中,出土了三枚阿拉伯金币,这是今天人们知道的中阿陆地往来的最早实物证据。夏鼐《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认为这三枚金币铭文属东方系统,大概铸造于大马士革,时间分别是702年、718/719年、746/747年。

阿拉伯势力的东进推动了伊斯兰教东渐,上引白寿彝《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已经讨论到伊斯兰教的传入问题。关于伊斯兰教的传播,田坂兴道在一系列研究论文基础上,形成《回教的传入中国及其弘通》(东洋文库,1964)一书,对伊斯兰教的传入做了详细的考查。张日铭《唐代中国之伊斯兰教徒》(*Les Musulmans sous la Chine des Tang 618—905*,台湾成文,1980)对此也有研究。他还用中文发表过《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唐大食关系之研究》(《食货月刊》复刊5:9,1975)。陈伯炼《唐与大食关系初探》(《思与言》17:4,1979)简述了唐朝与大食间的贸易、朝贡关系和对西域的争夺。唐中叶以后,大批阿拉伯人从陆路和海路来中国,特别是随着阿拉伯势力在印度洋上占据优势,中国和阿拉伯间的海上航线通畅,更有大量阿拉伯人来到东南沿海。他们组成蕃坊,有一定的自主

唐中叶以后,大批阿拉伯人从陆路和海路来中国,特别是随着阿拉伯势力在印度洋上占据优势,中国和阿拉伯间的海上航线通畅,更有大量阿拉伯人来到东南沿海。他们组成蕃坊,有一定的自主权,居民以商人为主,大多信仰伊斯兰教。

权，居民以商人为主，大多信仰伊斯兰教。秦惠彬《大食同中国唐朝的军事接触以及伊斯兰教的东渐》(《世界宗教研究》1987.1)通过对大食帝国同中国唐朝的几次重要的军事冲突以及其在唐朝的军事存在等史实的研究，揭示了伊斯兰教向我国西北渗透的一般特点，认为应该把在中国境内有中国人信仰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并据此提出唐肃宗至德二年传入说(757)，可作一家之言。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有穆宝修《唐宋时期穆斯林的来华和留居》(《云南社科》1985.5)、宋岘《唐代扬州的大食商人》(《中华文史论丛》1987.1)、赖存理《唐代"住唐"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待遇和生活》(《史学月刊》1988.2)、范邦瑾《唐代蕃坊考略》(《历史研究》1990.4)等等。

(三)西亚宗教的传播

隋唐时期，虽然儒释道三家仍然占据了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国家开放，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产生或流行于西亚的三种宗教，即祆教、摩尼教、景教也都在此时传入中国，或多或少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

隋唐时期，虽然儒释道三家仍然占据了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国家开放，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产生或流行于西亚的三种宗教，即祆教、摩尼教、景教也都在此时传入中国，或多或少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4，北大，1998)大体上按时代顺序讨论了唐朝的政策，从安史之乱影响统治者的意识来说明武宗灭法的原因。他的《唐季"大秦穆护祆"考》(《文史》1999.3、4)，辨析会昌灭法涉及景教和祆教，而不包括回教。荣新江《〈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与弥施诃——吐蕃文献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来历》(王尧编《藏学研究丛刊·贤者新宴》，北京，1999)揭示了四川佛教禅宗史书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史料，并由此讨论了摩尼教和景教入藏的问题，以及安史之乱后各宗教势

力的消长和斗争。李玉昆《唐洛阳三夷教》(《洛阳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1999)对三夷教在洛阳的流传做了简单的叙述。

1. 祆教

祆教又称火祆教、拜火教,是唐朝对流行于中亚和中原地区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称呼。林悟殊《20 世纪中国琐罗亚斯德教研究述评》(《欧亚学刊》2,2000)对中国的祆教研究有详细的评述,本节则偏重于从历史的角度来叙说。

固然清末文廷式等人已经在读书笔记(《纯常子枝语》)中谈到祆教在华的传播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第一篇系统的研究论文是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北大《国学季刊》1:1,1923;1934 年校订本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1980),他根据正史有关西域诸国俗事天神的记录,认为火祆之名闻中国,自北魏南梁始,北魏灵太后所祀之胡天神就是祆神。自波斯被大食所灭,祆教徒被迫东奔,唐朝以礼待之,因而两京和碛西各州设祆祠,最早的祆祠是西京布政坊西南的祆祠。他还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的异同,如对寺庙的称呼,景教、摩尼教称寺,祆教则称祠。祆教徒来中国并不传教,亦不译经,教徒只有胡人而没有汉人。他考证了祆教在唐朝的流行和会昌时的灭绝情况,其结论影响极广。此后,神田喜一郎《祆教杂考》(《史学杂志》39:4,1928;收入《神田喜一郎全集》Ⅰ,同朋舍,1986)、《祆教琐记》(《史林》18:1,1933;收入《神田喜一郎全集》Ⅰ)和石田幹之助《祆教丛考》(《史学杂志》39:6,1928;收入《东亚文化史丛考》,东洋文库,1973)补充了

一些唐宋笔记、行记、词曲中的材料,可以考见祆教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那波利贞《祆庙祭祀小考》(《史窗》10,1956)从祭祀的角度,通盘解说了北朝至元代的祆教史料,特别是澄清了长安和敦煌祆祠的有关记载。饶宗颐《穆护歌考——兼论火祆教、摩尼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年纪念文集(下)》,香港,1978;收入《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1982)指出唐宋诗词中的"穆护"即火祆教僧人,波斯文作 Mogu 或 Magi;《牧护歌》为祆教赛神曲。由此出发,对北朝至唐宋时期祆教在华的流行状况,做了进一步的论说。他涉及到了敦煌吐鲁番新出史料,较陈垣文更为广泛。附录有火祆祠见于史籍之地理分布记略,颇为明晰。林悟殊《唐人奉火祆教考辨》(《文史》30,1988;《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1995)对陈垣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火祆教译经虽未发现,但其徒众在中国是以口头相传的方式传教,唐代祆教拥有中国人信徒。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3,1995)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伊朗语文书,论证祆教早在 4 世纪初就由粟特人带到中国;至于北朝隋唐文献和文书中的"天神",则指祆神无疑。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1996.4)认为敦煌藏经洞发现了一部粟特语祆教残经(Or. 8212/84,原编号为 Ch. 00289)其年代甚至早于敦煌汉长城遗址发现的粟特文古书信(约 3—4 世纪),是现存最早的粟特语文献。事实上,当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在《英国图书馆藏粟特文残卷》中转写翻译这个残卷时,指出残卷中虽有丰富的琐罗亚斯德

祆教早在 4 世纪初就由粟特人带到中国,北朝隋唐文献和文书中的"天神",则指祆神无疑。

教的知识，甚至头两行文字是祆教祈祷文的抄本，但综合各种因素，把这件残卷看作是摩尼教经更为合适（*Indo-Iranian Journal*, 18, 1976）。林文中所讨论的其他早于古信札的内容，则属于西域范围。

近年来，祆教问题重新引起热烈的讨论，主要原因还在于吐鲁番新史料的发现。1977年，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合撰《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3）提示了吐鲁番高昌国时代文书中的“丁谷天”、“胡天”以及安伽勒克古城发现的佛经题记中的“城南太后祠下胡天”，指的都是祆教祠。此后，唐长孺《新出吐鲁番文书发掘整理经过及文书简介》（《东方学报》54，京都，1982；收入《山居存稿》，中华，1989），也重述了这一看法。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对这些吐鲁番新出土的材料做了通盘的解说。他把属于麴氏高昌国时代（502—640）的文书中的“丁谷天”、“胡天”、“诸天”、“天”，都解释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他还指出《高昌永平二年（550）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中的“萨薄”，即高昌国专门管理和监督火祆教的官员。对此，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4；收入《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新文丰，1995；又英文本载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3, 1992）把高昌帐历中所祀之天，解释为高昌地区对天体自然崇拜的传统信仰，他认为目前考古材料中没有发现火祆教经典、寺庙遗迹、文书记录等，因此正史所记高昌国所俗事的“天神”，也并非祆教。林悟殊所要强调的是，高昌国不是没有人信奉火祆教，而是没有普遍信奉这种宗教。针对此

文,王素又发表《也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8.3),重申自己的天神指祆教的观点。对于高昌的"天神",陈国灿《从葬仪看道教"天神"观在高昌国的流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9、10,武大,1988年;收入《吐鲁番学研究专辑》,乌鲁木齐,1990)又把高昌的"俗事天神",指为当地普遍存在的崇信道教天帝神的习俗。林悟殊、陈国灿两氏对传统所认为的"天神"即祆神或祆祠的看法提出质疑,如果他们的观点成立,则动摇了自陈垣以来所有关于祆教入华的论说。然而,他们在建立自己的学说时,没有对涉及"天神"的史料作全盘的解说。因此,大多数学者仍然把史籍和吐鲁番文书中的"天神"、"天"、"胡天"等,解释为祆神或祆祠。特别是把高昌的官职萨薄与天神结合起来考虑时,就更容易理解了。对此作出最为透彻解说的是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又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1994年),他几乎涉猎了所有重要的与祆教有关的史料,论证高昌之萨薄即伊兰胡户聚居点上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高昌之天神,即主要由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吐鲁番供祀文书中的"阿摩",即粟特文Adbag"大神"的对音,系指祆教大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此文以《高昌胡天祭祀与敦煌祆祀》为名收入《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科,1996)一书时,对一些细节有所补充。张广达《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敦煌吐鲁番研究》4,1999),据瑣罗亚斯德教的教义,来解释前人已经找出的吐鲁番文书中的祆教因素,如对狗的崇敬和三神一组的祆教图

高昌之萨薄即伊兰胡户聚居点上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高昌之天神,即主要由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吐鲁番供祀文书中的"阿摩",即粟特文Adbag"大神"的对音,系指祆教大神阿胡拉·马兹达。

像在高昌存在的可能性。

祆教在唐朝流行的范围主要在西域和北方地区。

西域祆教的情形，龚方震《西域宗教杂考》(《中华文史论丛》1986.2)所论范围包括祆教。周菁葆《西域祆教文明》(《西北民族研究》1991.1)所述尚不全面。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1996.4)，利用考古资料，阐述了祆教在西域的流行。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高教，1997)也论述了祆教在西域的传播。

陈国灿《魏晋隋唐河西胡人的聚落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1)论说了河西走廊粟特人的状况，对祆教在河西的流行有系统的研究。魏礼(A. Waley)《有关敦煌地区伊朗神庙的几条记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28,1956)揭示了敦煌文书所记当地祆祠和赛神的情况。小川阳一《敦煌的祆教庙祭祀》(《东方宗教》27,1966)讨论了祆庙位置、祭祀的时间和费用及目的等问题。刘铭恕《敦煌遗书杂记四篇》之一《敦煌遗书中所见之祆教》(《敦煌学论集》,兰州,1985)对此也有论列。而通盘的论说当推上引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他发现敦煌的祆祠赛神已被纳入中国的传统祭祀活动当中，使人们认识到祆教对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由于富安敦(A. Forte)《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出处见上)和《桑原骘藏关于安国的误导和安姓》(出处见上)否定武威安氏出自粟特安国，而认为是安息王子安世高的后人，这样，原本是与祆教相关联的萨宝家族，变成了佛教高僧的后裔。荣新江《安世高与武威安

姓》(黄时鉴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1998)对此有所批驳。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3,北大,1997)更全面地研究了武威安氏的历史,也不同意富安敦的观点。

早年,向达在伯希和、桑原隲藏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长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学报》专号 2,1933;《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1957),专门探讨了长安的祆教流行情况。作者利用了米萨宝墓志和《西溪丛语》补充了崇化坊的祆祠记载,并探讨了祆祠的内部情况。青木和子《唐代长安的祆教寺院》(《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17,1978)认为醴泉坊的波斯胡寺是正统的祆教寺院,而布政坊的胡祆祠是中亚系玛兹达教的寺院,还讨论了祆祠与景教寺院的区分问题。林悟殊写有《唐代长安火祆大秦寺考辨》(《西北史地》1987.1;《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1995),考证长安的祆祠除一般所讲的布政坊、醴泉坊(西北隅)、普宁坊、靖恭坊四所外,还应补上醴泉坊(街南之东)为波斯王卑路斯所立之寺和崇化坊祆寺,而见于史籍的大秦寺只有义宁坊一所,他不同意陈垣把为卑路斯所置之寺看作是大秦寺的观点。对于唐代长安等地波斯系统的祆祠、大秦寺、摩尼寺以及伊斯兰教清真寺的更详细的探讨,是莱斯利(D. D. Leslie)《唐代的波斯胡寺》(Monumenta Serica, 35, 1981—1983)。彭树智《唐代长安与祆教文化的交往》(《人文杂志》1999.1)主要探讨长安考古材料所见的祆教遗迹。

1955 年在西安城西土门村附近发现的汉文和波斯婆罗钵文(又译作巴利维文)合刻的《苏谅妻马氏墓志》,引

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中国古代和波斯交往而遗留至今的重要双语文字材料，也是入华波斯人信仰祆教的实物证据（见上波斯部分）。

张乃翥《中原出土文物与中古祆教之东浸》（《世界宗教研究》1992.3）对洛阳等地祆教的流行有所阐述。

祆教在唐朝民间流行颇广，影响也十分广泛。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7）从分析安禄山的粟特种族特征和他所处部落的祆教信仰所形成的凝聚力，来揭示安禄山叛乱的宗教背景，提出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的新解说。林悟殊撰《火祆教在唐代中国社会地位之考察》（蔡鸿生编《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教，1998）指出祆教在唐代中国社会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他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中国古代的祆神崇拜》（《欧亚学刊》1，1999）则认为祆教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不同，唐人之信奉祆教，只是对西域胡俗的接受，而不是对宗教的接受。

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科院，1998）是第一部用汉文所写的系统祆教史，其中尤其用较多篇幅论述了祆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包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乏新意。

从已经出土的文物中来考察祆教因素，是近年来的另一个研究趋向。施安昌《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纹饰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2）、《北魏苟景墓志及纹饰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2）以为这些墓志纹饰上表现的图像，有祆教的色彩，部分神名也可能是伊朗语的音译。他还发表《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故宫博物院藏建

筑型盛骨瓮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2),重新讨论著名的安阳出土粟特石棺床,并介绍了故宫所藏盛骨瓮,其上有胡人形象。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画像石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美术》(《艺术史研究》1,中山大学,1999)对这个石棺床的祆教图像做了详细的解说。1999年,山西太原发现的虞弘墓石椁和2000年陕西西安发现的安伽墓石屏,富有粟特系祆教图像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参看《文物》2000年第1期发表的两墓简报)。

1999年,山西太原发现的虞弘墓石椁和2000年陕西西安发现的安伽墓石屏,富有粟特系祆教图像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中国所出另一个祆教图像是姜伯勤发现的敦煌白画。1988年,姜伯勤比定刊布了一幅原被当作佛画的祆教图像,撰写了《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1990;又《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1994)。张广达《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Etudes chinoises*, XIII-1/2, 1994;汉文本刊《法国汉学研究》1,1996)利用原苏联中亚地区出土的绘画材料,确定此图上的一神为祆教神谱中的女神娜娜(Nana)。张广达《唐代祆教图像再考》(《唐研究》3,北大,1997)进一步论证这幅敦煌白画上的形象很可能是祆教善神妲厄娜(Daēna)和恶神妲厄娲(Daēva)。格瑞内(F. Grenet)和张广达合撰《粟特宗教的最后避难地——九、十世纪的敦煌》(*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10, 1996)结合文献和绘画,说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祆教仍在流行。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粟特神祇图像的再考察》(《艺术史研究》2,2000),同意 Daēna 的比定,但确定另一幅神像是女神娜娜。

张广达《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中的又一例证,是据粟特本土出土的骨瓮,来说明唐代太原所遗留的祆教徒葬俗。林悟殊《火祆教的葬俗及其在古代中亚的遗痕》(《西北民族研究》1990.1;《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1995)则是用敦煌发现的《佛说十王经图》上所绘的尸葬方式,来论证同一问题。前揭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文史》35,1992)也谈到粟特人的祆教葬俗。西域地区骨瓮的遗存,见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1996.4)。

"萨宝"的性质是近年来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姜伯勤《萨宝府制度论略》(《华学》3,1998)、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唐研究》4,北大,1998)两篇同时发表的文章,观点并不相同,前者认为萨宝是伊兰系胡人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属下有祆正等主管祆教事务的官员。后者则认为萨宝所管包括所有宗教,特别是佛教,以及其他商业贸易事务等。最近,富安敦(A. Forte)《萨宝问题》(*The Silk Roads Nar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97*,Record No. 4,1999)和《中国的伊朗人》(*Cahiers d'Extreme-Asie*,11,1999—2000)、芮传明《"萨宝"的再认识》(《史林》2000.3)都与罗丰的看法相近。但是,这一问题还有待从语言学、历史学的角度深入探讨,笔者倾向于姜伯勤的看法。

祆教的"祆",古籍中常常与"袄"相混,即使是今天的学者也难以避免。林梅村《从陈硕真起义看火祆教对唐代民间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3.2)认为记载此次起义的《崔玄籍墓志》中的"袄"为"祆"字。王永平《论唐代

民间道教对陈硕真起义的影响——兼与林梅村同志商榷》(《首都师大学报》1995.1),据图版订正此字原为“祆”字无疑,而林文引此志时所删的“破张鲁于汉中,殄卢循于海曲”两句,恰好证明陈硕真起义的道教色彩。他还对祆教在唐代流行状况做了估价。

2. 摩尼教

摩尼教是产生于波斯的另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它传入中国较晚,武周延载元年(694)才正式入华,但此后传播较祆教广泛,影响更为深远,宋代以后与中国秘密会社结合,对下层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摩尼教在波斯本土受到迫害,早已灭绝。但由于该教从一开始就注意向外传教,所以在中国和非洲留下了丰富的资料,近代以来不断出土,迄今不绝。1904 年,当德国第一次吐鲁番探险队的收集品运抵柏林后不久,缪勒(F. W. K. Müller)就发表《新疆吐鲁番出土福音体文字写本残卷》(I, *APAW* 1904; II, *APAW* 1904,Abh. 2)一文,对其中的一些摩尼教中古伊朗语文献做了初步解读。此文开辟了 20 世纪摩尼教研究的新纪元。此后,随着吐鲁番敦煌各种语言文字的摩尼教文献的不断出土,掀起了世界范围的研究摩尼教热潮。

蒋斧《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敦煌石室遗书》,1909)是第一篇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虽然对史料的理解不够准确,但他把史籍和敦煌文书的记载做了初步整理,功不可没。沙畹(Ed. Chavannes)与伯希和(Pelliot)合撰之《中国发现的摩尼教经典》(*Journal Asiatique*, X ser., 18,1911;XI ser.,1,1913;冯承钧译后一部分为《摩尼教

流行中国考》,商务,1931 年单行本;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1958)收集了大量汉文典籍中的材料,加上新发现的敦煌文书,是研究摩尼教流行中国的奠基性著作。他们系统地考述了摩尼教在唐宋时代的中国的流行与遭际,其传入漠北回鹘汗国的时间以及安史之乱后借助回鹘而在唐朝盛行的情形。大历三年(786)摩尼教在回鹘取得国教地位,唐人因依赖回鹘而重视摩尼教。会昌初年,由于回鹘败亡,唐朝对摩尼教徒也进行迫害,摩尼教转入民间,与秘密会社关系密切。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学术杂志》11,1921;收入《观堂别集》1)在沙畹和伯希和文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晚唐和宋元文献材料,把摩尼教首次入华的年代,定在《佛祖统纪》所记的武后延载元年(694)。又提出会昌诏毁摩尼教后,福建等地仍有摩尼教徒,而且其来源是海上商胡的传播。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1:2,1923;修订本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1980)也是系统收集汉文摩尼教史料的集大成之作,发表时沙畹和伯希和文尚未译成中文,因而在国内影响更大。陈文的主要看法大多与沙畹与伯希和文相类似,但在有关宋代福建摩尼教部分,利用了新发现的《闽书》的记载;修订本中又增入胡适提供的《崇寿宫记》一条,见《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古籍,1990)。重松俊章《唐宋时代的末尼教与魔教问题》(《史渊》12,1936)对延载元年摩尼教入华说提出质疑,认为民间的流传可能要早到六朝末期。又指出由于唐代以来泉州等南方港口外国人留居地治外法权较为宽大,故此摩尼教徒选择了这里作为传教之地。

自3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摩尼教研究，重点在于宋元明时期，特别是吃菜事魔和明教与摩尼教的关联问题。而泉州发现的宗教石刻材料，为这些讨论注入了活力。80年代以来，唐五代摩尼教史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一方面是对唐代摩尼教有了新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对高昌回鹘摩尼教的研究有所突破。

关于前一方面，先后出版了刘南强（S. N. C. Lieu）《晚期罗马帝国和中古中国的摩尼教史概说》（*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A Historical Survey*，曼彻斯特大学，1985）、翁拙瑞（P. Bryder）《摩尼教在中国的转变——汉文摩尼教术语研究》（*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Manichaeism：A Study of Chinese Manichaean Terminology*，隆德，1985）、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1987）。刘著对摩尼教在中国流行历史的概述发明不多，但他和翁拙瑞一样，都利用了西方学者解读吐鲁番伊朗语摩尼教文献的研究成果，对汉译摩尼教文献的术语提出新的解释。两人都认为，在表面上看来有着佛教强烈影响的摩尼教词汇，实际上非常忠实地表达了伊朗摩尼教思想，因而对传统所说的摩尼教华化问题表示异议。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是一部迄今为止研究摩尼教入华历史的最为详备的专著，作者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大量研究论文的基础上，撰成此书，对摩尼教理论、传播、仪式、在华遗址、流传情况以及在回鹘人中的作用、变化等方面，都做了深入探讨，并介绍了20世纪以来摩尼教资料的新发现及其研究概况，附录了敦煌

发现的三种汉译摩尼教经典的录文，即《摩尼教残经一》、《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部赞》，以及摩尼教研究文献目录。书中所收相关的论文《摩尼的二宗三际论及其起源初探》和《早期摩尼教在中亚地区的成功传播》，认为摩尼教体系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自始至终贯穿着善恶二元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摩尼教中远比琐罗亚斯德教中彻底。由于摩尼的教义否定现存制度，对未来的光明抱有必胜的信念，因而适合了苦难农民的精神需要，得到许多人的信仰。摩尼教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不仅由于其教徒自觉实践教主的世界宗教思想，而且也因为当时中亚城邦林立，摩尼教又有其灵活性和适应性，切合了当时中亚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认为早在 4 世纪初，摩尼教已经进入中国，延载元年拂多诞来华只是标志着摩尼教在中国得到官方的承认，开始公开传播。至于唐代流行的摩尼教的来源，应该是直接渊源于具有浓厚佛教色彩的中亚摩尼教团，并使这个教团的佛教色彩进一步加强。关于敦煌本《老子化胡经》，陈垣认为老子化摩尼的经文是天宝以后才有的，他还把这段经文作为唐朝道家依托摩尼教的根据，以为“晋时佛法盛，故《化胡经》托于佛；唐时摩尼教盛，故《化胡经》复托于摩尼”。福井康顺《道教的基础研究》(东京，1958)认为《老子化胡经》卷一的造作年代在开元年间，并认为是当时的摩尼教徒假托古来的《老子化胡经》伪造的。林悟殊《〈老子化胡经〉与摩尼教》认为并非如此，而是道家窃取摩尼教的思想材料，增加自己经典的力量。后来到了宋代，道教立于正统，摩尼教徒反过来又利用了《化胡经》。他指出，古代

摩尼教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不仅由于其教徒自觉实践教主的世界宗教思想，而且也因为当时中亚城邦林立，摩尼教又有其灵活性和适应性，切合了当时中亚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

唐代流行的摩尼教的来源，应该是直接渊源于具有浓厚佛教色彩的中亚摩尼教团，并使这个教团的佛教色彩进一步加强。

各种宗教思想互相渗透、吸收、混杂和相互利用是一普遍规律。关于回鹘奉摩尼教的时间，根据《九姓回鹘可汗碑》，一般认为在唐宝应元年(762)之后。至于回鹘为何选择摩尼教为国教，《回鹘奉摩尼教的社会历史根源》提出，原因在于回鹘依靠粟特人发展与东西方的贸易，以充实国库，因而在国家事务和宗教信仰上也就不得不受粟特人的左右，粟特人在回鹘地位稳固时，摩尼教被立为国教，而粟特人受到排挤时，摩尼教的地位也相应降低。他还写了《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认为摩尼教徒在封建化过程中，行动上背离了摩尼古训，修改了经典，渐渐地世俗化了。《唐宋〈三际经〉质疑》否定沙畹与伯希和关于中国摩尼教徒有《二宗经》和《三际经》两部汉文经典的论断，认为当时摩尼教流行的是《二宗三际经》，简称《二宗经》，并不存在《三际经》。敦煌写本P.3847中提到的《三际经》是景教经典。《摩尼教〈下部赞〉汉译年代之我见》，推断译出的时间不晚于会昌，应当在大历三年(768)和会昌二年(842)之间。关于最后一点，虞万里撰《敦煌摩尼教〈下部赞〉写本年代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1，北大，1996)，据避代宗讳字，考证此本写于代宗宝应二年(763)以后。

林著在摩尼教华化的问题上显然与上述刘南强和翁拙瑞的看法相左，他最近出版的克里木凯特《古代摩尼教艺术》翻译增订本(台北淑馨，1995)中，有《从福建明教遗物看波斯摩尼教之华化》一文，于此略有申论。王见川《从摩尼教到明教》(新文丰，1992)也有相当的篇幅论述此点。但两人主要视点为明教，而非刘、翁所论之唐代摩

尼教,因此,摩尼教的华化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据《九姓回鹘可汗碑》,帮助唐朝收复两京的回鹘牟羽可汗,在洛阳皈依了摩尼教,摩尼教由此传入漠北,借助粟特人的势力,得到广泛的传播,但时而也受到忠于回鹘原始宗教的一派的强烈抵抗。田坂兴道《回纥的摩尼教迫害运动》(《东方学报》11,东京,1940),已对顿莫贺时期打击摩尼教徒的情况做了考证。关于摩尼教在回鹘的情形,除了上引林悟殊的论文外,尚有艾尚连《试论摩尼教与回鹘的关系及其在唐朝的发展》(《西北史地》1981.1)、杨圣敏《试论回纥宗教思想的演变与改宗摩尼教》(《西北史地》1985.3)、陈俊谋《试论摩尼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央民院学报》1986.1)、杨富学与牛汝极合撰《牟羽可汗与摩尼教》(《敦煌学辑刊》1987.2)等。

840年回鹘西迁天山东部地区,不久即以高昌(唐西州、今吐鲁番)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亦称西州回鹘。原本已经是摩尼教流行区的吐鲁番,由于回鹘人的大量入居,一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盛的摩尼教中心。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吐鲁番地区发现大量的中古伊朗文和回鹘文的摩尼教文献。荣新江《敦煌吐鲁番出土中古伊朗语文献研究概述》(《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1993年)对其中的伊朗语文献做了详细的介绍。但由于这类文献中世俗文书贫乏,所以多年来有关的高昌回鹘摩尼教史的研究进步不大。

黄文弼在20世纪20年代得自吐鲁番的一件重要的回鹘语文书,耿世民在《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4;修订收入《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

人民,1983;又英文本载 *Central Asiatic Journal*,XXXV-3/4,1991)中,做了全文转写和翻译。耿世民还与克里木凯特(H. J. Klimkeit)发表《吐鲁番摩尼教寺院的毁坏》(*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8,1985),合刊德藏 M. 112 背面文书,其中记载了把摩尼教寺院改造为佛寺的情况。森安孝夫《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31/32,1991),通过对吐鲁番柏孜克里克保存的摩尼教洞窟遗迹和高昌故城等处出土的摩尼教文书的艺术、语言、历史等方面的详细研究,特别是对上述两件回鹘文摩尼教世俗文书的细致分析,比较完整地揭示了 9—11 世纪初摩尼教在西州回鹘时期的兴盛与衰亡的过程。宗德曼(W. Sundermann)《有关吐鲁番地区的吐鲁番出土伊朗语摩尼教文献》(*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1992)从吐鲁番出土伊朗语赞美诗、题记、供养人题名、书信、文书、词汇表等材料中,发掘出一些零星的但却是很重要的摩尼教史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被作者看作是 1007—1019 年在位的回鹘可汗的资料,其某些看法与森安孝夫上引文不尽相同。另外,晁华山《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中国文化》8,1993;英文本载 *Monumenta Serica* 44,1996)初步报道了他在吐鲁番地区考察摩尼教洞窟的收获,据称,在吐峪沟、胜金口、柏孜克里克三大石窟群中,总共确定出三十多个摩尼教洞窟,这些洞窟分组连在一起,构成一所所摩尼教寺院,其形制与《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所记的寺宇仪完全相同。但由于这些摩尼教寺院或则塌毁严重,或则壁画被佛教壁画蒙住,要最终确定这些具有佛教摩尼教二重性的石窟变迁情况,尚有

由于这些摩尼教寺院或则塌毁严重,或则壁画被佛教壁画蒙住,要最终确定这些具有佛教摩尼教二重性的石窟变迁情况,尚有待于科学的考古发掘。

待于科学的考古发掘。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刘东编《中国学术》1,商务,2000)从文献、考古和历史背景,论证摩尼教在高昌的真正发展,大约在803年佛教势力削弱以后。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1998)收录了他有关回鹘摩尼教的论文,其中《敦煌本突厥文 Ïrq 书跋》,把这篇前人称之为《占卜书》的写本论证为摩尼教文献,并据题记认为9—10世纪间敦煌存在一处回鹘摩尼教寺院(《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4)。文书题记所说寺院的地点似难确定,但内容很可能是摩尼教的。

3. 景教

位于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唐代基督教流行中国的最好历史见证,自明末出土以来,受到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热烈关注,近代中外学者对它进行了反复考证和研究。在此不可能将有关景教碑的百余种研究文献一一列举,只将东西方最为重要的和较新的研究成果表出。西文方面,以夏鸣雷(P. Havret)三卷本《西安府发现的基督教碑铭研究》(*La Stele Chretienne de Si-Ngan-Fou*,上海,1895—1902)最为详赡。而佐伯好郎(P. Y. Saeki)《中国景教碑文研究》(*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伦敦,1916)因系英译,影响更为广泛。中文著作中,冯承钧《景教碑考》(商务,1935)汇集了清儒和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有碑文校录和唐代景教史研究。较新的研究成果,有伯希和著、多维利埃(J. Dauvillier)整理的《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研究》第二卷第一分册《西安府碑》(*Recherches sur les Chre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Orient*,II. 1: La Stele de Si-Ngan-

位于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唐代基督教流行中国的最好历史见证,自明末出土以来,受到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热烈关注,近代中外学者对它进行了反复考证和研究。

Fou,巴黎,1984)。龚方震《唐代大秦景教碑古叙利亚文字考释》(《中华文史论丛》1983.1)对碑中比较难解的叙利亚文字进行考释。他首先否定基督教传入中国年代的贞观九年(635)说,否定西方和日本学者主张的北周宣政元年(587)说,考察了景教东来的路线,认为景教由西向东,传入中国西北地区的年代要早于长安。同时,景教徒也从海上来到中国。他将碑上的全部叙利亚文字做了翻译和诠释,指出其含义,并对汉文、叙利亚文的各自特点做了比较。近年关于《景教碑》的著作,是富安敦教授编订补充的伯希和《西安府〈景教碑〉译注》(P. Pelliot,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 edited with supplements by Antonino Forte,京都与巴黎,1996),对该碑做了详尽的注释和研究史的叙述。本书还收录了富安敦的下列文章:《贞观十二年允许景教在华传播诏书研究》、《所谓波斯"亚伯拉罕"考——一个错误比定的例子》、《长安的崇福寺——被忽略的佛寺与景教》、《〈头陀寺碑〉——景净的文章模式》,在景教的初期传播、阿罗憾的比定、《景教碑》的出土地、碑文的范本等问题上,补充了伯希和的考证。富安敦还有《为阿罗憾正身——一个唐朝供职宫廷的波斯贵族》(出处见上),也是反驳把阿罗憾看作景教徒的观点的。另外,赵璧础《就景教碑及其文献试探唐代景教之本色化》(《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今日中国,1998)、霍夫力(P. Hofrichter)《唐代波斯基督教会向中国的扩展》(《西北大学史学丛刊》2,三秦,1999;侯昕译,《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6,1999)、葛承雍《从景教碑试论唐长安景教的兴衰》(《碑林集刊》6,

2000)，都是以《景教碑》所记唐代景教传播史为基础，而加以解说。有关《景教碑》研究的详细情况，请参看耿昇《中外学者对大秦景教碑的研究综述》(《中西初识》，大象，1999)、林悟殊《西安景教碑研究述评》(《中国学术》4，2000)。

景教因为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备受关注，教内教外人士都有程度不同、目的不一的研究成果发表，就中以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0)一书，对有关景教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收罗最广，其研究结果，基本上勾画出唐代景教在华传播的面貌。以后，他又著有《唐宋时代的中国基督教》(《支那基督教之研究》1，东京春秋社，1943)和英文本《中国的景教文献和遗物》(*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东京，1951)，对东西方学界影响深远。系统研究唐代景教史乃至整个基督教入华史的著作，还有穆尔(A. C. Moule)《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伦敦，1930；郝镇华汉译本，中华，1984)、龚天民《唐代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辅侨，1960)、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张奉箴《福音流传中国史略》卷一(台湾辅仁大学，1970)、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1981)、朱谦之《中国景教——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东方，1993)、克里木凯特著，林悟殊翻译增订《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台湾淑馨，1995)。通过这些论著，读者可以了解到从阿罗本贞观九年(635)入朝到唐朝末年景教的发展史和地域分布等情况。在这些论著中，

景教因为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备受关注，教内教外人士都有程度不同、目的不一的研究成果发表。

罗香林书是一部论文合集,其中包括《景教徒阿罗憾为武则天皇后营造天枢考》、《吕祖与景教之关系》、《唐岭南道之景教流传与刘蜕父子为何不祀祖的问题》、《景教入华及其演变与遗物特征》等,所论道教与景教的关系及景教流行于岭南的情况等,超出前人研究范围,但有些是否与景教相关,尚无法肯定。莫菲特(Samuel H. Moffett)《亚洲基督教史》第一卷新版(*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vol. I: Beginnings to 1500,纽约,1998)有一章篇幅写唐代基督教的传播。林悟殊《唐代首所景教寺院考略》(《华学》四,2000)考察了唐代景教寺院的称谓、长安义宁坊大秦寺的设置年代和重要地位。

关于景教在华传播之成败问题,杨森富《唐元两代基督教兴衰原因之研究》(林治平编《基督教入华一百七十年纪念集》,今日中国,1997)认为唐代景教之兴衰取决于皇帝的好恶,因而教士们喜欢参与政治活动,没有集中精力于传教。林悟殊《景教在唐代中国传播成败之我见》(《华学》3,1998)对比祆教和摩尼教在华传播的特点,指出景教传播主要是教士自身的努力,因此景教徒均非等闲之辈。为了传教,他们把最大的精力用于翻译和宣讲本教的经典。陈怀宇《景教在中古中国的命运》(《华学》4,2000)从整个西亚、中亚的政治环境和景教徒在华传教行为,来说明唐代景教衰落的原因。

景教传播主要是教士自身的努力,因此景教徒均非等闲之辈。为了传教,他们把最大的精力用于翻译和宣讲本教的经典。

在唐代景教研究中,敦煌发现的景教写本也备受关注,伯希和敦煌发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尊经》被录入上述大部分著作。吴其昱《景教三威蒙度赞研究》(《中研院史语所集刊》57:3,1987)对比叙利亚文,逐句解

释了这件重要文献。另外,流入日本的被称为敦煌景教写本的还有《一神论》、《序听迷诗所经》、《志玄安乐经》、《宣元本经》和所谓得自李盛铎旧藏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与《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这些散卷大多由羽田亨和佐伯好郎考释发表,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京都,1958)和《支那基督教之研究》第1、4卷中,成为人们研究唐代景教的基本文献。但是,林悟殊与荣新江合撰《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九州学刊》4:4,1992)从敦煌学与景教教义两方面,判定上述最后两种写本不是唐代景教文献,而是近世书商的伪造。这一结论向前此利用这些文献而得出的唐代景教研究结论提出了挑战,而且为今后研究其他唐代景教文献的真实性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陈怀宇《所谓唐代景教文献两种辨伪补说》(《唐研究》3,北大,1997)从专名和用韵的错误,补充讨论了《通真归法赞》和《宣元至本经》的疑点。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唐研究》6,北大,2000)提出一些疑问,但仍作为早期基督教文献对待。

《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与《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两种写本不是唐代景教文献,而是近世书商的伪造。这一结论向前此利用这些文献而得出的唐代景教研究结论提出了挑战,而且为今后研究其他唐代景教文献的真实性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在吐鲁番葡萄沟的废寺中,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掘获大批伊朗文和突厥文景教文献,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粟特语文书中,也有景教文书。从两地文献的时间来看,唐末至宋初敦煌吐鲁番两地的景教徒之间,应当存在着某种联系。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从吐鲁番和敦煌写本看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徒》(*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1992;陈怀宇汉译文,载《敦煌学辑刊》1997.2)分类概述了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基督教

文献,整理了基督教从粟特本土向东方传播的历史脉络。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4,1999)全面探讨了高昌景教的寺院、教团、经书、仪式等方面,并考察了高昌景教与东西景教教团的关系。

四、与南亚的关系

隋唐时代,中印交往进入一个新阶段,不论从往来路线的增加,人员数量的增多,种类的扩大,还是交流的内容都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

印度和中国同属于四大文明古国,两国之间有着悠久的往来关系,到了隋唐时代,中印交往进入一个新阶段,不论从往来路线的增加,人员数量的增多,种类的扩大,还是交流的内容都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古代的印度又称天竺,范围较今天的印度国要大,有时包含南亚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里所说的印度,是随时代不同而所指范围不同的历史概念。

对隋唐时期中印关系的研究,首先是建立在对当时西行求法僧人及其著作研究的基础上的。从唐朝初年的玄奘到德宗贞元年间回国的悟空,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西行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充当了中印交往使者的角色。他们中有些留下了行记或其他著述,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印关系史的主要依据。由于从 19 世纪开始,就陆续有整理这类书的著作发表,这里无法一一详细介绍,只按时间先后罗列如下:

(1) 玄奘《大唐西域记》:儒莲(S. Julien)《西域记》(*Ta-T'ang Hsi-yu-chi. Me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traduits du Sanscrit en Chinois, enl'an 648*,巴黎,1857—1858);比尔(S. Beal)《西域记》(*Si Yu Ki, Buddhist Record of the Western World*,伦敦,1884);瓦

特斯(Th. Watters)《玄奘印度行记注》(*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A. D. 629—645*),伦敦,1904—1905);堀谦德《解说西域记》(东京,1912);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记之研究》(京都法藏馆,1942—1943);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记》(《中国古典文学大系》22,平凡社,1971);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1977);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1981);范祥雍《大唐西域记阙文考辨》(《文史》13,1982);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1984);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1985);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今译》(陕西人民,1985);桑山正进《大唐西域记》(《大乘佛典·中国日本篇》9,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杨廷福《玄奘年谱》(中华,1988);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巴蜀,1990)。其中以季羡林等校注本晚出转精,现为学界公认为最佳的本子,但有些新的考古发掘和语言学研究成果吸收不够。桑山正进译注本只有睹货逻故地到北印度部分,但于中亚考古学成果引述较为丰富。

(2)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儒莲《玄奘的生平及其629—645年印度之行》(*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dans l'Inde depuis l'an 629 jusqu'en 645*,巴黎,1853);比尔《沙门慧立著玄奘传》(*The Life of Hiuen Tsiang by the Shaman Hwui Li*,伦敦,1911);长泽和俊《慧立彦悰玄奘法师西域纪行》(东京桃源社,1965);又《玄奘三藏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光风社,1985);孙毓棠、谢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1983)。此书新疆出土有回鹘文本,回鹘文专家有不

少整理成果发表，于此传和《大唐西域记》的进一步整理极富参考价值。

(3)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沙畹《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Memoire composé à l'epoqu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 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è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巴黎，1894)；足立喜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岩波书店，1942)；长泽和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小考》(《东洋学术研究》15:1，1976)；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1988)。

(4)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高楠顺次郎(Takakusu)《南海寄归内法传》(*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1896)；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1995)；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佚文辑考》(《清华汉学研究》1，1994)，王邦维还有《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重庆，1996)一书。

(5)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藤田丰八《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京，1910；钱稻孙校印，北平，1931)；福克司(W. Fuchs)《726 年慧超往西北天竺与中亚的行记》(*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30，1938(1939))；冉云华等(Yun-hua Jan, Han-Sung Yang, Sh. Iida & L. W. Preston)《慧超往五天竺国传》(*The Hye Ch'o Diary: Memoir of the Pilgrimage to the Five Regions of India*，伯克利与汉城，1984)；桑山正进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张毅《往五天竺

国传笺释》(中华,1994)。就中以桑山正进组织相关学者所作的校注本最为精密,参看王邦维对最后两书的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1,北大,1996)。

(6)《悟空行记》:长泽和俊《释悟空的入竺问题》(《东洋学术研究》14:4,1975);小野胜年《空海将来的"悟空入竺记"及其行程》(《东洋学术研究》15:3,1976);长泽和俊《再论"悟空入竺记"》(《东洋学术研究》16:2,1977)。

此外,范祥雍点校了道宣的《释迦方志》(中华,1983)。

在上述西行求法的著作中,最著名的要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了,它对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史、中亚史地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本前言,又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1982)介绍了玄奘西行的时代背景、动机和效果。他指出,玄奘出身儒学世家,西行前于佛教诸宗已有深入研究,为了解决佛教内部的思想混乱,学习在中国学不到的《瑜伽论》而决意西行。通过对玄奘印度求法和归国后活动的考察,认为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大唐西域记》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长泽和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小考》(《东洋学术研究》15:1,1976)讨论了求法僧的路线和7世纪中印之间的交往问题。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前言《义净和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指出,义净的时代,正值中国佛教高度发展,印度佛教也正好达到它的顶峰,而且唐朝政治势力及影响远被西域,导致了义净的西行。但他和玄奘所不同的是,

除了力图解决佛教界的思想混乱外,还想吸收印度的僧团制度、戒律规定,以整顿戒律,矫治时弊,力挽颓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大唐西域记》不同,它因人立传,是一部传记著作,由于它晚于《大唐西域记》,有许多地方可以补充玄奘的书。

隋唐时期,还有大批印度高僧来中国传教译经。相对来讲,关于他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周一良《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8,1945;汉译本《唐代密宗》,上海远东,1996)研究了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他们把印度瑜伽密教传入中国,建立了中国密宗,中晚唐影响至巨。富安敦(A. Forte)《迦湿蜜逻密宗大师宝思惟及其北印度合作者在中国的活动》(*East and West*, *new series*,34,1984)利用佛教史籍和敦煌文书,研究了武周至玄宗时期在华活动的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高僧宝思惟以及罽宾的尸利难陀设、岚波国的李无谄和李无碍、天竺的室利末多,还有中国僧师利等人。章群《唐代之胡僧》(《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文津,1993)从胡僧于王室及宫廷关系和胡僧的奇行异迹,来说明胡僧在上层和民间社会的不同作用。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北大,2000年),所述不仅有僧人,也有科学家。

除了僧侣之外,最著名的中印交往使者是唐朝的王玄策,他在唐朝初年曾三次出使印度,除完成外交使命外,还曾发诸国兵,扶立印度国王。可惜的是王玄策所著《中天竺行记》(或名《王玄策行传》等)早已失佚。列维(S. Levi)《王玄策使印度记》(冯承钧汉译文载《西域南海

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1957)做了初步辑录。以后伯希和、冯承钧、岑仲勉都有补充,而以冯氏《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1957)考证最详。以后又续有新材料被发现,李玉昆有《龙门石窟新发现王玄策造像题记》(《文物》1976.11),霍巍有《〈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东方学报》66,京都,1994;又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略同,载《考古》1994.7),而尤以后者重要。讨论王玄策出使问题的文章,还有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敦煌学辑刊》1984.1)、阴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及尼泊尔诸问题》(《南亚研究》1990.2)、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辨》(《南亚研究》1991.3)、孙修身《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敦煌研究》1994.3)等,孙修身汇集了王玄策的资料,并加以自己的解说,编著《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1998)一书。西藏吉隆新发现的王玄策出使印度留下的碑铭,使人们对中印交往的吐蕃道有了新的认识,基本确定了王玄策出使路线的具体走向。有关此新资料的讨论,还有林梅村《〈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1998;《中亚学刊》5,2000)、黄盛璋《西藏吉隆县新发现王玄策〈大唐天竺使出铭〉主要问题考辨》(《故宫学术季刊》15:4,1999)。此前,足立喜六《唐代的泥波罗道》(《支那佛教史学》3:1,1939)对此有初步研究。范祥雍《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4)详细考察过这条路的开通时间,以及它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冯汉镛

西藏吉隆新发现的王玄策出使印度留下的碑铭,使人们对中印交往的吐蕃道有了新的认识,基本确定了王玄策出使路线的具体走向。

《唐代西蜀经吐蕃通天竺路线考》(《西藏研究》1985.4)对道路走向有考证。多杰才旦《关于丝路吐蕃道的交通路线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4)从更广的视野讨论了这条道路。

除了僧传和使臣行记外,中国载籍中保存了许多印度史料,有些是缺乏历史观念的印度本身所没有的。耿引曾《汉文南亚史料学》(北大,1990)分正史、别史、杂史、史料杂著四类,对汉文文献中有关南亚的史料做了考订、分类、阐述和评价。以她为主而由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的《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二册,上海古籍,1994)则辑录了大量的史料原文,其中隋唐五代共收三十三种文献。这两部书为我们研究中印交往提供了史料指南和部分原始文献,颇便学人。

隋唐中印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造纸术的传播,季羡林先后发表《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问题的补遗》、《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均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1982),认为中国纸和造纸法先由内地传到西域,再从西域传到印度。他否定了伊斯兰教徒 12 世纪左右才把纸带到印度去的流行说法,认为中国纸至迟在 7 世纪末叶就已经到了印度。至于造纸法,则有可能是由阿拉伯人辗转传入。黄盛璋《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历史研究》1980.1)认为纸和造纸法是在 650—670 年由吐蕃尼波罗道传入印度的,尼泊尔和印度的造纸法差不多和纸同时传入,最

初传去的是桑皮造纸法。关于蚕丝输入印度问题，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考证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公元前4世纪，道路有南海、西域、西藏、缅甸、安南五条。关于印度制糖术入华问题，季羡林《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问题》(《文献》1988.2、3)通过对历史背景和过程的详细考察，肯定了唐太宗时印度甘蔗制糖术传入中国的说法，但这是造砂糖还是造石蜜的技术，他认为尚无法确定。此外，他还有《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历史研究》1982.1)等。

周济《我国传来印度眼科术之史的考察》(《中华医学杂志》22.11/12,1936)详细叙述了印度眼科医术传入中国的过程。季羡林《印度眼科医术传入中国考》(《国学研究》2,1994)进而讨论了与眼科相关的其他外来医术对唐朝中国的影响等问题。蔡景峰《孙思邈与各国和各族医学交流》(《中华医史杂志》1983.1),房定亚、耿引循、耿引曾合撰《从〈外台秘要〉看印度医学对我国医学的影响》(《南亚研究》1984.2)也讨论了医学传播问题。姜伯勤《敦煌吐鲁番与香药之路》(《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1991)讨论了印度香药的传入问题。薮内清《唐代的印度天文学著作——〈九执历〉》(*Acta Asiatica*,36,1979)对这部书有解读。江晓原《六朝隋唐传入中土之印度天学》(《天学真原》,辽宁教育,1991;又见《汉学研究》10:2,1992)介绍了唐代天文学中的“天竺三家”和《九执历》、符天术等问题。

除了佛教的传播和僧人行记外,学者们对一般的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得似不够充分。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收入《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1990,题为《中印文化交流简论》)和《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1991)从这一角度做了全面的概说。

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史,由于史料多少不等,研究的成果集中在唐代前期。实际上,晚唐五代中印之间的往来并未断绝。

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史,由于史料多少不等,研究的成果集中在唐代前期。实际上,晚唐五代中印之间的往来并未断绝。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1991)利用敦煌文书,补充了过去中印交往史上的一段空白。罗香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香港,1960)则依据地方史料,对通过南海的中印交往做了研究。饶宗颐《读罗香林先生新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兼论交广道佛教之传播问题》(《大陆杂志》21:7,1960)对此有所补正。

隋唐时代,中国与南亚次大陆上的尼波罗(尼泊尔)、师子国(斯里兰卡)等地也有往来,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五、与南海诸国的关系

中国古代称东南亚及南海和印度洋地区为南洋或西洋,隋唐时期虽然中外关系以陆路交往为主,但中晚唐五代通过南洋的海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BEFEO*,4,1904;冯承钧译,中华,1955)、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Journal Asiatique*,1919;冯承钧译,中华,1957)对此做了开拓性研究。桑原隲藏《蒲寿庚考:兼谈唐宋时期中国与阿拉伯

间的贸易史》(上海,1923;陈裕菁译,中华,1929;英文论文载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2—7,1928)续有所论。高桑驹吉《大唐西域记所记东南印度诸国之研究》(东京森江书店,1926)对玄奘记载的东南亚地区加以考订。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研究·南海篇》(东京冈书院,1932)对南海史地多有考释。松田寿男也发表过一系列有关中国与东南亚或南海关系史的文章,如《古代末罗瑜与东西交通》、《印度支那在亚洲历史上的作用》、《昆仑国考》、《多摩长考》、《昆仑舶的解缆》、《回教东渐史上的苏门答剌》等(均收入《松田寿男著作集》四,东京六兴,1987)。

唐五代不仅通过海路与东南亚各国建立了广泛的政治和商业联系,而且与印度、西亚、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加强了往来。章巽《我国航海史的光辉经历》(《章巽文集》,海洋,1986)考察了唐代的对外交通,指出从8世纪中叶及以后大食势力日益巩固地立于中亚,西域原有的势力平衡发生重大变化,唐朝的对外交通受到阻碍,因而把重点转到海路上来。贾耽记述的两条远航海线,成为唐朝东西两方对外交通的生命线。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大,1996)也有多篇论说。

从8世纪中叶及以后大食势力日益巩固地立于中亚,西域原有的势力平衡发生重大变化,唐朝的对外交通受到阻碍,因而把重点转到海路上来。

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大,开元二年(714),唐朝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关于市舶使的研究,主要有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上海,1923;陈裕菁译,中华,1958)、和田久德《唐代市舶使的创置》(《和田清博士古稀记念东洋史论丛》,讲谈社,1961)、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1998)、李庆新《唐代市舶使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法

门寺论文集》,陕西人民,2000)。和田久德还有《唐代的南海遣使》(《东洋学报》33:1,1951)研究了唐代与南海诸国的交往。王贞平《唐代的海外贸易管理》(《稽古拓新叶——屈守元教授八秩华诞纪念》,成都,1992)从制度上加以探讨。

徐玉虎《唐代与南海贸易原因之研究》(《中华文化复兴月刊》3:8,1970)否定唐代南海贸易的主要原因是出于政治的说法,认为对外贸易的动力是唐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筑山治三郎《唐代岭南的政治与南海贸易》(《京都产业大学论集》1,1971)、河原正博《隋唐时代的岭南酋领冯氏与南海贸易》(《山本达郎博士古稀纪念·东南アジア·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上)》,东京山川,1980)则从政治的角度,解说南海贸易发展的原因。清木场东《隋唐宋贸易之研究》Ⅰ(《久留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25:4,1985)分时段说明了经南海来航诸国与隋唐的朝贡贸易及其兴衰原因。汶江《唐代的开放政策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海交史研究》1988.2)、李金《唐代对外开放政策与海外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4.1)也探讨了海路兴盛起来的原因。

高伟浓《唐宋时期中国东南亚之间的航路综考》(《海交史研究》1987.1)对海上航路加以考证。此外,还有刘希为《略论唐代海外交通发展的新态势》(《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1993)。

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1987)以国为单位,一一阐述了唐朝与南海各国的往来,以及贸易和文化交流情况。吴景宏《南朝

隋唐时代中菲关系之探讨》(《大陆杂志》32:2、3、4,1966)利用菲律宾出土的陶瓷等考古资料,说明中菲关系在唐朝时已经相当密切。日野开三郎《唐代的木棉生产》(《佐贺龙谷学会纪要》18、19,1973)考察了作为租的代用品木棉从印度、南海输入的路径、名称、产地等问题。村松一弥《唐人考》(《人文学报》98,1974)指出"唐人"的称呼是随着东南亚贸易路的发展而固定下来的。杨少祥《广东唐至宋代陶瓷对外贸易述略》(《广东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论文集》,紫禁城,1989)谈了外销陶瓷问题。李德金《8—14 世纪中国古外销陶瓷》(《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 40 年纪念》,科学,1995)概要说明了唐五代时期广州、明州、扬州出土的陶瓷品种。

海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沿海城镇的兴起。而一些重要的港口,对唐代的海外贸易做出了贡献。沈福伟《记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对此做了概要介绍。

关于扬州,顾风《扬州出土波斯陶及其在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东南文化》1988.1)从考古材料加以说明。朱江《扬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1991)概述了扬州的重要性。陈达生《唐代海上陶瓷之路的见证:泰国猜那出土瓷碗和扬州出土背水壶上阿拉伯文图案的鉴定》(《海交史研究》1992.2)从实物论证了扬州对外贸易的情况。俞永炳《试谈丝绸之路上的扬州唐城》(《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1,科学,1994)提示了扬州出土的唐朝时期与丝路有关的文物。

关于泉州,爱宕松男《泉州刺桐城考》(《田村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史论丛》,1968)利用唐诗,把泉州"刺桐"的名称起源,上溯到中唐时期,并由此指出泉州作为早期南海贸易港的地位,要比广州更为重要。不过,川越泰博《唐代泉州城沿革小考》(《古代文化》25:10,1973)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苏基郎《伊本的 Djanfou 非泉州辨》(《食货》复刊 11:7,1981)和《九世纪阿喇伯文献所载 Djanfou 地望考辨》(收入所著《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台湾商务,1991)认为 Djanfou 非指泉州,而是福州,因为唐朝时泉州尚未兴起。李东华《唐末泉州的兴起及其背景》(《台大历史学报》9,1982)以泉州为中心,阐述了唐末的海外贸易情况。《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文物,1982)则是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

关于广州,李庆新《论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4)对唐代广州的外贸管理制度、经营方式、贸易地域、进出口货物等做了初步探讨。对于广州出土的粟特银器,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社科院,1991)有讨论。银器上的铭文,吉田丰《粟特语杂录(Ⅳ)》(《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Ⅹ,1995)、格瑞内(F. Grenet)《先伊斯兰时代南海诸国的粟特商人》(*Cahiers d'Asie Centrale* 1—2,1996)都有解说。

关于明州,陈炎《宁波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魏维贤七十华诞论文集》,北大,2000)全面探讨了汉至清宁波的地位和在海外贸易、文化交往方面的作用。

此外,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1957)介绍了关于南海地区的有关史书。

关于通过云南入缅甸的交通路线,藤泽义美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古代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以缅甸和云南的交通路线为中心》(《历史教育》5:5,1957)、《唐朝云南经营史研究之三——云南经营的挫折》(《岩手大学学艺学部研究年报》13:1,1958)、《唐代入云路历史学研察》(《岩手史学研究》29,1958)、《古代东南亚的内陆交通》(《历史教育》6:6,1958)、《唐朝云南经营的目的——以交通路开拓问题为中心》(《岩手史学研究》31,1959)。陈玉龙《汉唐巴蜀与中西交通》(《朱杰勤教授纪念论文集》,广东高教,1996;《魏维贤七十华诞论文集》,北大,2000)对此也有概说。

六、与欧洲、非洲的关系

唐代中国对于欧洲和非洲也有一些记录,甚至双方也有少量的交往。

1885年,夏德(F. Hirth)就把中国史籍中有关大秦和拂菻(隋唐以后指称东罗马帝国的名字)的记载辑录并翻译成书,名《中国与罗马东部地区》(*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在上海出版,结论是大秦或拂菻主要是指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即叙利亚。此书由朱杰勤译成汉文,题《大秦国全录》(商务,1964)。另外,戈岱司(G. Coedès)《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Extrême Orient*, Paris 1910;耿昇汉

译本,中华,1987)、玉尔(H. Yule)与考狄(H. Cordier)《古代中国闻见录》(*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4 vols., London 1913—1916)两书,汇集并翻译了西方古典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史料。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辅仁,1930;中华,1977),也汇集增补了中西文有关大秦的史料并逐条加以考辨。以后,沙畹(E. Chavannes)、伯希和(P. Pelliot)、赫尔曼(A. Herrmann)、白鸟库吉、马伯乐(H. Maspero)等人,都对大秦国问题的讨论提出过富有影响力的一些看法,或者补充了一些前人遗漏的新史料。但是,不论大秦与中国之间,还是丝国与希腊罗马之间,都距离遥远,有关的史料充满了传奇色彩,而地名的对音往往因为汉文古音的构拟和西文原文的不明确而无法得出圆满的结果。1996年,莱斯利(D. D. Leslie)和噶迪那(K.H. J. Gardiner)合著的《汉文史料中的罗马帝国》(*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出版,通过对历史事件、大秦国名物、国家和地区等地理单元的比定,作者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史料中的大秦,不是夏德所比定的罗马东部地区(叙利亚),也不是伯希和认为的埃及亚历山大城,而是指以罗马为都城的整个罗马帝国(参看荣新江书评,《北大史学》7,2000)。

不论大秦与中国之间,还是丝国与希腊罗马之间,都距离遥远,有关的史料充满了传奇色彩,而地名的对音往往因为汉文古音的构拟和西文原文的不明确而无法得出圆满的结果。

有关非洲的资料也收集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夏德(F.Hirth)《中国有关东非的早期记载》(*JAOS*, 30, 1909)指出杜环《经行记》中关于东非的记载。戴闻达(J. J. L. Duyvendak)《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London 1947;胡国强、覃锦显汉译本,商务,1983)对此续有论说。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三联,1965)、陈信雄《唐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吴剑雄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4,台北,1991)对汉籍的记录有考证。埃及等地发现了大量中国陶瓷,有关情况,可参看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李锡经、高喜美译,文物,1984),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1987),叶文程《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紫禁城,1988)。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中华,1990)对包括唐朝的中非关系做了系统的阐述。

(原载胡戟等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

附注:为节省篇幅,本文出版社及刊物名称用简称。

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

从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来说，我国西域史研究的起步，应当追溯到清朝中后期的西北舆地之学。

从乾隆年间清朝征服占领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和回部，到光绪十年（1884）建新疆省，有关新疆地区的山川地貌、行政建置、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情况，渐次记录到清朝的官书和地图中，使内地的学人初步掌握了有关的知识。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前后，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对清朝构成威胁，中国的边疆问题日益严重。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特别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探讨边疆问题。乾嘉朴学考据的方法和西洋制图学的传入，为边疆史地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而亲身到了新疆，为清朝的西北舆地之学在此时产生一批重要的著述提供了机遇。这些著作中可举以下几种为代表作：祁韵士（1751—1815）的《皇朝藩部要略》、张穆（1805—1849）的《蒙古游牧记》、徐松（1781—1848）的《西域水道记》、何秋涛（1824—1862）的《朔方备乘》、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其中尤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和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对后人影响最大。

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而亲身到了新疆，为清朝的西北舆地之学在此时产生一批重要的著述提供了机遇。

徐松于嘉庆十七年（1812）因科场案流放伊犁，他把祁韵士编《伊犁总统事略》加以增删修订，编成《新疆识略》十二卷。在新疆期间，徐松有机会遍访天山南北各地，做实地考察。他于道光元年（1821），仿《水经注》的体例，撰成《西域水道记》五卷，以哈喇淖尔、罗布淖尔等十一大湖为纲，记述嘉峪关以西和新疆境内的水系湖泊，释

文中参考史籍和亲历考察的结果,详记沿河的城邑、村庄、军台、卡伦、厂矿、交通、古迹、民族、史事等,对当地留存的碑志材料,也做了辑录。此外,徐松还撰有《新疆赋》二卷,用韵文体记述了新疆的山川形势和民族物产等情况。他还著有《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不仅比勘史料,多所订正,而且结合实地考察,指出今地所在,较前人高出一筹。

陶保廉在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随父赴新疆任官,一路从山东、天津、北京,经陕西、甘肃,入新疆,由哈密,经吐鲁番,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所著《辛卯侍行记》对沿途城镇沿革、山川道路、古迹名胜、人物风俗均有记述,特别是对古今地名的比定,为今人所重。

清朝各级官府组织学者编纂的一些地理志书,也反映了当时西北舆地之学的盛行。这类书主要有:《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一年至四十七年(1756—1782)修成;《新疆图志》一百六十卷,王树枏、袁大化编,宣统元年至宣统三年(1909—1911)修成。两书都是即参考了历史文献,又有实地考察成果的大型地方通志,为西域史特别是清代新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以上述成果为代表的清朝西北舆地之学,开创了西域史研究的新天地。虽然大多数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蒙古史,并由此带动了重修元史的热潮,而且多数学者的著作仍是以记述为主。但是,像徐松这样的学者,除了史籍的严密考订外,还亲身做了实地调查,而且注意到了当地保存的碑志材料,代表了新史学的方向。

在同时代的欧洲,也正在成长起一批区别于传教士

清朝西北舆地之学,开创了西域史研究的新天地。像徐松这样的学者,除了史籍的严密考订外,还亲身做了实地调查,而且注意到了当地保存的碑志材料,代表了新史学的方向。

和殖民主义者的汉学家。他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即有关中亚的史料。以法国为例,雷慕沙(J. P. A. Remusat 1788—1832)著有《于阗城史》(巴黎,1820),利用《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整理了于阗的历史资料。他还翻译了法显的《佛国记》(巴黎,1836)。雷氏的弟子儒莲(S. Julien 1797—1873),也翻译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巴黎,1857—1858)和慧立、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巴黎,1853)。1893 年,沙畹(Ed. Chavannes 1865—1918)继任法兰西学院教授职位,他研究的重点更偏重于中亚史。他译出一些不同时代的重要史料,并附以注释或研究,如《魏略西戎传笺注》、《宋云行纪笺注》等,其中尤以《西突厥史料》(圣彼得堡,1903)一书最为世所重。此书译出有关西突厥的大量汉文史料,证以西文史料,对隋唐时期占领西域广大领土的西突厥汗国,及其在东西交往史上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考述。

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西方,对于西域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西北地区考古时代的到来。

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西方,对于西域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西北地区考古时代的到来。在西域的历史上,由于民族的迁徙、战争、同化较为频繁,本地留存的史料不多,上述东西方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依赖于周边较大的文明所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如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希腊拉丁文史料。自从 1890 年英军中尉鲍威尔(H. Bower)在库车获得梵文写本后,英、俄外交人员开始在新疆攫取古物。随后,西欧各国争先恐后地派考察队前往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等地,发掘古代城堡、寺院、石窟、墓葬,其中以英国斯坦因(A. Stein 1862—1943)所率三次中亚考察队,德国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 1856—

1935)和勒柯克(A. von Le Coq 1860—1930)所率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日本大谷光瑞(1876—1948)所派三次中亚探险队,法国伯希和(P. Pelliot 1878—1945)所率中亚考察队,俄国科兹洛夫(P. K. Kozlov)和奥登堡(S. F. Oldenburg 1863—1934)所率中亚考察队的收获最大。新疆和田、楼兰、库车、焉耆、吐鲁番出土的艺术品,揭示了该地区伊斯兰化以前的文化面貌,各处遗址特别是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石窟与墓葬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献材料,为西域历史、语言、宗教、民族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材料。

新疆和田、楼兰、库车、焉耆、吐鲁番出土的艺术品,揭示了该地区伊斯兰化以前的文化面貌,各处遗址特别是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石窟与墓葬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献材料,为西域历史、语言、宗教、民族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材料。

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当地的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过这类材料。祁韵士《西陲竹枝词》中题为《龟兹》的一首有这样的诗句:"轮回经写唐人笔,佛洞穷宠石壁奇。"说的就是库车出土的唐人写经。但这些写经当时只是作为书法作品而被士大夫们赏玩,没有人留意它们的学术价值。在各国考察队纷纷来挖宝的清末民初,有不少清朝官人手中都有多少不等的出土文献材料,但只有王树枏(1851—1936)曾把自己所见所藏,从金石学的角度辑为《新疆访古录》二卷。当时的中国,考古学还没有起步,因此更难有人能认清这些古物特别是古写本在学术研究上的分量了。

当时的中国,考古学还没有起步,因此更难有人能认清这些古物特别是古写本在学术研究上的分量了。

二

清朝末年,腐朽的清王朝连自家的皇宫禁苑都无法保全,更何况远在边陲的古物了。大量的古代西域文献和文物的流失国外,是必然的历史悲剧。国力衰落,学术

清末新疆文物的流失，使得中国的学术失去的不仅仅是文物，而且是20世纪相当长时间里西域研究的竞争力。

必受影响。乾隆征服新疆后，促成一批优秀的西北舆地著作的产生。清末新疆文物的流失，使得中国的学术失去的不仅仅是文物，而且是 20 世纪相当长时间里西域研究的竞争力。1915 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收录丁谦对先秦至明清有关西域地理文献的考证文字，因为没有参考出土文献和实地考察报告，所取得的成果就显得十分有限。

而此时早已形成组织的西方学术界，一下子获得了数以万计的新资料，马上全力以赴进行研究。

而此时早已形成组织的西方学术界，一下子获得了数以万计的新资料，马上全力以赴进行研究。现在看来，几乎所有有成就的东方学家当时都投身于西域出土资料的研究工作。斯坦因写出了一册比一册厚重的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二册[①]、《西域考古记》四册[②]、《亚洲腹地考古记》五册[③]，除了详尽的考古调查记录外，还有大量的考证和分析研究，远远超出了一直为西人所重视的徐松《西域水道记》的水平。在这三部考古报告的最后，都附录有各科专家对斯坦因收集品的分类研究，也体现了欧洲学术的集体力量。当时欧洲最有成就的东方学家，很快就投入到这些新材料的解读工作中。其中与西域史关系较为密切的方面有：沙畹、马伯乐（H. Maspero 1883—1945）的汉文，吕德斯（H. Lüders 1869—1943）的梵文，西格

①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2 vols., Oxford 1907.

② M. 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5 vol., Oxford 1921.

③ M. A. Stein,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4 vol., Oxford 1928.

(E. Sieg)、西格林(W. Siegling)、列维(S. Lévi 1863—1935)的吐火罗文,缪勒(F. W. K. Müller 1863—1930)的回鹘文、粟特文,柯诺夫(S. Konow 1867—1948)的于阗文等新疆、敦煌出土文书的研究,阐明了西域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为今天研究西域史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相对于硕果累累的西方西域史研究成果,一些中国学者也没有等闲视之。1909 年罗振玉(1866—1940)等人在北京见到伯希和带来的部分敦煌写本后,立刻抄写影印。罗振玉陆续编撰了《敦煌石室遗书》①、《鸣沙石室佚书》②等,刊布并考释了一些有关西域的重要敦煌文书,如《沙州图经》、《西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景教三威蒙度赞》和摩尼教残经。蒋斧编《沙州文录》③,专门抄录有关敦煌史地的官私文书,其所抄碑文,多为徐松《水道记》所录原碑之缺。他还撰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④,是第一篇讨论这个问题的专文。

王国维(1877—1927)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和罗振玉在接到沙畹寄送的《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稿本后,即着手考释这些敦煌、罗布泊、尼雅等地出土的汉晋简牍,最后辑成《流沙坠简》⑤。他还撰写了一系列敦煌文书跋文(1919);并且在沙畹和伯希和关于摩尼教长文的启发下,撰《摩尼教流行

---

① 《敦煌石室遗书》,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诵芬室刊行。

② 《鸣沙石室佚书》,京都宸翰楼,1913 年 9 月。

③ 收入《敦煌石室遗书》,1909 年。

④ 蒋斧《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收入《敦煌石室遗书》,1909 年。

⑤ 《流沙坠简》,京都宸翰楼,1914 年。增订本,1934 年。

中国考》①,于前人论说有所补正。由这些新史料出发,王国维利用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西域史论文,如《西胡考》(1919)、《西域井渠考》(1919)、《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1925)、《鞑靼考》(1925)、《辽金时代蒙古考》(1925),并著《古行记校注》(1925)、《蒙古史料校注四种》(1926)②。从两汉到元明,西域史上许多重要的问题王国维都接触到了。王国维的西域史研究,既直接继承了清朝以来西北舆地之学的传统,又吸收了西人在新疆、甘肃等地的考古学成绩,因此较徐松为代表的清朝学者更高一筹。他的成果不仅为国人奉为经典,而且也受到伯希和这样的海外中亚学者的重视。

王国维的西域史研究,既直接继承了清朝以来西北舆地之学的传统,又吸收了西人在新疆、甘肃等地的考古学成绩,因此较徐松为代表的清朝学者更高一筹。

另一位开风气的学者是陈寅恪(1890—1969)。他早年长期游学欧美,除通晓西方现代语言外,又遍读与中国相关的各种东方语言,加上他对中国古籍的深厚功底,使他在回国后的1926—1930年的一段时间里,也为西域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在此期间,陈寅恪发表的有关文章如下:《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1927)、《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1927)、《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1927)、《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1928)、《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1928)、《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

① 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学术杂志》第11期,1921年;收入《观堂别集》卷一,见王国维《观堂集林》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167—1190页。

② 以上均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部分论文收入《观堂集林》和《观堂别集》,乌程蒋氏印行;又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跋》(1929)、《元代汉人译名考》(1929)、《大乘义章书后》(1930)、《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1930)、《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1930)、《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1930)、《敦煌本唐梵翻对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1930)①。

在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中,西域史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他们综合中外史料、胡汉文献以及考古材料的研究方法,给予以后的西域史研究以强烈的影响。

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高潮阶段,西域史研究也同样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陈垣(1880—1971)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特别是外来宗教的讨论,也澄清了许多外来宗教在西域的流行以及西域人来华等问题。他的主要论著有《元也里可温教考》②、《火祆教入中国考》③、《摩尼教入中国考》④、《元西域人华化考》⑤、《回回教入中国史略》⑥。另一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1888—1951),分类汇辑了中外史籍中的有关材

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高潮阶段,西域史研究也同样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① 现均收入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② 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东方杂志》第15期,1918年;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56页。

③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303—328页。

④ 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329—397页。

⑤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燕京学报》第2期,1927年。单行本有《励耘书屋丛刻》第1集第1种,1934年;陈智超导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⑥ 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东方杂志》第29卷第1期,1928年;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542—561页。

料,编成六册《中西交通史料汇编》①,其中中亚一册,实为西域史料的一次系统整理。冯承钧(1887—1946)除在翻译法人西域史研究论著中附加大量自己的考证外,还写有《鄯善事辑》②、《高昌事辑》③、《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④等论文,特别为鄯善和高昌国史的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向达(1900—1966)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⑤,系统探讨了西域文明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他还有《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实为其后来整理西域史书的先声。此外,张凤《汉晋西陲木简》⑥,考释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敦煌和尼雅等地的简牍文书。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⑦,则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全面考查了西域史,但重在近现代史。还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年代,邵循正(1909—1973)据布洛舍(E. Blochet)刊剌失德丁波斯文《集史》,译出若干篇,兼做考释⑧,惜未能继续。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但不少有分量的论著主要的着眼点是中西交通史,西域的史事只

---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

② 冯承钧《鄯善事辑》,《辅仁学志》第8卷第1期,1932年;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丛汇辑》,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1—24页。

③ 冯承钧《高昌事辑》,《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9期,1943年;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丛汇辑》,48—83页。

④ 冯承钧《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中央亚细亚》第1卷第1期,1942年;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丛汇辑》,84—95页。

⑤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学报》专刊,1933年。

⑥ 张凤《汉晋西陲木简》,上海,有正书局,1931年。

⑦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⑧ 后收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8—85页。

是连带的论及。对某些汉籍做了专题整理，但于出土文献利用不多。由于那个时期的研究者专业还没有严格的确定，所以对西域史的研究尚不系统全面，但其突出的一个成就是把中文史料做了许多分类整理。

值得一提的是，1927—1935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成员黄文弼(1893—1966)，在此期间曾先后三次前往新疆做考古调查和发掘，足迹遍及塔里木盆地周边重要的遗址，而重点发掘了罗布泊地区、吐鲁番盆地，以及库车、和田的一些墓葬、城址、寺院、石窟等。在野外考古工作结束后，黄文弼先后出版了考古报告《高昌》①、《罗布淖尔考古记》②，但对于西域史研究更为重要的发现，则由于种种原因而迟到解放后才整理出版，即《吐鲁番考古记》③、《塔里木盆地考古记》④。因此，除高昌外，他的考古学成果没能很快反映在同时代的西域史研究中。黄文弼还根据考察所得，撰写过一些专题研究论文，尤其重在一些考古遗址和古籍记录的对证上。这些文章已汇辑为《西北史地论丛》⑤和《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⑥。

在 20 世纪前半叶的西域史研究中，翻译西方和日本学者西域史研究的优秀著作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尤以

---

① 黄文弼《高昌》，北京，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西北科学考查团，1931 年。

②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1948 年。

③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 年。

④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

⑤ 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

⑥ 《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

冯承钧的贡献最多。有的译著，如冯承钧译沙畹《西突厥史料》①、贺昌群译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②、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③等，对以后的中国西域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有不少译著包含了译者的许多订补，甚至较原著更具参考价值。我国学者翻译外国同行西域史著作的传统迄今仍存，但像冯承钧那样精心选择、校订原著、间加己见者，实不多见。

由于受日本侵华和内战的影响，30 年代后半到 40 年代，我国西域史研究一度沉寂下来。但欧美、日本仍然有相当有分量的成果出版，如巴托尔德(W. Barthold)《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35)、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译注《世界境域志》(1937)、恒宁(W. B. Henning)译释的吐鲁番伊朗语文书，托马斯(F. W. Thomas)整理的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以及桑原骘藏、藤田丰八、羽田亨等人的著作。

三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66 年“文革”开始，特别是 50 年代后半到 60 年代前半，西域史研究取了可喜的成果。一些对西域史研究有过贡献的学者，出版了他们的研究专集，如冯承钧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④，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⑤，黄文弼出版了他的考古报告。

---

① 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
② 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贺昌群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年。
③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
④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
⑤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

岑仲勉(1886—1961)汇集已有的研究成果,编成《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①],补充了沙畹《西突厥史料》所辑资料之不足,并就某些专题做了考证。他还编著《突厥集史》二册[②],专门辑录东突厥史料,汉文之外,还利用西人的译本转译了古突厥碑铭。马长寿(1906—1971)撰写了《突厥人和突厥汗国》[③]、《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④]、《乌桓与鲜卑》[⑤]、《北狄与匈奴》[⑥]等,对西域史上一些重要的北方民族做了系统地考证研究。这些著作,代表了西域史研究的水平,而分散在学术刊物上的许多文章,也表明研究的范围正在扩大。

因为受时代思潮的影响,50 年代的研究成果中,有不少中原与西域或中国与中亚诸国的关系史研究,如贺昌群(1903—1973)《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⑦]、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⑧]、陈竺同《两汉与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⑨]、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⑩]等等,也

---

①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

② 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

③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④ 马长寿《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历史研究》1958 年第 3、4 期;收入林干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132—187 页。

⑤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

⑥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北京,三联书店,1962 年。

⑦ 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年。

⑧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

⑨ 陈丛同《两汉与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⑩ 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年。

是西域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而言，50 年代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解放前的战乱，使得整体的研究积累不够；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五六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牵扯了许多学者的精力。1957 年有些学者被错划为“右派”，更丧失了学术研究的自由。这些都影响了西域史研究的发展。

然而，解放后西北交通的进步，使得学者们到新疆地区考察变得较从前方便多了。特别是建国初期，为弄清全国各民族的分布状况，国家组织大批专家学者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综合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各民族简史和简志，其成果大多数是“文革”以后才得以出版的。然而，在民族调查研究的热潮鼓舞下，50 年代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成果。冯家昇(1904—1970)、程溯洛(1913—1992)、穆广文合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尽管只出版了上册①，但对此后的维吾尔族历史研究起了推动作用。此外，还有翦伯赞等编《历代各民族传记汇编》②、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编纂组编《柔然资料辑录》③等。

除了民族调查外，解放后新疆地区随着基础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发掘，也为“文革”后的研究准备了素材。在众多的考古发掘中，尼雅遗址特别是吐鲁番墓葬的发掘

---

①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北京，民族出版社，1958 年。

② 《历代各民族传记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1959 年。

③ 《柔然资料辑录》，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

陆续刊布了考古简报，有些精美的图版还刊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1]、《丝绸之路——汉唐织物》[2]、《新疆出土文物》[3]等上，但除了少数文章外，“文革”期间的西域史研究几近停顿。

如果说在40年代，东西方学者同样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那么，当50年代西方和日本学术重新起步，而六七十年代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的西域史研究却停滞不前。在欧美，有葛玛丽（A. von Gabain）的突厥回鹘研究，贝利（H. W. Bailey）的于阗文解读，乌瑞（G. Uray）的古藏文考释，普里察克（O. Pritsak）对黑韩王朝的研究等；在日本，贡献较多的学者有江上波夫、护雅夫、山田信夫、嶋崎昌、榎一雄、山口瑞凤等。“文革”以后，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中国的西域史研究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和日本。

如果说在40年代，东西方学者同样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那么，当50年代西方和日本学术重新起步，而六七十年代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的西域史研究却停滞不前。

四

“文革”以后，西域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经过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复苏后，从80年代中期以来，进入迅猛发展的阶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此前所不能比拟的，而且专业化越来越强。这一方面是因为高等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是由于与西域史相关的各断代史、专题史，特别是中西交通

①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年。

② 《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

③ 《新疆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

史、敦煌吐鲁番研究、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发掘出不少新资料。而改革开放使得许多研究者得以亲身到欧美、日本，或则收集资料，或则与外国同行切磋。此外，80 年代初以来，成立了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敦煌吐鲁番学会等学术团体，有关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学、丝绸之路、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学术会议，几乎每年都在不同地方召开，出版了一些学术刊物，如《中亚学刊》、《新疆社会科学》、《西域研究》、《新疆文物》、《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西北史地》、《西北民族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敦煌吐鲁番研究》、《欧亚学刊》等，还陆续出版一些西域史的论文集，如《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1]等，也极大地推动了西域史的研究。以下略按所研究的时代和主题，分专题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做一初步总结。

对于史前时期的西域，全疆各地已经发现了许多分别属于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铜石并用、青铜、铁器时代的遗址，但对其年代和性质的判断，各位研究者之间尚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和论著有：王炳华《新疆细石器遗存初步研究》[2]、《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3]，安志敏《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时代》[4]，陈戈

① 《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

② 《干旱地区新疆第四纪研究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收入作者《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年，129—145 页。

③ 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新疆社会科学》1985 年第 4 期；收入作者《丝绸之路考古研究》，146—163 页。

④ 安志敏《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报》1987 年第 2 期，133—152 页。

《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①、《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②，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③等，这些根据众多考古资料而做出的初步总结，代表了目前从考古材料所能认识的史前西域史。

西域自古以来是多民族的聚居地，种族十分复杂。对西域人种的认识，将有助于我们对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的解释。韩康信研究了新疆出土的大部分人骨材料，指出古代西域的各种人种分布情况，他的研究成果已汇集为《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④。目前，使用DNA等科学手段来研究古尸的方法已经提出，徐文堪《新疆古尸的新发现与吐火罗人起源研究》⑤，提示了这一研究方法在判断西域史学界争论已久的“吐火罗人”问题上的价值。

西域自古以来是多民族的聚居地，种族十分复杂。对西域人种的认识，将有助于我们对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的解释。

利用考古材料来研究史籍中所记载的古代民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⑥、王明哲、王炳华的《乌孙研究》⑦、王炳华

① 陈戈《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考古》1987年第4期，343—351页。

② 陈戈《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考古》1990年第4期，366—374页。

③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1卷，1993年，447—490页。

④ 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⑤ 徐文堪《新疆古尸的新发现与吐火罗人起源研究》，《学术集林》卷五，1995年，304—314页。

⑥ 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学刊》第3辑，1990年，1—16页。

⑦ 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①、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②。张广达与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③，结合考古和语言学资料来考察于阗等地的塞种。饶宗颐《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④，从整个亚洲大陆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塞种、胡、瓜州之戎等问题。余太山《塞种史研究》⑤，则是利用东西方文献来全面讨论塞种人的著作，内容涉及贵霜兴起前的各主要中亚民族。他又在此基础上，著《古族新考》⑥，提出西方文献中塞人四部落Asii、Tochari、Gasiani、Sacarauli 可能是中国先秦史籍所记允姓之戎、大夏、禺知(禺氏)、莎车的假说。

对公元前后西域史上的重要民族月氏及其所建立的贵霜王朝的研究，主要有黄靖《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⑦、

---

① 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新疆社会科学》1985 年第 1 期；收入作者《丝绸之路考古研究》，210—230 页。

② 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新疆社会科学》1985 年第 1 期，59—64 页。

③ 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1 期；收入作者《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 年，191—211 页。

④ 此文系为《于阗史丛考》所写序言，见该书 1—13 页；又载《中国文化》第 8 期，1993 年，165—170 页。

⑤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此书有英文本：A Study of Saka History, *Sino-Platonic Papers*, 80, Philadelphia, July 1998。

⑥ 余太山《古族新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此书亦有英文本：A Hypothesis about the Source of the Sai Tribes, *Sino-Platonic Papers*, 116, Philadelphia, September 2000。

⑦ 黄靖《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新疆社会科学》1985 年第 2 期，96—99 页。

《贵霜帝国的年代体系》①和余太山《第一贵霜考》②。至于塔里木盆地及其以东地区汉代以后的月氏人记录，荣新江《小月氏考》有详细论述③。

匈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统治过西域，匈奴的制度和文化都对西域绿洲王国产生过影响。林幹著《匈奴通史》④，并编《匈奴历史年表》⑤，对匈奴及其对西域的统治做了全面的叙述。他编有二册《匈奴史料汇编》⑥，广辑汉文文献中的匈奴资料，极便学人。他还把学者们研究匈奴的主要论文辑为《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⑦。

从汉武帝时始，中原王朝或短或长地统治过西域诸绿洲王国，更增强了双方的联系。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⑧，上编重新检讨关系史，下编研究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张骞、甘英的出使以及地理、职官、年代等问题。80年代以来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对两汉魏晋的西域与中原交往史，有一定的补充，其中马圈湾出土者，有吴礽骧《新获敦煌马圈湾汉简中的西域资料》⑨和胡

80年代以来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对两汉魏晋的西域与中原交往史，有一定的补充。

① 黄靖《贵霜帝国的年代体系》，《中亚学刊》第2辑，1987年，16—50页。

② 余太山《第一贵霜考》，《中亚学刊》第4辑，1995年，73—96页。

③ 荣新江《小月氏考》，《中亚学刊》第3辑，1990年，47—62页。

④ 林幹《匈奴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⑤ 林幹《匈奴历史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⑥ 林幹《匈奴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⑦ 《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⑧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⑨ 吴礽骧《新获敦煌马圈湾汉简中的西域资料》，《西北史地》1991年第1期，1—11页。

平生《敦煌马圈湾简中关于西域史料的辨证》①。包含中亚史料更多的悬泉置出土汉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发表了《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和《敦煌悬泉汉简文选》②，其中有不少关于西域的资料，我们期待着这批汉简的全部整理公布。

尼雅和楼兰两地出土了大批汉文和佉卢文简牍，为研究公元2世纪到4世纪的楼兰鄯善王国提供了中原汉文史籍之外的当地材料。

从20世纪初叶以来，尼雅和楼兰两地出土了大批汉文和佉卢文简牍，为研究公元2世纪到4世纪的楼兰鄯善王国提供了中原汉文史籍之外的当地材料，已经产生了一批中外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5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疆考古工作者又在尼雅和楼兰两地有新收获，这些材料推动了人们对楼兰鄯善的研究，其中侯灿对考古资料和新出汉文简牍做了整理，并讨论了一些相关问题，他的文章已汇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③。林梅村重新翻译了国外出版的部分佉卢文简牍，编为《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④，并解读了几件新出佉卢文书，利用这些新旧资料，重新讨论鄯善王国的世系、地理等问题⑤。

---

① 胡平生《敦煌马圈湾简中关于西域史料的辨证》，《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273—297页。

② 《文物》2000年第5期，4—45页。

③ 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④ 《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⑤ 其相关论文收入作者三本论文集：《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孟凡人先后出版《楼兰新史》[①]和《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②]，提出许多与上述两位学者不同的观点。其他零散发表的重要论文，多收入穆舜英与张平合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③]。1988—1997年之间，中日组成"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对尼雅遗址进行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许多新的考古资料，考察队已出版《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二卷[④]，除调查报告外，第二卷有一组研究论文，讨论尼雅遗址的历史地理、聚落形态和各种出土文物及其反映的问题。

公元四至六世纪，中原分裂为南北朝，势力不强，西域北部或西部的游牧民族异常活跃，其中哌哒是我国前辈学者很少涉及的领域。余太山在一系列研究论文基础上汇成专著《哌哒史研究》[⑤]，填补了我国西域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周伟洲《敕勒与柔然》[⑥]，概述了这两个曾经入主西域的北方游牧民族。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⑦]，通盘叙述了这三个北方游牧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⑧]，则利用新出吐鲁番文书，比

---

① 孟凡人《楼兰新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

② 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 《楼兰文化研究论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④ 《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一)、(二)，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编印，1996、1999年，非卖品。

⑤ 余太山《哌哒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

⑥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⑦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⑧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较全面的阐述了麹氏高昌与东西突厥以及铁勒的关系。

从北朝到隋唐,以青海为根据地的吐谷浑,也把势力扩大到西域南道。周伟洲《吐谷浑史》①,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吐谷浑的著作。另外,他还就吐谷浑人的墓志、文物和藏文材料中的吐谷浑记事发表了专题研究②,并编成《吐谷浑资料辑录》③。周伟洲还著有《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④,主要是探讨北朝隋唐时期西北各民族间的关系问题。

由于吐鲁番出土了大量属于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的文书,使人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的认识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展现了高昌历史的许多真相,填补了西域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也是我国学术界可以夸耀于世界学林的一个方面。

由于吐鲁番出土了大量属于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的文书,使人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的认识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唐长孺对高昌郡军政制度的研究⑤,陈仲安、吴震、王炳华、侯灿、陈国灿、朱雷、姜伯勤、卢开万、王素、孟宪实、张铭心、荣新江等对麹氏高昌政治、经济、制度、宗教、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深入研究⑥,展现了高昌历史的许多真相,填补了西域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也是我国学术界可以夸耀于世界学林的一个方面。近年来,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高昌史稿·交通编》出版⑦,他计

① 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已收入作者《西北民族史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③ 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④ 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⑤ 收入作者《山居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⑥ 有关论文主要发表于《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及《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1990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文物》、《出土文献研究》及《续集》、《新疆文物》、《敦煌吐鲁番研究》等书刊中,其中《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为吐鲁番研究专号。

⑦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高昌史稿·交通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2000年。

划中的五编《高昌史稿》，将全面系统阐述唐朝征服以前的高昌历史的各个方面。

魏晋以降，中亚粟特地区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大批东来，从事商业贸易外，也把西亚的文化传入西域和中原。蔡鸿生对昭武九姓的城邦制度、东方聚落、礼俗、贡物以及唐朝与粟特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他有关粟特和突厥的论文已经汇集为《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①，其中包括对中亚物种和文化东传的研究。马小鹤《七一二年的粟特》②、《米国钵息德城考》③、《公元七世纪初年的粟特》④，利用当地出土文书，结合汉文史籍，对唐朝时期粟特本土做了深入探讨。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⑤，重新检讨了《大唐西域记》、《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西域传》、《册府元龟》的有关昭武九姓的史地记载。姜伯勤利用新出吐鲁番文书，研究了粟特人在高昌王国的情形⑥。荣新江则揭示了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的广泛存在⑦。

---

①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参看拙撰书评，载《唐研究》第 5 卷，1999 年，518—522 页。

② 马小鹤《七一二年的粟特》，《新疆大学学报》1986 年第 1 期，72—81 页。

③ 马小鹤《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第 2 辑，1987 年，65—75 页。

④ 马小鹤《公元七世纪初年的粟特》，《中亚学刊》第 3 辑，1990 年，109—138 页。

⑤ 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 年。

⑥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150—263 页。

⑦ 《西域粟特移民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157—172 页。

北朝隋唐与西域关系更为密切的北方游牧民族是突厥。林幹《突厥史》①,所述比较简略,但后附耿世民对古突厥语碑铭的重新翻译,却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突厥碑铭资料。芮传明参考耿译和西方学者的成果,在《古突厥碑铭研究》②中做了翻译和注释,他还专题探讨了东突厥进兵西域的几次重要事件。至于汉文史料,虽然已有《突厥集史》,但仍有不少工作要做,杨圣敏《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③,即是方便学人的工作之一。在突厥史的研究方面,薛宗正有《突厥史》④,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东西突厥的历史。吴玉贵则从突厥分裂前后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上着眼,他的《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⑤,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间有深入的考证结果。吴景山《突厥社会性质研究》⑥,则重点分析东西突厥的社会性质。林幹还编有两册《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⑦,选录了比较重要的论文,对一些未能选入的论文做了提要。

---

① 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

②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原为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0 年。

③ 杨圣敏《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

④ 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⑤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详参拙撰书评,载《唐研究》第 5 卷,1999 年,499—504 页。

⑥ 吴景山《突厥社会性质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⑦ 《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唐代西域史研究的进步，更主要是得力于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公布的新史料。

唐朝是中原王朝直接控制西域大片领土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前人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这一阶段唐代西域史研究的进步，更主要是得力于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公布的新史料。唐长孺《敦煌吐鲁番史料中有关伊西庭节度使留后问题》[2]、《唐西州差兵文书跋》[3]，张广达《唐灭高昌后的西州》[4]、黄惠贤《从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5]、姜伯勤《吐鲁番文书所见的"波斯军"》[6]、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7]、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8]，都是利用文书材料写成的较为重要的专题研究。新出墓志也是唐代西域史的重要史源，陈国灿《跋武周〈张怀寂墓志〉》[9]、

---

①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992年。

② 唐长孺《敦煌吐鲁番史料中有关伊西庭节度使留后问题》，《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收入《山居存稿》，411—428页。

③ 唐长孺《唐西州差兵文书跋》，《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439—454页。

④ 张广达《唐灭高昌后的凉州》，《东洋文化》第68号，东京大学，1988年；收入《西域史地丛稿初编》，113—174页。

⑤ 黄惠贤《从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396—438页。

⑥ 姜伯勤《吐鲁番文书所见的"波斯军"》，《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改订稿收入《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37—50页。

⑦ 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唐研究》第2卷，1996年，415—436页。

⑧ 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39—354页。

⑨ 陈国灿《跋武周〈张怀寂墓志〉》，《文物》1981年第1期，47—50页。

郭平梁《阿史那忠在西域》[①]、鲁才全《跋武周〈袁公瑜墓志〉》[②]、《武周〈匹娄焕德墓志〉跋》[③]，吴震《唐〈高耀墓志〉补考》[④]，都利用墓志材料来补证中亚史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⑤]，在森安孝夫、白桂思(C. I. Beckwith)等人近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讨论了唐朝与吐蕃、大食对中亚的争夺，特别是系统地把藏文史料引入到唐代西域史的研究中。他的《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⑥]，是对上书的补充。

对安西四镇的个案研究，也是这一阶段的进步。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中苏论战和对李白出生地的追寻，碎叶镇及其与焉耆镇的交替问题，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关于碎叶的地理位置，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强有力地论证其当在中亚阿克·贝希姆城[⑦]。这一结论得到近年发表的出自该城的杜怀宝造像碑的印证，周伟

① 郭平梁《阿史那忠在西域》，《新疆历史论文续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182—193页。

② 鲁才全《跋武周〈袁公瑜墓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8期，1986年，32—40页。

③ 《武周〈匹娄焕德墓志〉跋》，同上书，第9、10期，1988年，49—56页。

④ 吴震《唐〈高耀墓志〉补考》，《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61—67页。

⑤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详参拙撰书评，《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122—123页。

⑥ 王小甫《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4—85页。

⑦ 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收入《西域史地丛稿初编》，1—30页。

洲《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①],据此新材料做了申论。而比较合理的碎叶、焉耆交替说,见王小甫《论安西四镇焉耆与碎叶的交替》[②]。近代以来,和田地区出土了一些唐朝时期的官私文书,张广达与荣新江合著《于阗史丛考》[③],即以出土文书为主要史料来研究于阗历史。他们根据新发表的俄藏和田出土文书和 Hedin 24 号文书的新图版,撰《八世纪下半至九世纪初的于阗》[④],澄清了唐朝统治于阗末期的情况,并提出新的陷蕃年代。荣新江《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⑤]、《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⑥],殷晴《唐代于阗的社会经济生活》[⑦],结合史籍和文书,对唐代于阗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孟凡人探讨了从汉魏到五代宋初的于阗王统[⑧],但推测较多。关于另一绿洲大国——龟

---

① 周伟洲《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唐研究》第 6 卷,2000 年,383—394 页。

② 王小甫《论安西四镇焉耆与碎叶的交替》,《北京大学学报》1991 年第 6 期,95—104 页。

③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 年。

④ 张广达、荣新江《八世纪下半至九世纪初的于阗》,《唐研究》第 3 卷,1997 年,339—361 页。

⑤ 荣新江《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西域研究》1992 年第 3 期,56—64 页。

⑥ 荣新江《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国学研究》第 1 卷,1993 年,401—424 页。

⑦ 殷晴《唐代于阗的社会经济生活》,《新疆社会科学》1989 年第 6 期,67—80 页。

⑧ 有关的三篇文章收入作者《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年,197—231 页。

兹，刘锡淦与陈良伟《龟兹古国史》[①]、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②]，都有一定篇幅叙述唐朝时期的龟兹。吴平凡与朱英荣《龟兹史料》[③]，则辑录了史籍中的龟兹史料。王炳华《唐安西柘厥关故址并有关问题研究》[④]，是利用库车出土文书研究安西镇的成果。

与安西具有同样作用的北庭，是唐朝经营西域北部的基地，前人措意不多。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⑤]，主要是对唐朝时期的北庭史事的研究，涉及交通、地理、职官、年代、史料解说等。孟氏之撰作此书，当与他参与发掘北庭故城外佛寺遗址有关。此寺规模壮观，是西州回鹘王家曾经供奉之寺，因之可以说这一新发现是吐鲁番盆地所存西州回鹘王国之外的最重要的遗迹了，现已出版了考古报告《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⑥]和《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⑦]，唯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探讨的论著尚不多见。

7世纪上半叶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一直与唐朝争夺西域，直至在8世纪末到9世纪中叶唐朝受安史之乱的

---

① 刘锡淦、陈良伟《龟兹古国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② 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③ 吴平凡、朱英荣《龟兹史料》，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④ 王炳华《唐安西柘厥关故址并有关问题研究》，《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收入作者《丝绸之路考古研究》，82—105页，改题为《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

⑤ 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⑥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

⑦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

影响而无力据守西域时,占领了西域广大地区。汉文史料对吐蕃之经营西域记载,散见于大部头的汉文史籍中,不易收罗。苏晋仁与肖练子编《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正》①、苏晋仁《通鉴吐蕃史料》②、范学宗等《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③、汤开建与刘建丽《宋代吐蕃史料集》一、二④,极便学人检索。王尧与陈践《吐蕃简牍综录》⑤,译释了斯坦因所获及解放后新出土的于阗、鄯善藏文简牍文书。他们两位还单独或合作发表过一些有关吐蕃统治敦煌或西域的论文⑥。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⑦,也包括对吐蕃统治于阗史事的探讨。此外,荣新江、张云、殷晴,利用了前人译出的藏文文书,初步研究了吐蕃统治西域的情况。

回纥(后改称回鹘)与吐蕃南北相对,自唐中叶以后成为制约西域北道的强大势力。840 年漠北回鹘汗国破灭后,部众西迁,在天山东部建立西州回鹘王国,元代称作畏兀儿王国。有关回鹘的研究前人已做了不少工作,有较好的基础。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增

---

① 苏晋仁、肖练子《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② 苏晋仁《通鉴吐蕃史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③ 范学宗等《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

④ 汤开建、刘建丽《宋代吐蕃史料集》(一)、(二),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年。

⑤ 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

⑥ 这些文章主要收入两位作者的《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年。

⑦ 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年。

订出版[1]，冯氏还刊布了一些新发现的回鹘文材料[2]。程氏则主要利用汉文史料，研讨了西州回鹘的世系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问题[3]。杨圣敏在编纂上述《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的基础上，撰写了以回纥汗国为中心的通史《回纥史》[4]。与此书同名的林幹与高自厚《回纥史》[5]，却与维吾尔族简史编写组《维吾尔族简史》[6]相似，是维吾尔民族古代通史，从回鹘汗国到清朝维吾尔，均在叙述范围。编年体的则有冯志文与吴平凡《回鹘史编年》[7]。刘美崧《两唐书回纥回鹘传疏证》[8]，对有关回鹘的汉文史料做了精细的注疏。陈高华《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9]，把散在史籍中的资料按编年、记传和散存分别辑录出来，是兼通元史和西域史的专家所做的极便学人的资料集。张广达与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10]，用

---

①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

② 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③ 其论文均收入《唐宋回鹘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④ 杨圣敏《回纥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⑤ 林幹、高自厚《回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⑥ 《维吾尔族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⑦ 冯志文、吴平凡《回鹘史编年》，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⑧ 刘美崧《两唐书回纥回鹘传疏证》，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⑨ 陈高华《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⑩ 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收入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217—248页。

敦煌文书中保存的一篇西州回鹘讲经文，全面地补充了10世纪时西州回鹘官制、僧官制、宗教信仰和所统部族的情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①]，系统勾勒出9、10世纪西州回鹘与沙州归义军的争战与交往，大多为史籍所缺。

敦煌文书中保存的一篇西州回鹘讲经文，全面地补充了10世纪时西州回鹘官制、僧官制、宗教信仰和所统部族的情况。

有关西州回鹘的更重要的材料，是20世纪初以来大量出土的回鹘人自身的回鹘文文献。耿世民发表了许多新发现的回鹘文文献的译释，贡献最多，其中与西州回鹘史关系密切的文章有：《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②]、《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③]，为西州回鹘或畏兀儿王国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本民族资料[④]。前者是研究西州回鹘摩尼教所不可或缺的史料，而后者是复原西州回鹘可汗世系表时所必须参考的。这些社会经济类文书是研究元代畏兀儿社会的主要材料，已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张承志《元代畏兀儿人内部状况》[⑤]做过初步探索。尚衍斌除发表《元代畏兀儿地区社会经济生活探究》以外[⑥]，又出

①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② 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修订本载《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收入作者《新疆文史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354—382页。

③ 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收入作者《新疆文史论集》，400—447页。

④ 其他相关论文，均收入见作者《新疆文史论集》。

⑤ 张承志《元代畏兀儿人内部状况》，《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13—23页。

⑥ 尚衍斌《元代畏兀儿地区社会经济生活探究》，《民大史学》第1辑，1996年，327—346页。

版《元代畏兀儿研究》①,系统阐述了当地的经济制度、农奴制度和经济生活。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社会经济研究》②,所讨论的不仅是畏兀儿地区,还包括河中和塔里木盆地等地区。

8 世纪以来突厥语诸部的西迁,特别是回鹘西迁,对西域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华涛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③,利用阿拉伯文材料与中文资料相印证,论述葛逻禄、回鹘西迁引起的西域地区政治、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变化,包括回鹘在天山东部的发展、西州回鹘疆域、黑韩王朝的兴起等问题。荣新江《龙家考》④,则是利用敦煌史料,来说明回鹘西迁引起的焉耆地区民族的再迁徙。

回鹘的西迁,使得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边也渐渐进入突厥化的过程,但位于盆地西南边的于阗,在 9 世纪中叶吐蕃统治结束之后至 1006 年灭于黑韩王朝之前,曾独立兴盛了一百多年。上述张广达与荣新江《于阗史丛考》,整理了敦煌文书中所存的有关于阗的史料,并探讨了于阗王家世系和于阗人在敦煌的活动。

以喀什噶尔为首都的黑韩王朝,由于在公元 10 世纪第一个接受了伊斯兰教而开创了西域史的新时代。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

① 尚衍斌《元代畏兀儿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

② 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社会经济研究》,《中亚学刊》第 4 辑,1995 年,184—217 页。

③ 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④ 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 4 辑,1995 年,144—160 页。

的圆形地图》[①],介绍了这位黑韩王朝的学者及其著作中有关西域的记载,特别是关于黑韩王朝的记载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由此产生了研究喀什噶里及其著作的一阵热潮。魏良弢在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完成我国第一部《喀喇汗王朝史稿》[②]。蒋其祥《新疆黑韩朝钱币》[③],以新疆新发现的大量钱币资料,对黑韩王朝史做了订补。

辽朝与西北民族关系密切,陈得芝、黄时鉴、周良霄、王治来、余大钧都对西辽史有所贡献。魏良弢《西辽史研究》[④],对西辽的政治、疆域、民族、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纪年等,做了全面的研究。他又有《西辽史纲》[⑤],是在《研究》的基础上,阐述西辽历史发展进程及社会经济文化的总体面貌。

蒙古的兴起及其西征,对西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除畏兀儿王国在蒙元时期一度保存其独立国家外,大多数西域王国为蒙古所灭,而分由察合台、窝阔台汗国或元朝直接统治,其中察合台汗国占据的中亚领地最多。另外,各汗国间对西域之地的争夺,也构成蒙元时期西域史的重要篇章。陈高华在辑录史料的同时,对畏兀儿、哈密

---

① 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收入作者《西域史地丛稿初编》,57—82页。

②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③ 蒋其祥《新疆黑韩朝钱币》,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④ 魏良弢《西辽史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⑤ 魏良弢《西辽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里、哈剌鲁等西域王国的史事及与中原的关系做了研究[①]。杨志玖《元史三论》[②]及一些文章,讨论了西域的一些民族。刘迎胜发表一系列文章和《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专著[③],对察合台汗国统治西域及其与元朝、窝阔台汗国的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明代与西域的交往相对要少,但明代史料却汗牛充栋。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④],汇辑了传记、编年及其他史籍共三十五种中的有关哈密和吐鲁番两地的史料,极便学人。他还撰有《关于明代土鲁番的几个问题》[⑤],讨论吐鲁番地面的土地和人口、速檀的世系、与明朝的关系。

1514 年,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汗后裔萨亦德汗创建叶尔羌汗国,都叶尔羌(莎车),领有西域大部分地区,1680 年并入准噶尔汗国。由于史料较缺,过去人们对此研究不多。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⑥],首次系统地论述了汗国的创建、发展、昌盛、衰落和覆亡的历史,并分析

① 《元代新疆史事杂考》,《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274—294 页;《元代的哈剌鲁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第 1 期,145—154 页。

② 杨志玖《元史三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③ 刘迎胜《西北民族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④ 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⑤ 陈高华《关于明代土鲁番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3 年第 2 期,26—34 页。

⑥ 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年。

概括了汗国内部体制、官制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以天山北麓为主要游牧地的西蒙古各部，在明、清时期分别建立过瓦剌、准噶尔等强大的政权，后者曾占领天山南北，势力强大，其各部间既有分合，又有离徙。郭平梁与纪大椿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十二辑①、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②、《〈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③，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关西蒙古各部的研究，成果很多，形成专书的就有新疆民族研究所《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④、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论文集》⑤、马汝珩与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⑥、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略》⑦、杜荣坤与白翠琴《西蒙古史研究》⑧、王辅仁与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⑨、白翠琴《瓦剌史》⑩等等，代表了明清时期西域史的研究成果。

---

①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8年。

② 《〈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 《〈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④ 《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⑤ 《准噶尔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⑥ 马汝珩、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⑦ 《准噶尔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⑧ 杜荣坤、白翠琴《西蒙古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 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⑩ 白翠琴《瓦剌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在准噶尔兴起以前，南疆地区分裂的察合台后裔，渐渐被白山派和黑山派和卓控制。准部兴起后，白山派勾结准部进入南疆，成为准噶尔汗国的附庸。关于和卓家族，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①，系统地阐述了其来历、世系、相互斗争以及与叶尔羌汗国、准噶尔汗国的关系，说明了清朝灭准噶尔汗国，大小和卓起兵抵抗，最后被清朝平定的历程。程溯洛《论大小和卓木》②，也有所论述。

清朝统一新疆后，设官立职，并广泛推行屯田制度，以期牢固控制。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③，分兵屯、旗屯、犯屯、民屯、回屯、牧厂几类，叙述了清朝在新疆等西北地区的屯田及其作用。另外，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④、齐清顺《试论清代新疆兵屯的发展和演变》⑤，也探讨了兵屯等问题。

中亚浩罕汗国对清朝新疆的侵扰，是 19 世纪中叶西域史的重要篇章。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⑥，对

---

① 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② 程溯洛《论大小和卓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1 期，18—21 页。

③ 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 年。

④ 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

⑤ 齐清顺《试论清代新疆兵屯的发展和演变》，《新疆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56—62 页。

⑥ 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浩罕汗国做了全面的探讨。而平定浩罕入侵势力的清朝名将左宗棠，则是杜经国《左宗棠与新疆》①一书的主题。此外，北京大学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②、郭绳武编《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沙俄侵华史》第三卷④等，也有相当篇幅叙述沙俄蚕食西域领土的过程。

与专题研究相比，通史的编纂相对薄弱。新疆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一册为古代部分⑤，但篇幅不长。王治来的《中亚史》只出版了第一卷⑥，内容从原始文化到阿拉伯的入侵，较前者为详，但未能继续下去。他后来改写《中亚史纲》⑦和《中亚近代史(16—19世纪)》⑧，仍是纲要性通史，较《简史》略详。项英杰《中亚：马背上的文化》⑨，侧重中亚游牧民族文化的叙述。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⑩，是目前集体撰作的最佳通史。他还编有《西域文化史》⑪，可视作《通史》的姊妹篇。

与专题研究相比，通史的编纂相对薄弱。

---

① 杜经国《左宗棠与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③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④ 《沙俄侵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⑤ 《新疆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⑥ 王治来《中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⑦ 王治来《中亚史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⑧ 王治来《中亚近代史(16—19世纪)》，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⑨ 项英杰《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⑩ 余太山编《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⑪ 余太山编《西域文化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5年。

特别是附有译注的一些蒙元史外文史籍的翻译，对西域史研究起了推进作用。

翻译西方和日本学者的西域史研究著作，在此期间也取得相当多的成果，特别是附有译注的一些蒙元史外文史籍的翻译，对西域史研究起了推进作用。史籍类有何高济译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①]、吕浦译道森编《出使蒙古记》[②]、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一至二编[③]、余大钧与周建奇译拉施特《史集》一至三卷[④]、耿昇与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⑤]、耿昇译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⑥]、耿昇译费琅《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⑦]、宋岘译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⑧]；研究著作有耿昇译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⑨]、罗致平译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⑩]、陈俊谋译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

---

① 《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③ 《中亚蒙兀儿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④ 拉施特《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

⑤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昇、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⑥ 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⑦ 费琅《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⑧ 《道里邦国志》，宋岘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⑨ 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耿昇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⑩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史地理学研究》[1]、吴玉贵译汉布里《中亚史纲要》[2]；其中尤以耿昇的贡献最多。

最近20年来，我国学者也陆续把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在西方和日本的学术书刊上，由于西域史是一门极富国际性的学科，所以这对于国际同行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是很有助益的。此外，已出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有我国学者吕遵锷、安志敏、马雍、王炳华、孙毓棠、张广达、穆舜英、王尧、耿世民、王甫仁、刘迎胜等撰写的章节，张广达还是第三卷两副主编之一，我国学者也常常应邀参加有关中亚史的国际学术会议，反映了国际同行对我国学者中亚史研究的成果给予的关注。

总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我国的西域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范围全面展开，在某些课题上较此前的研究深入一步，如西域古人种、高昌国史、西域的粟特聚落、安西四镇、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等。而且，开始了一些新课题的系统研究，如考古所见的塞种和吐火罗人、哌哒史等等。新发现文物以及相关学科如敦煌学的进步，也推动了西域史的研究。而国际交往的扩大，极大地加快了吸收国外同行成果的速度。

---

①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

② 汉布里《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五

我国的西域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帕米尔以东，这既是我们的长处，又是我们的短处。长处在于汉文史料对这一地区记载较多，而在此范围内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可以较快地为我国学者运用到西域史研究中去。相反，我们的短处在于上述地域以外的中亚地区，研究十分薄弱，如在中亚史上影响深远的贵霜王朝，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研究成果，不能与西方学者的成果同日而语，甚至我们还没有全面地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

长处在于汉文史料对这一地区记载较多，而在此范围内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可以较快地为我国学者运用到西域史研究中去。

我国学者对汉文史料的熟悉和运用，是我们研究某些西域史课题之所以能够做出成就的原因所在，特别是目前西方和日本年轻一代西域史研究者大多不具备伯希和那样的汉文水平，更是我们应当发挥所长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知道，非汉语的资料在西域史的许多领域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而我国治西域史的学者虽然大多通晓一两门现代外语，但却没有像陈寅恪那样的能运用多种胡语材料的史学家。当然，随着每一种语言资料的不断增加，目前已经不可能再产生像伯希和和陈寅恪那样的通才了。但我们应当充分掌握西域胡语资料的研究成果。与欧美、日本相比，目前我国西域史研究队伍中，较好地掌握和运用民族语言材料者并不多见。

非汉语的资料在西域史的许多领域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国际学术交往的频繁，便于我国西域史研究者获取国外同行的成果，并使得一些人有机会到国外的学术研究中心，与同行切磋讨论，这当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西域

史研究的进步。但我国西域史研究者的数量过于庞大，一些不具备研究条件的人也混迹其中，不时有抄袭国内外同行的事情发生。甚至一些颇富成果的研究者，由于不注意严格的学术规范，或因为某些杂志的编辑擅自删改，也使得作者自己陷入抄袭的指责中。严格建立学术规范，是健全发展西域史研究、扩大国际学术交流的一项重要任务。

严格建立学术规范，是健全发展西域史研究、扩大国际学术交流的一项重要任务。

不断出土的考古新资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西域史研究的进展。加之汉文史料对新疆伊斯兰化以前的记载比较明确，使得研究伊斯兰化以前的人较多，成果也相对多一些。这就造成了我国西域史研究越来越形成一种重古轻近的倾向。虽然这一现象近年有所改观，但不论是从史学作为一种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着眼，还是从史学应当为国家现实经济建设服务来看，我们都需要更多一些研究伊斯兰化以后的西域史专家，来填补西域史上的许多空白。

不论是从史学作为一种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着眼，还是从史学应当为国家现实经济建设服务来看，我们都需要更多一些研究伊斯兰化以后的西域史专家。

翻译外国同行的优秀西域史研究论著，是促进我们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我国西域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有的优良学术传统，应当继续发扬。但西域史论著的翻译，不同于一般的外文转译，需要在精通外语的同时，掌握一些专业知识。近年来的一些译著，往往附有出自专业人员之手的校注或补注，使得译著在某些方面较原作更胜一筹，这是值得称赞的。但同时也应指出，仍有不少西方、日本的西域史名著没有译出，如伯希和与穆尔合译的《马可波罗游记》和伯希和的《注释》，因而目前还在不断翻印冯承钧的译本。有些优秀著作已经译出，但

近年来的一些译著，往往附有出自专业人员之手的校注或补注，使得译著在某些方面较原作更胜一筹，这是值得称赞的。

西域史著作因大量涉及各种类型的外文,排版不易,迄未出版,如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相对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最难译的应属原始文献,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成果陆续出版。

(原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有删改)

《唐研究》与唐研究

《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及其旨趣

气贺泽保规先生要我给《唐代史研究》写点东西，考虑了一下，觉得自己对于唐史研究可谓乏善可陈，但五年多来编辑《唐研究》，或许可以说是对唐代史研究贡献了一点绵薄之力。编辑中的甘苦且不谈，作为主编，这里结合前五卷的内容，简要介绍一下《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和发表某些文章的旨趣。

《唐研究》是研究有唐一代各个方面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年刊，每年年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正像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许多学术刊物，如《燕京学报》、《学术集林》、《华学》、《敦煌吐鲁番研究》、《学人》、《原学》等等一样，《唐研究》不能与一些学术单位所办的定期刊物相比，因为我们没有《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那样的编辑部、庞大的作者队伍和源源不断的来稿，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当我接手这件事情以后，一位好心的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有句熟语，叫"三期刊物"，你要小心《唐研究》不要成为"三期刊物"。我想中国学者需要纯学术的专门刊物，哪怕只出三期，也是好事。在罗杰伟(Roger E. Covey)先生创办的"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好在已经过了"三期"的劫。

中国学者需要纯学术的专门刊物，哪怕只出三期，也是好事。

我虽然是学习隋唐史出身的，但多年来在敦煌学、西域史的圈子里转，在研究唐史的学者眼中，只能算是唐研

究的外围人员。在1994年年底的"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上,我之所以勇敢地接下来主编基金会学术年刊的任务,是出于某些考虑。一是多年来周游列国,翻阅过大量的西文、日文学术刊物,总觉得我们常常翻阅的中国定期学术刊物有些不足,人情稿件带来的研究不够新颖,不讲求学术规范,没有真正的书评,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需要有和国际接轨的纯学术刊物面世,我在莱顿大学汉学院逗留时间较长,很赞赏《通报》(T'oung Pao)的做法。二是要创办一个研究唐朝各个方面的刊物,只在唐史中转圈子是不行的,而我由于做敦煌学的缘故,不得已而变得有些接近"杂家"了,禅宗、俗文学、艺术史、考古等都弄过一点,而又结识了一大批唐史圈外的各行当的能人,这或许是办综合性刊物的优势。三是我在学界向来是"广结善缘"(施萍婷先生语),平日在北京或在国外,常常给相识或不相识的学者、学生复印材料,相信会有不少学界友人为刊物提供帮助;同时,作为高校的教师,办学术刊物也是训练学生的方法之一,就像《东洋史研究》那样。现在,《唐研究》已经出版了五卷,这是研究唐朝各方面的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特别要感谢的是"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唐研究》编委会成员、匿名审稿的专家和核对史料、寄送稿件样书的北大隋唐史博硕士研究生们,《唐研究》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需要有和国际接轨的纯学术刊物面世。

要创办一个研究唐朝各个方面的刊物,只在唐史中转圈子是不行的。

作为高校的教师,办学术刊物也是训练学生的方法之一。

《唐研究》没有"名人访谈"、"学者笔谈"等栏目,而以国际通用的学术刊物为基本模式,主要内容只有"论文"(包括札记)和"书评"。由于篇幅有限,又是"个体户"式的业余经营,所以我们不能像定期刊物那样面面俱到,而

《唐研究》,主要内容只有"论文"(包括札记)和"书评",

确立自己的编辑方针和选材标准，其核心的一点，就是“新”。

是在分析唐研究学界状况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编辑方针和选材标准，其核心的一点，就是“新”。

最希望发表的文章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变换新视角的论文和札记。

首先，我们最希望发表的文章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变换新视角的论文和札记，也希望有更多的打破学科界线，用综合或比较的方法研究唐朝的论文。在这方面，我们发表了葛兆光《盛世的平庸——八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状况》(卷5)，他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盛唐，得出了与普通人心目中的盛唐所不同的印象；郑学檬《从〈状江南〉组诗看唐代江南的生态环境》(卷1)，则利用一组诗歌，来研究中唐以后南方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高明士《隋唐教育法制与礼律的关系》(卷4)，是透过教育和法制的研究，来揭示专制皇权中礼和律的本质；葛晓音《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卷1)，是从初盛唐取士举人的观念变化、文人干谒方式和精神状态，以及礼贤风气在盛唐的形成等，对盛唐诗歌风貌的综合研究；郑阿财《敦煌灵应小说的佛教史学价值——以〈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为例》(卷4)，则利用敦煌灵验记类的材料来说明其史学上的价值；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卷1)，是利用新发现的壁画材料所做的比较研究。

对于一些传统的问题，我们主要是发表一些新的探索，而对于述论式的文章则拒之。

其次，对于一些传统的问题，我们主要是发表一些新的探索，而对于述论式的文章则拒之。这种新的探讨结果，如制度史方面的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卷3)、阎步克《隋代文散官制度补论》(卷5)、邓小南《课绩与考察——唐代文官考核制度发展趋势初探》(卷2)；政治史方面的耿慧玲《从神龙宫女墓志看其在政变中

之作用》(卷 3);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卷 3);西域史方面的张广达与荣新江《八世纪下半至九世纪初的于阗》(卷 3);文学史方面的陈允吉《〈目连变〉故事基型的素材结构与生成时代之推考——以小名“罗卜”问题为中心》(卷 2)、程毅中《唐代小说文献研究》(卷 5);历史地理方面的王德权《从“汉县”到“唐县”——三至八世纪河北县治体系变动的考察》(卷 5),均非泛泛而论的作品,或者提出了新观点,或者变换了新角度,或者利用了新材料,比传统的认识有所进步。

第三,对于学术界近年来热衷探讨的课题,我们更希望对这方面的篇幅的加大给予鼓励,但有些问题尚在起步阶段,有些课题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比较陌生,所以发表的文章也水准不一。有关社会史的探讨最为欢迎,但目前文章不多,其中黄正建的《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卷 4),是社会生活史的佳作,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多有启发;吴玉贵的《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卷 5),是有关唐朝社会“胡化”的个案探讨,比较深入;冻国栋《隋唐时期的人口政策与家族法——以析户、合贯(户)为中心》(卷 4),是他对人口和家族问题的再研究;王承文《唐代北方家族与岭南溪洞社会》(卷 2),是他研究岭南社会的系列论文中的重要篇章;郝春文《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俗的施舍问题》(卷 3),是研究敦煌僧尼生活的系列成果之一。此外,如东北亚的国际政治,是学界目前争论较多的领域,我们发表了刘健明《一场求不战而胜的攻战——隋炀帝征高丽试析》(卷 1)、韩昇《唐平百济前后的

有关社会史的探讨最为欢迎。

东亚国际形势》(卷 1),仍希望继续这方面的讨论。有关礼制的研究在中国沉寂多年,现在有复兴的趋势,我们发表了史睿的《北周后期至唐初礼制的变迁与学术文化的统一》(卷 3),虽然出自年轻学者之手,但审稿人和发表后反馈回来的信息,都认为这篇文章颇有见地。我们很希望鼓励宗教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道教、民间宗教、三夷教等。道教方面发表了万毅《敦煌本〈升玄内教经〉试探》(卷 1)、刘屹《敦煌十卷本〈老子化胡经〉残卷新探》(卷 2),还是属于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而不是宗教史研究;民间宗教有严耀中《唐代江南的淫祠与佛教》(卷 2),是开拓性的研究,我们非常欢迎类似的研究论文;三夷教则有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卷 4),是出自分别深入研究过祆教、摩尼教、景教的专家之手的宏观论述,值得参考。

我们很希望鼓励宗教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道教、民间宗教、三夷教等。

第四,注重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发表新材料,是《唐研究》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中国考古研究机构的管理体制,考古报告一类新材料,必须首先公布于《考古学报》、《考古》、《文物》和各省的地方考古专刊上,我们也正乐得于发表以新的考古资料为依据而写出的考古学和艺术史方面的论文。在第 4 卷中,我们发表了一组这样的文章:金维诺《唐代在书画理论上的继承与发展》、杨泓《隋唐造型艺术渊源简论》、罗世平《地藏十王图像的遗存及其信仰》、徐殿魁《洛阳地区唐代墓志花纹的内涵与分期》、苌岚《中国唐五代时期外销日本的陶瓷》,加上第 5 卷上沈睿文的《唐昭陵陪葬墓地布局研究》,是涉及唐代艺术史和考古学许多方面的重要成果。新材料包括新找

注重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发表新材料,是《唐研究》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到的传统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前者如卞孝萱《刘禹锡诗何焯批语考订》（卷2）、荣新江与徐俊《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卷5），其中俄藏敦煌写本中发现的专收唐朝女诗人作品的唐诗选集《瑶池新咏》和“女中诗豪”李季兰献给泾原兵变首领朱泚的诗，都是久佚的重要资料，对于唐代文学、历史和女性史的研究都有助益。相对来讲，以新发现的唐人墓志为主的后者，篇幅较多，如臧振《西安新出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铭》（卷2）、葛承雍《新出唐遂安王李世寿墓志考释》（卷3）、刘瑞与穆晓军《唐秘书少监刘应道墓志考释》（卷4）、葛承雍与李颖科《西安新发现唐裴伷先墓志考述》（卷5）、杜文玉《唐慈恩寺普光法师墓志考释》（卷5），对于唐代政治史、民族史、佛教史等方面的研究，这些墓志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今年年底出版的第六卷中，也将发表西安新出土的若干墓志资料。

新材料包括新找到的传统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资料。

最后，在严格把关的前提下，鼓励学生发表他们的新作，也是《唐研究》的既定方针之一。有时候一个研究生花一两年时间来研究一个问题，所得结果往往比一个资深的学者在探讨一个新问题时显得更加准备充足；有时候学生对新问题和新材料有更强烈的敏觉，可以写出颇富新意的文章。前述史睿、万毅、刘屹的文章，以及雷闻《从S.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卷1）、刘诗平《唐代前后期内外官地位的变化——以刺史迁转途径为中心》（卷2）、叶炜《试论隋与唐前期中央文官机构文书胥吏的组织系统》（卷5）等文章，都是学生的习作，在发表前，他们根据导师和审稿人的意见做了充分的改订。虽

严格把关的前提下，鼓励学生发表他们的新作，也是《唐研究》的既定方针之一。

学术刊物的作用之一，就是要推出新人。目前知名的一些研究者，在年轻时往往有连篇累牍地在一种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机会，如岑仲勉、杜希德(D. Twitchett)，使之很快成为唐研究的重镇。

今天中国的中青年学者有着一种冲破旧学术体制的愿望，有勇气来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书评。经营书评的另一想法，是借助这个综合性的刊物，来促进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

然其中有些仍显得有些幼稚，但学术刊物的作用之一，就是要推出新人。目前知名的一些研究者，在年轻时往往有连篇累牍地在一种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机会，如岑仲勉、杜希德(D. Twitchett)，使之很快成为唐研究的重镇。

论文之外，书评是《唐研究》着力经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中国现行的学术刊物在书评方面没有严格的规范，往往都是些一味吹捧的文章，所以书评的组稿有着更多的困难。好在今天中国的中青年学者有着一种冲破旧学术体制的愿望，有勇气来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书评。《唐研究》经营书评的另一想法，是借助这个综合性的刊物，来促进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所以我们希望作历史的来评文学的，作考古的来评历史的，做文学的来评宗教的；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也互相评论；从而达到促进学术交流和对话的目的。但为了保持书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唐研究》采取国际惯例，书评不接收投稿，由我们约请与所评图书研究领域相关的专家或在该领域沉潜有年的学者来撰写书评，书评代表了本刊的水平，所以一般我们是不发表反批评文章的。

已经发表的书评中，有行家评行家，如葛兆光评砂山稔《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又评兴膳宏与川合康三合著《隋书经籍志详考》(以上卷二)，莫砺锋评 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卷 2)、蓝勇评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卷 2)、陈尚君评《全唐文补遗》第一、二辑(卷 3)、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卷 5)等等，都是说到点子处的书

评。有不同学科的评论,刘健明评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荣新江评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卷2)等。也有不同国家学者的评论,如黄正建评堀敏一等编《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の基本问题》(卷4)、赵和平评仁井田陞著、池田温等编《唐令拾遗补》(卷4)、韩昇评堀敏一《中国古代の家と集落》(卷4)、张国刚评 Thomas Thilo, *Chang'an: Metropole Ostasiens und Weltstadt des Mittelalters 583-904*. Teil I:Die stadtanlage(卷4)、Max Deeg 评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卷5)等。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著作的评论,有的以介绍为主,如刘屹评 T. H. Barrett, *Taoism under T'ang*(卷5),但对于许多不懂相关语言的唐研究者来说,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有的书评含有尖锐的批评,如徐俊评张锡厚《敦煌本唐集研究》(卷2)、辛德勇评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3)、杨泓评杨希义等《唐代军事史》(卷5)、荣新江评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卷5)、何德章评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张国刚评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卷5)。

我们发表书评的原则是,朋友归朋友,批评归批评,评书不评人,完全立足于学术,所评之书都是值得评论的书,太差的书我们是不评的。虽然如此,在重礼仪的中国,发表批评话较多的书评,还是会招致许多误解,我也因为坚持不发表反批评文章的学术期刊惯例,而失掉了一些朋友。其实反批评如果有道理,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展开学术争鸣,但有些反批评的文章不过是以所谓"礼"来干预"法",往往回避学术,强调语言不当。已故著

我们发表书评的原则是,朋友归朋友,批评归批评,评书不评人,完全立足于学术,所评之书都是值得评论的书,太差的书我们是不评的。

名唐史专家严耕望先生曾就蓝勇先生在《唐研究》第 2 卷批评他的《唐代交通图考》写给本刊编委刘健明先生一封信，完全接受蓝勇的批评，并且希望蓝勇"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夫，那是更好"(《文史知识》1998 年第 8 期，10 页)。我读了这封信非常感动，这是老一代史学家对学术的真诚，也是对我们书评工作的巨大支持。

此外，我们还发表一些已故唐研究专家的纪念文，已刊者有关于唐长孺、黄约瑟(卷 1)、严耕望(卷 3)的纪念文字和他们的论著目录。

《唐研究》每卷的最后是新书目，原本是按西文杂志的模式，最后是"待评书目"，但目前计算机大大地推动了学术著作的出版速度，第一卷的书目有三页半。池田温先生撰文介绍时说，这些书不可能都要评，所以称作"待评书目"不妥。我们接受池田先生的指正，改作"新书目"，尽可能多地收录前一年内出版的有关唐研究各个方面的学术著作名目，有些出版物，特别是日本和欧美的出版物，往往不能马上在北京见到，所以有时新书目中包含有一些两三年前的书。我们希望经过几年的积累，可以大致提供给研究者一份大体上从 1994 年以来的唐研究书目。

借此机会，向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的同行表示敬意，并欢迎诸位先生把您们的大作和书评投给《唐研究》。

(原载日本《唐代史研究》3，日本唐代史研究会，2000 年)

《唐研究》十周年纪念专号献词

从1995年12月出版《唐研究》第1卷以来，已经十年了。虽然我一向不喜欢在每一卷上写“卷首语”或“编后记”之类的文字，但是在《唐研究》第10卷出版之际，还是有许多联想，编辑中的酸甜苦辣一起涌来，这其中既有审稿的艰辛，又有退稿的难堪，当然还有出版后的喜悦，真想一吐为快。然而，《唐研究》十年来对唐研究到底做了什么贡献，今后的路该如何走，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是更值得思考和总结的。

2000年，我曾在《〈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及其旨趣》一文中，讲述了我们自己的编辑方针和选材标准，即(1)最希望发表的文章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变换新视角的论文和札记，也希望有更多的打破学科界线，用综合或比较的方法研究唐朝的论文；(2)对于一些传统的研究主题，我们主要是发表一些有新探索的论文，而对于述论式的文章则拒之；(3)对于学术界近年来热衷探讨的课题，我们更希望加大这方面的篇幅予以鼓励；(4)注重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发表新材料；(5)在严格把关的前提下，鼓励学生发表他们的新作。我还结合前五卷发表的相关论文，做了简要的论述[①]。从2000年以来出版的后五卷，

① 《唐代史研究》3，东京：日本唐代史研究会，2000年，54—58页。

我们仍然坚持这样的编辑理念，读者只要看一下本卷所收《〈唐研究〉第1—10卷分类目录》，即可明了。我这里只想围绕着编辑《唐研究》过程中所思考的一些有关唐研究的走向问题，略抒己见，这其中包含着我对《唐研究》今后发展方向的思考。

在《唐研究》起步的20世纪90年代中叶，也正是唐史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踏步时期，研究的课题从比较集中的一些方面，逐渐扩大到越来越广阔的领域。这样说，对于传统的课题和现代的课题，并没有任何褒贬的意思。事实上，不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课题，在这十年里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唐代的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方面，《唐研究》上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①]，如陆扬《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卷8)、王素《关于隋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化"问题——以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为中心》(卷10)、雷闻《隋唐朝集制度研究——兼论其与两汉上计制之异同》(卷7)。而所谓现代的课题，是指用新的社会学、宗教学、性别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所做的历史学研究，《唐研究》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鼓励，比如我们发表过有关唐代社会史方面的论文，如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卷5)、王静《唐代长安新昌坊的变迁——长安社会史研究之一》(卷7)；又，有关性别史方面的文章，如刘健明《〈隋书·列女传〉的贞烈观念》(卷7)、范家伟《从〈千金方〉论唐代前期女性

用新的社会学、宗教学、性别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所做的历史学研究，《唐研究》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鼓励。

① 因为前五卷的重要文章在《〈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及其旨趣》一文中已经提到，以下提示的论文，多选自第6至第10卷。

身体观》(卷 8)、高世瑜《唐律:性别制度的法典化》(卷 10)、张国刚《唐代婚姻礼俗与礼法文化》(卷 10),对于唐代妇女史和性别研究,都是有力的推进;还有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的疾病史和环境史,我们发表过范家伟《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卷 7)、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卷 8)。相对来讲,我们应当继续发扬深厚的传统课题研究的强势,同时也要扩大思路,开阔视野,引入新的理论思考,用新的方法来探讨新的问题,拓展唐史研究的各个方面。

扩大思路,开阔视野,引入新的理论思考,用新的方法来探讨新的问题,拓展唐史研究的各个方面。

新的学术领域往往是在跨学科的地方生长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已经突破历史学的藩篱,把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结合起来,他们的成果往往是多领域的。比如黄正建《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卷 10),既是他对社会史中日常生活问题的继续探讨,也是对制度史研究的贡献;朱玉麒《脱靴的高力士——一个文学配角的形成史》(卷 7),对于作为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的高力士,做了历史和文学两方面的考察;罗新《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卷 10),从民族史的视角,来解释唐朝皇帝尊号制度的来源;雷闻《论唐代皇帝的图像与祭祀》(卷 9),主要的着眼点是对国家祭祀礼仪的研究,但同时也是研究唐代美术史的重要收获。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论文,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唐史研究的突破,是我们最为欢迎的文章。

最近十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利用,古籍和参考文献的电子化异常迅速,到目前为止,唐代的文献已经大多数电子化了,给研究者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方便条件。许多以前难以见到的大部头的古籍，如《四库全书》，现在不仅能随意翻检，而且有非常便利的检索工具，可以迅速找到所要翻检的内容，也可以代研究者查找相关词汇。另一方面，轻印刷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印刷的速度和质量，不仅大量文本文献和研究著作大量出版，过去很难看到的敦煌文书、考古文物的图片，也以非常精美的图录形式发表出来，为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研究素材。处在这样一个新资料层出不穷的时代，《唐研究》也部分承担了发表新资料的任务，发表过俄藏敦煌文书中的唐朝女诗人的诗集《瑶池新咏》（荣新江、徐俊，卷 7）、日本园城寺（三井寺）藏唐人诗文尺牍（石晓军，卷 8），还有一些的西安周边出土的唐五代墓志等等。

新材料的大量涌现和近年来唐史研究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加上个人计算机快捷处理文字、图像的方法，使得一项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做出成果。基于这样的认识，《唐研究》从第九卷开始，除特殊情形外（如第十卷作为十周年纪念专号），基本上都采取某一专题研究的专号形式来编辑出版，也就是把该卷的主体论文，集中到一个涵盖面较广，可以做跨学科研究的题目上来。比如第九卷的长安研究专号，其标题是“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除了我的引言《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外，有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孙英

采取某一专题研究的专号形式来编辑出版，也就是把该卷的主体论文，集中到一个涵盖面较广，可以做跨学科研究的题目上来。

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蒙曼《唐代长安的公主宅第》,这些文章大多数都是新的视角,特别是把长安变成一个活的都市来进行研究,而不是仅仅考虑到它是一座城。这样一组文章,连带同一卷发表的相关的一些文章,一起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学术集群,可以集中对某些问题做更为深入细致、更有创新意义的探讨,它所绽开的花朵也显得更加绚丽,更加灿烂。从我们已经得到的反馈来看,这样的专号对于学术的推动要比散发的论文大得多,因此成为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我们强调对于某一专题的细致深入的研究,并不是要引导大家都去做一些专题的探讨,其实,我们更加需要有比较雄厚学养的学者,能够就自己所熟悉的隋唐史的某个方面,发表宏论。我们高兴地看到,在纪念《唐研究》十周年的专号上,一些唐史学界的资深学者,发表了他们对某些问题的宏观看法。如吴宗国《汉唐明比较——兼论中国古代秦以后的社会变迁》、郑学檬《贞观之治和盛唐的人文精神》、高明士《庙学与东亚传统教育》等,这是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的论述文字,是非常值得我们珍视的成果。今后,我们仍然欢迎在每个专题上,能有一些宏观的论文发表。

我们更加需要有比较雄厚学养的学者,能够就自己所熟悉的隋唐史的某个方面,发表宏论。

《唐研究》之所以名为"唐研究",就是希望它不仅仅局限在历史学的范围里,而且也包括对唐朝各个方面的研究。因此,我们一直在努力于发表思想、宗教、语言、文学、文献、边疆民族、中外关系、考古、美术等方面的论文,如葛兆光《盛世的平庸——八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状况》(卷5)、严耀中《唐代江南的淫祠与佛教》(卷

2)、陈万成《杜牧与星命》(卷8)、王育成《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卷6)、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卷4)、葛晓音《论开元诗坛》(卷3)、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卷6)、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卷7)、金维诺《唐代在书画理论上的继承与发展》(卷4)、杨泓《隋唐造型艺术渊源简论》(卷4)、沈睿文《关中唐陵陵地秩序研究》(卷9)等等。但是,相对而言,我们在唐代文学、考古和美术史方面的论文少了些,而事实上我们在这几个方面有着非常雄厚的研究基础和训练有素的一批学者专家,把他们的优秀论文发表出来,将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1995年创办刊物时起,我们遵循国际学术刊物的规范,坚持只发表论文和书评。相对而言,约写纯学术的书评并非易事,而发表带有批评性意见的书评,更是要冒很大的风险。十年过去了,虽然我因为发表批评性的书评而得罪了一些朋友,但《唐研究》却因发表大量的书评而备受好评。我们发表书评的目的,"是借助这个综合性的刊物,来促进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①],我想这个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达到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经过十年的坚持,我们已经拥有一个以中青年学者为骨干的书评撰稿队伍,他们的敬业精神让我钦佩。现在,看到许多中国新出版的学术刊物上的纯学术书评日渐增多,我们对中国学术能够在自我检讨和与同

许多中国新出版的学术刊物上的纯学术书评日渐增多,我们对中国学术能够在自我检讨和与同行比较中更加进步,充满了希望。

① 《唐代史研究》3,54—58页。

行比较中更加进步,充满了希望。我们仍然要坚持评那些值得我们评论的著作,坚持发表批评性的书评。

在过去的十年中,《唐研究》是以汉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为了与国外同行对话,我们每篇文章都附有英文提要,同时也少量发表英文文章。考虑到今后研究唐朝的学者基本上没有阅读汉语的困难,所以我们将尽量把首发在《唐研究》的英文稿译成汉语发表。本卷所收的《剑桥中国史》主编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和他的同事思鉴(Janice Stargardt)女士合作的论文,以及唐研究基金会会长罗杰伟(Roger Covey)先生让我们刮目相看的大作,都是以中文首次发表的。

《唐研究》,顾名思义是专门研究唐朝历史的刊物,当然我们也把与之密切相连的隋朝和五代包括进来。今后,随着研究课题的扩大,特别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从某些新的视角来看唐朝历史的时候,我们将不把涵盖的范围局限在唐朝,只要是和我们研究唐朝有所关联的其他文章,我们也拟发表。今后《唐研究》将更多的以某个专题的形式发表一组文章,在我们拟议中的一些题目,就有不少是跨朝代的"长时段"研究课题,比如我们正在准备的第十一卷"唐宋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就必然会发表一些有关宋代的研究论文。我想这对于唐研究来说将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回首十年的成长历程,应当说《唐研究》得到了唐研究基金会会长罗杰伟先生的大力支持,基金会各位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唐研究》的各位编委给予了直接的鼓励和支持,许多热情的朋友和一群充满活力的青年教师及研

究生为每一卷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对此，我在此郑重表示感谢。更让我感激的是，在我向各位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和《唐研究》编委以及海内外特邀的撰稿人发出十周年纪念号的约稿信后，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本卷《唐研究》汇集了唐研究各个领域的专家们所撰写的最新论文，我相信，它们既是唐研究许多领域的最佳成果，也是《唐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唐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原载《唐研究》第 10 卷，2004 年 12 月）

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

隋大兴城亦即唐长安城①，既是从皇帝、百官到庶民、僧道的生活居住空间，又是帝国各项行政制度运作的舞台，这里是隋唐帝国的核心，因此，对于长安城的理解和研究，是我们研究隋唐时代许多方面的基础。

长安是隋唐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枢，盛唐时代的长安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乃至当时东西方文化的汇聚之都。但从安史之乱开始，长安成为历朝历代军阀劫掠的对象，文化时聚时灭，加上自然力的破坏，使得长安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有关的典籍图书也大多散佚。唐代长安地面上的建筑大多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其昔日的荣光，仍然通过唐朝的地志、画史、碑记、寺塔记以及诗人的吟咏篇什、笔记小说的故事等等，多多少少地保留下来，可以让我们透过文献记载，去想象大唐都市的辉煌。

唐代长安地面上的建筑大多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其昔日的荣光，仍然通过唐朝的地志、画史、碑记、寺塔记以及诗人的吟咏篇什、笔记小说的故事等等，多多少少地保留下来，可以让我们透过文献记载，去想象大唐都市的辉煌。

对于长安，我们已经拥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增补

有关长安的文献，保存下来的主要有开元十年韦述撰《两京新记》残本和北宋宋敏求撰《长安志》，清人徐松以《长安志》为基础，参照其他相关文献，撰成《唐两京城坊考》，成为近人研究长安的奠基之作。在此基础上，近代以来，学者们在《两京新记》的校订、辑佚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②；并且遵循着徐松的做法，发掘古籍文献记载、

---

① 以下为行文方便，以长安城统称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

② 周叔迦《订正〈两京新记〉》，原载《服部先生古稀祝贺记念论文集》，1936 年，503—521 页；收入《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953—968 页；岑仲勉《两京新记卷三残卷（转下页）

考古调查成果以及新出碑志资料，对长安宫室建筑、坊里住宅都进行了大量的增补和考订①。

2. 都城制度及其演变的探讨

长安以其宏大的城郭、整齐的宫城与坊里设计而给人以突出的印象，学者们为了追寻这种都城建筑设计的思想来源，提出了多种说法，探讨了从《周礼·考工记》所记城郭制度以及汉魏以来北方主要王朝的都城与长安城的关系②，虽然迄今尚无一个统一的看法，但这无疑加深

（接上页）复原》，《史语所集刊》第 9 本，1947 年，545—580 页；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 年；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美术研究》第 170 号，1953 年，31—66 页；收入《福山敏男著作集》之六《中国建筑と金石文の研究》，105—184 页；平冈武夫《唐代长安和洛阳·资料篇》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9—30 页；陈尚君《晏殊〈类要〉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323—336 页。

① 主要成果有张忱石《唐两京坊宅补遗》，《古籍整理与研究》1988 年第 2 期，38—72 页；阎文儒、阎万钧编著《两京城坊考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杨鸿年《隋唐宫廷建筑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 年；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② 主要观点见那波利贞《支那首都计画史上より考察したる唐の长安城》，《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弘文堂，1930 年，1203—1269 页；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二章附都城建筑，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Arthur F. Wright, "Symbolism and Func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1965, pp. 667—679；田中淡《隋唐建筑家の设计と考证》，《中国の科学と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 年，209—306 页；妹尾达彦，"The Urban Systems of Chang'a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 D. 583—907", *Historic Cities*（转下页）

了我们对于长安城设计中折中取舍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因素的认识。学者还进一步研究了长安这种整齐划一的都城制度对于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①，以及随着唐朝政治的发展，大明宫、兴庆宫的建立改变了长安的宫室格局，从而影响了唐朝中央的政治格局和制度变更②，甚

（接上页）*of Asia. An Introduction to Asian Cities from Antiquity to Pre-modern Times*, ed. by Muhammad Abdul Jabbar Beg, Malaysia 1986, pp. 159-200；又《长安都市计划》，讲谈社，2001 年；Xiong Cunrui, "Re-evaluation of the Naba-Chen Theory on the Exoticism of Daxingcheng, the First Sui Capital",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5, 1987, pp. 136-166；又"The Planning of Daxingcheng, The First of the Sui Dynasty",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7, 1988, pp. 43—80；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 年，279—285 页；郭湖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宫室制度沿革——兼论日本平城京的宫室制度》，山田庆儿、田中淡《中国古代科学史论（续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1 年，753—805 页；傅熹年《隋唐长安洛阳规划手法的探讨》，《文物》1995 年第 3 期，48—63 页。

① 参看徐苹芳《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 年第 6 期，647—656 页；妹尾达彦《唐代の科举制度と长安の合格礼仪》，《律令制——中国朝鲜の法と国家》，东京，1986，239—274 页；又《唐长安城の仪礼空间——皇帝仪礼の舞台を中心に》，《东洋文化》第 72 号，1992 年，1—35 页；金子修一《唐の太极殿と大明宫——即位仪礼におけるその役割について》，《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 44 号，1993 年，52—64 页。

② 参看佐藤武敏《唐长安の宫城について》，《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记念论集——考古、美术篇》，东京，1976 年，227—241 页；松本保宣《唐后半期における延英殿の机能について》，《立命馆文学》第 516 号，1990 年，71—115 页；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转下页）

至官人的宅第也逐渐从西街向东街转移,形成"东贵西富"的新格局①;而长安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旧有的坊里制度不再适应新经济体制和文化需求,从而导致了坊墙的突破和侵街现象的出现②。

3. 考古发掘的成就

对于长安城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正确认识文献记载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并且把长安局部的研究细致到一砖一瓦。虽然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到目前为止的成果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我们已经从有关考古发掘的报告中,重新认识了唐长安城的地基、坊里的基本情况③,大明宫及

(接上页)僚机构与等级构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又《唐代宫廷防卫与宦官权力渊源》,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年,45—58 页;妹尾达彦《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 年第 4 期,97—108 页;又《中唐の社会と大明宫》,《中唐文学の视角》,东京创文社,1998 年,339—356 页。

① 妹尾达彦《唐长安城の官人居住地》,《东洋史研究》第 55 卷第 2 号,1996 年,35—74 页。

② 刘淑芬《中古都城坊制的崩解》,《大陆杂志》第 82 卷第 1 期,1980 年,31—48 页;氏著《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 年,441—480 页;史念海《唐长安城外郭城街道及坊里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 年第 1 期,1—25 页;氏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272—312 页;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李孝聪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248—306 页。

③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 年第 3 期,79—94 页;陕西省博物馆、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钻探组《唐长安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 年第 1 期,43—46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安定坊发掘记》,《考古》1989 年第 4 期,319—323 页。

其内部含元殿、麟德殿的建筑布局在逐步澄清[①],长安城明德门、含光门的基址有助于推测其壮观[②],大寺院如青龙寺、西明寺、实际寺也部分揭露出来[③],还有西市遗址、何家村宝藏以及扶风法门寺地宫等处的发掘[④],都为长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实物资料。

4. 历史地理研究的丰富成果

对于长安城及其周边地域的历史地理学考察,取得

---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马得志《1959—1960年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7期,341—344页;刘致平、傅熹年《麟德殿复原的初步研究》,《考古》1963年第7期,385—392页;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第7期,30—48页;又《唐长安大明宫玄武门及重玄门复原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131—158页;又《对含元殿遗址及原状的再讨论》,《文物》1998年第4期,76—8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341—406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33—39页;傅熹年《唐长安明德门原状的探讨》,《考古》1977年第6期,409—412页;马得志《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5期,441—448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322—327、321页;又《唐长安青龙寺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231—262页;又《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45—55;安家瑶《唐长安西明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唐研究》第6卷,2000年,337—352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248—250页;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30—42页;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1—26页。

了丰硕的成果。在这方面，大到长安城周边的环境变迁、自然山河对城市的影响、长安与各地的交通路线，小到坊里名称的变化，宫室、寺院或住宅的位置所在，都有不同层次的探讨①。

然而，相对于长安的重要性来说，我们对于它的研究还是非常不够的，涉及的方面也不够广泛。特别是多年来的长安研究，主要局限在历史地理、考古、都城建筑等学科范围，而没有和长安丰富的历史内涵结合起来。

笔者在研究隋唐史和敦煌学的过程中，不断在思考一个问题，即长安是兴盛的大唐帝国的首都，敦煌是唐朝丝绸之路上的边陲重镇，由于特殊的原因，敦煌藏经洞和敦煌石窟保留了丰富的文献和图像数据，引发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敦煌学研究热潮；相反，虽然有关长安的资料并不少于敦煌，但因为材料分散，又不是集中被发现，所以有关长安的研究远不如敦煌的研究那样丰富多彩，甚至也没有建立起像“敦煌学”那样的“长安学”来。然而，只要我们读一下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关于长安千福寺的记载，看一看《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关于其家

长安是兴盛的大唐帝国的首都，敦煌是唐朝丝绸之路上的边陲重镇，有关长安的研究远不如敦煌的研究那样丰富多彩，甚至也没有建立起像“敦煌学”那样的“长安学”来。

① 主要成果见武伯伦《古城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 年；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1—3 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85 年；李之勤《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 年；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 1 辑），西安，1998 年；又《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 2 辑），西安，1999 年；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 年；又《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 年。

藏文献文物的有关文字，我们就可以断言，敦煌资料的丰富远远不能和长安相比拟①。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惊叹于敦煌艺术的精美，那当年长安寺院的图画一定更加精美绝伦；如果我们说敦煌文献丰富多彩，那也只是长安寺院藏经阁或学者书斋的冰山一角。

如果我们惊叹于敦煌艺术的精美，那当年长安寺院的图画一定更加精美绝伦；如果我们说敦煌文献丰富多彩，那也只是长安寺院藏经阁或学者书斋的冰山一角。

为了追寻长安昔日的辉煌，笔者组织了《两京新记》读书班，希望借助这部开元十年的著作，部分复原盛唐长安的景象，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长安的社会、文化等等方面。

长安的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读书班更加强调以下几方面的研究视角。

1. 打破从北到南的长安文献记载体系，注意地理、人文的空间联系。

因为自从《两京新记》以来，有关长安坊里的专书都是从北向南依次叙述的，这种叙述方式必然影响到研究者对长安的理解，使得人们常常更多地考虑南北坊里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与东西相邻坊里的联系。其实，由于长安北面是皇宫禁苑，虽然有南墙上的三座门通向城南广阔的天地，通向终南山，乃至巴蜀湘江。但从社会生活、东西交通等诸多角度来说，从金光门到春明门和从延平门到延兴门的两条大街，对于长安的意义更加重要。即使北面被皇城隔断的部分，东西的关联也大于南北，如《两京新记》记辅兴坊金仙、玉真二女观称：“此二观南街，东当皇城之安福门，西出京城之开远门，车马往来，寔为

从社会生活、东西交通等诸多角度来说，从金光门到春明门和从延平门到延兴门的两条大街，对于长安的意义更加重要。

① 参看荣新江《盛唐长安：物质文明闪烁之都》，《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47—53页。

繁会。而二观门楼、绮榭，耸对通衢，西上夷夏，自远而至者，入城遥望，窅若天中。”东西南北的道路，把一些里坊从空间上联系起来，使得坊和坊之间的一些建筑物得以归入一组，而坊里之间一些人物的交流情景也就浮现出来，这在唐代的文学作品中有生动的写照①。

2. 从政治人物的住宅和宫室的变迁，重新审视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

过去研究发生在首都长安的政治事件的论著，很少注意事情发生的地点和与事件相关的人物所处的地理位置，陈寅恪先生曾强调玄武门的地理位置及其地势高低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重要性，是关注地理因素在政治事件中所起作用的少有的做法。其实，不论是玄武门之变还是唐朝前期历次宫廷革命，皇帝和争夺皇位的双方所处的地点，都是取胜与否的重要因素②。而仔细分析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的争夺皇权的斗争各方所居住的地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李氏家族和武、韦集团成员，是泾渭分明地分别住在宫城和皇城东西的大坊中的③。而唐玄宗以后不再发生皇子争夺政权的流血事件，和玄宗把皇子集中到长安城东北角的十六宅加以集中管理有密切关系④。

不论是玄武门之变还是唐朝前期历次宫廷革命，皇帝和争夺皇位的双方所处的地点，都是取胜与否的重要因素。

① 《唐研究》第9卷所收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即从文学作品中揭示了许多长安坊里间的人物关系。

② 参看孙英刚《唐前期宫廷革命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2001年，263—288页。

③ 参看《唐研究》第9卷所收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和蒙曼《唐代长安的公主宅第》两文的相关部分。

④ 参看《唐研究》第9卷所收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

内侍省从太极宫掖庭西南角隅之地，迁徙到大明宫右银台门内唐朝中枢神经的核心地带，为中晚唐宦官专权创造了有利的地理空间。

唐朝中央的职官设置和运作，更是与相关职官的衙署密切联系在一起。开元时玄宗听政于兴庆宫，天宝以后诸帝转移到大明宫起居，都对唐朝中央官僚体制和权力结构产生重大影响[①]，其中内侍省从太极宫掖庭西南角隅之地，迁徙到大明宫右银台门内唐朝中枢神经的核心地带，为中晚唐宦官专权创造了有利的地理空间[②]。从政治人物的活动地点和一些重要的官府所在地，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唐朝政治史的演进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

3. 走向社会史，对于长安进行不同社区的区分并分析研究。

前人已经总结出长安城内坊里"东贵西富、南虚北实"的特征，妹尾达彦先生对于唐朝官人从西街向东街的迁徙走向做过详细的研究，给我们以许多启发。长安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会，其城内范围之广阔，其与城外别墅、山林、寺院的广泛联系，构成长安城内外的不同区域特色，从社会史的角度来探讨长安城内城外这些不同区域的特点，将会使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到长安社会的一些细部，同时也可以揭示出长安社会的一些变化情形。由于吐鲁番文书中幸存下来唐朝前期新昌坊当铺的文书，对比唐后期文人官僚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细微地观察到唐代前后期新昌坊的人文和自然景

① 参看王静《唐大明宫的构造形式与中央决策部门职能的变迁》，《文史》2002 年第 4 期，101—119 页。

② 参看王静《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燕京学报》新十六期，2004 年，89—116 页。

观的变化[1]。而条理分析终南山与长安城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让我们看到长安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2]。

4. 找回《两京新记》的故事,追索唐朝长安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神灵世界。

从目前保存下来的《两京新记》卷三的抄本和《太平广记》保存的一些佚文来看,《两京新记》区别于《长安志》以下记载长安坊里的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伴随着一些著名的建筑物,不论是贵族百姓的住宅,还是官衙或寺宇,都有生动的传说故事。有些故事在后人看来荒诞不经,所以被《长安志》的作者、正统的历史学家宋敏求删削殆尽,但事实上这些故事恰恰反映了长安居民的宗教信仰,并且赋予某些建筑物以人文色彩。《长安志》以下的长安坊里研究,受宋敏求的影响至巨,今人的研究更是以考证地理位置、新增宅第为主要目的,只要见到一方墓志,即补一个宅第,甚至使父子异户,夫妻分居,我曾在课堂上戏称长安研究几成"录鬼簿"。其实,把《两京新记》散失的故事找回来,我们可以从中聆听到长安居民讲述的美妙传说,观察长安居民的神界鬼蜮,思索长安居民的精神境地。那些今天看来是荒诞的故事,才是长安历史的真实;那些鬼怪传说,才是长安的精神世界。

把《两京新记》散失的故事找回来,我们可以从中聆听到长安居民讲述的美妙传说,观察长安居民的神界鬼蜮,思索长安居民的精神境地。那些今天看来是荒诞的故事,才是长安历史的真实;那些鬼怪传说,才是长安的精神世界。

长安是唐朝最辉煌的佛寺道观所在,但丰富多彩的

① 王静《唐代长安新昌坊的变迁——长安社会史研究之一》,《唐研究》第7卷,2001年,229—248页。

② 参看《唐研究》第9卷所收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

佛教、道教研究论著中，大多数是有关宗派和人物的研究，很少涉及他们所住或所学的寺院。长安的佛寺道观既是名僧高道的修习讲学之地，也是皇家、贵族、官僚、百姓供养的对象，它们和世俗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唐朝前期的几个皇帝，都和某所大的寺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寺院有的是他原来的本宅，像唐中宗和荐福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非同一般①。即使是保存下来的材料十分稀少的祆教神祠，如果汇集各地祆祠的有关记载，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长安祆祠的社会功能②。对于长安各种宗教寺宇及其相关人物的研究，必将加深我们对唐朝宗教、信仰以及宗教社会史的认识。

长安的研究充满了魅力，长安的研究也是颇有收益的。我们的读书班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已经陆续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上面提到了从我们的研究视角出发所取得的一些初步成果。我们编辑这卷以“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为题的研究专辑，为的就是集中展示长安研究的成果，我们邀请了妹尾达彦、齐东方教授赐以专文，并汇集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如关于祭祀、台阁、陵墓的研究，我想这必将大大丰富人们对长安社会、文化的认识，推进唐代历史的研究。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我所主持的“《两京新记》读书班”的研究工作，得到北京大学“盛唐研究”计划的资助，

---

① 孙英刚《长安与荆州之间：唐中宗与佛教》，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25—150页。

② 参看荣新江《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与祆祠的社会功能》，《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385—412页。

并得到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大力支持，没有这里的丰富藏书，也就无法开展这项研究工作。

（原载《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

——新问题与新探索

（《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导言）

在今天的中国，宗教和社会往往是相互分离的，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派别虽然也不同程度与社会相关联，但总的来讲和世俗社会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普通人的宗教观念十分淡泊，而且大多数人都认为宗教是科学的对立面。

处在中古时期的唐朝，宗教和社会却是密不可分的，大到国家的礼仪祭祀，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和各种宗教仪式和信仰联系在一起。

然而，处在中古时期的唐朝，宗教和社会却是密不可分的，大到国家的礼仪祭祀，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和各种宗教仪式和信仰联系在一起，甚至我们今天放入科学技术史里讨论的一些问题，如天文、历法、印刷术，实际上当时都是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唐朝，宗教与社会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是统一的一个整体。

过去对唐代宗教史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宗教本身，即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范畴里，而很少和社会联系在一起来考察。

大概是由于受到今天人们对于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观念的影响，过去对唐代宗教史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宗教本身，即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范畴里，而很少和社会联系在一起来考察。葛兆光最近回顾了近二十年来有关禅宗史的研究，不能不说成就极其辉煌，仅大陆作者的专著，就有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①、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②、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③、杜继文和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④、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⑤、麻天祥《中

①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 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③ 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

④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⑤ 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国禅宗思想发展史》[1]、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2]等等。但是，他指出："关于禅思想的分析，在如今的禅宗史或禅思想史著作中，常常是哲学式的，那种把禅思想本质化、哲学化的趋向，可能会得到超越时代和超越生活的道理，也可能成为精英们创造自己哲学思想的资源，但是，它常常使禅思想变得像离开水的鱼的标本，尽管永恒却无生命。"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由于禅思想在当时绝不是一种悬浮在历史时空之上的超越哲学，所以，如果不把禅思想放置在当时社会生活和思想环境中，是无法理解禅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中的意义的"。他强调说："众所周知，思想史近来有和社会生活史靠拢的趋势，之所以有这种趋向，是因为那些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只有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它才真正地成为人们思考和行动的资源，而它要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它就必须回应社会生活提出的问题，正如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所说的那样，思想史处理的问题，主要是人们如何对他所生活的环境进行有意识的回应，以及这种回应是否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变化[3]。如果我们理解'回应'(responses)一词本身就包含着'社会生活的背景'和'对社会生活背景的回答'

---

① 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② 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③ 见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

两方面，那么，我们应当承认汉语中的一句老话‘一个巴掌拍不响’，禅思想本身只是思想史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需要考察的，则是迫使禅思想只能这样回应而不能那样回应的社会生活环境。”[①]事实上，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不仅在禅宗研究上与社会史的关照相脱节，在唐代其他宗教史的领域里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应当明确地指出，离开了社会生活来研究唐代的宗教，显然是不全面的，其结论也必然是有局限性的。

正是出于上述思考，我们在构思北京大学“盛唐研究计划”时，就拟定了“唐代的宗教信仰与社会”这一主题。本书的最终编辑，正是在这样的考虑基础上来进行的，即从唐代宗教与社会的关联处着眼。但是，我们同时也抱有另一个想法，即我们虽然在约稿时尽量考虑唐代宗教的各个方面，但不追求教科书式的面面俱到，而是根据参加本书撰写的各位学者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尽可能深化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把相关的学术领域向更广、更深的地方拓展。因此，我们希望收入本书的论文，追求新材料，探索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共同构筑一部有关唐代宗教与社会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专著。

以下一方面回顾近二十年来唐代宗教与社会相关的研究状况，另一方面提示本书各篇文章的问题点和新收获。

---

① 葛兆光《历史、思想史、一般思想史——以唐代为例讨论禅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荣新江编《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6—7页。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有关唐代宗教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唐代宗教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兴趣，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比较集中的研究成果，一本是伊佩霞(Patricia B. Ebrey)与葛里高里(Peter N. Gregory)合编的《唐宋的宗教与社会》①，但与主编本来的想法有悖，该书所收论文只有一篇真正属于唐代的范围，尽管一些论文在讨论宋代的现象时也追溯到唐朝，可是这种状况正好说明美国的中国学家们更偏重于宋代以后的研究。另一本是吉川忠夫编的《唐代的宗教》②，系编者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持的以"唐代宗教之研究"为名的研究班的成果报告论文集，其中也有部分文章涉及佛教、道教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民间信仰问题，但研究的视角仍然是传统的家族、士大夫与佛教关系问题，该书更为厚实的成果是日本学者所擅长的文献研究。

道教对于李唐王朝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道教与唐代社会的关系较为紧密。这也是我们一反过去先佛教后道教的编纂体例，而把与道教相关的文章放在唐代宗教信仰研究首要位置的原因。

有关道教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过去学者们的主要着眼点是道教与帝王或王朝政治的关系，如吕锡琛《道家、

---

①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② 《唐代の宗教》，京都，朋友书店，2000 年。参看葛兆光书评《重新清理唐代宗教的历史》，原载《佛学研究》第 9 期，2001 年；收入氏著《域外中国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98—107 页。

方士与王朝政治》[1]、巴瑞特(T. H. Barrett)《唐代的道教》[2]。对于道教的民间信仰,也有一些文章讨论,但比较零散。有关唐代道教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敦煌道教文献上,特别是表现重玄思想的《升玄内教经》和《太玄真一本际经》[3]。

本书所收葛兆光《最终的屈服——关于开元天宝时期的道教》一文,指出现在道教史研究著作把盛唐道教描述成"上清一系的兴盛"之不足,仔细分析了这种历史书写产生的缘由,利用碑志、小说等史料,重构了开元、天宝时代各种系统的道士活跃的风景。在此基础上,与道教史研究者普遍关注当时政府对于道教(也包括佛教)的国家管理的视角不同,他指出:从唐初以来,"道教尤其是上层人士逐渐放弃了它在世俗生活中可能导致与政治权力冲突的领域,逐渐清除了可能违背主流意识形态和普遍伦理习惯的仪式和方法,逐渐遮蔽了那些来自巫觋祝宗的传统取向。"而"已经渐渐屈服于主流伦理的道教,再一次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进行整合,使整个道教的仪式、方法和组织,更附着于国家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伦理道德,同时也更多地迎合着上层士大夫的趣味和爱好,成

① 吕锡琛《道家、方士与王朝政治》,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 *Taoism under the T'ang. Religion & Empir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History*, London: The Wellsweep Press, 1996. 参看刘屹书评,载《唐研究》第5卷,1999年,486—496页。

③ 关于敦煌道教文献研究史的清理,可参看刘屹《论二十世纪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提交"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论文,北京理工大学,2002年8月。

为上层社会和主流思想所接纳的思想资源。"他对于盛唐道教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最终的屈服"的分析,也可以用来理解有着同样走势的佛教、景教,以及不"屈服"的摩尼教在唐代社会中的不同遭际。

对于盛唐道教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最终的屈服"的分析,也可以用来理解有着同样走势的佛教、景教,以及不"屈服"的摩尼教在唐代社会中的不同遭际。

国家礼仪与佛道二教及民间信仰的关系,是唐代宗教与社会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富安敦(Antonino Forte)关于武则天时期明堂与佛教关系的研究①,熊存瑞通过太清宫、九宫贵神等祭祀来对唐玄宗时期道教对国家礼仪变革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②,以及章群《唐代之祠庙与神庙》对唐代祠庙问题的系统探讨③,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但这些论著虽然从不同角度对于唐代国家祭祀与宗教关系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将国家祭祀与民间祠庙过分对立起来,或者将民间祠庙完全等同于"淫祀",这对我们探讨隋唐时期国家祭祀与宗教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本书所收雷闻《五岳真君祠与唐代国家祭祀》一文,以开元年间五岳真君祠以及青城山丈人祠和庐山九天使者庙的建立,作为一个整体的个案,来讨论当时的道教代表人物司马

① Antonino Forte,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 the Tower, 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88.

② Victor Xiong, "Ritual Innovations and Taoism under Tang Xuanzong", *T'oung Pao* 82, 1996, pp. 258—316.

③ 《严耕望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119—150页;又收入氏著《唐史札记》第九节,题为《祠庙与神庙》,台北,学海出版社,1998年,111—148页。

承祯试图以道教的理论来改造国家祭祀系统的努力。他还进而讨论了国家祭祀、道教信仰和民间崇拜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大，司马承祯改造国家祭祀的努力是不可能完全成功的，但这一事件的一个结果，是道教仙真高于国家岳神的观念却深深影响了唐代的民间信仰，使得国家祭祀在很大程度上贴近了民间社会，而不仅仅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国家礼仪了。雷闻所研究的个案，提供给我们认识国家与不同层次的宗教相互影响的很好的视角，其结论对于我们理解唐代礼制与宗教的复杂关系，也是非常有益的。

中古时期的佛教和道教围绕“老子化胡说”的斗争，不仅与王朝政治息息相关，而且也影响到士大夫和民间社会对于佛道的取舍，因此是一个研究宗教与社会以及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包括摩尼教、景教）的重要问题。本书所收刘屹《唐代道教的“化胡”经说与“道本论”》一文，在全面系统地清理南北朝到隋唐，特别是从唐初到玄宗时期，围绕“化胡经说”和“道本论”，国家与佛道双方交涉的历史脉络后，指出李唐皇室与道教在利用“化胡经说”处理佛道关系方面所体现出的与前代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即以道教的“道本论”为指导，“化胡经说”逐渐不再针对夷狄或是佛教发难，而是将老子的教化对象，扩展到古今中外一切文明，试图将天地万物和各种文明教化，都归根于老子一人和道教的根本——“大道”上来。这篇文章对于唐代“化胡说”的彻底清理，深化了我们对于唐朝前期李唐皇室和官僚士大夫们宣扬和禁毁《化胡经》的因果关系的认识，有助于理解唐朝前期的道教、佛教与国家

政治的互动关系。

佛教无疑是唐代最为流行的宗教,也是今天学者们讨论最多的主题。在学者们继续对唐代佛教的宗派及其学说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有一些学者更关注佛教与社会的关系。本书虽然把有关道教的研究放在首位,但有关佛教的研究仍然是分量最多的组成部分。

佛教与王权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对象,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一些帝王与佛教的关系上,如唐太宗与佛教、武则天与佛教,以及武宗灭法等,并且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少受到注意的问题,即唐中宗在唐代佛教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本书所收孙英刚《长安与荆州之间:唐中宗与佛教》一文,全面讨论了中宗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和非常特殊的机缘。他指出,李显出生时曾得到高僧玄奘法师的庇佑,并得到高宗赐号为“佛光王”,在神龙元年(705)武则天被推翻,李显恢复了李唐名号后,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宗并没有按照常理改变武则天的崇佛政策,转而利用道教,反而大加修饰自己在藩时的宅第所改建的荐福寺,把一些重大的宗教活动、著名的大德高僧多安排在该寺,使之成为整个长安乃至唐帝国的宣教中心、译经中心。同时他还在复辟后,邀请自己流放时居住的荆州地区的大批僧人来京,充实内道场,为自己的宗教活动服务。这篇文章突破了研究帝王与佛教的传统做法,而从个人的因缘、身世和政治斗争的背景来加以解说,并且充分考虑了时间和空间的转换,把王宅和寺院,京城和流放地联系起来,使得一些不明的问题可以浮现出来,填补了唐代宗教与政治关

系的重要一章，并为理解睿宗、玄宗提升道教地位的做法给予了解说。

佛教与王权的关系还包含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佛教对传统中国礼法的影响。本书所收严耀中《论佛教戒律对唐代司法的影响》一文，着重讨论了唐代法律文献的内容和文字所包含或体现的佛教戒律内容，唐代司法实践中体现的佛教戒律精神以及佛教观念和戒条对案例审定的影响这样两个前人忽视的问题，使我们对于佛教与唐代法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篇文章实际上开启了一项新的探索，而且突破了仅仅从帝王与佛教的关系来看佛教对王朝政治的影响，深入到佛教对于制度影响的层面。

近二十年来石刻史料的大量出版，推动了研究者对地方佛教社会和下层民众佛教信仰的研究。虽然有关唐代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像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那样的集大成的著作①，但有关的研究成果却已经不少，如唐耕耦《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唐代社邑》②、刘淑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经幢研究之一》③、又《从本愿寺石刻看唐代获鹿的地方社会》④、耿慧玲《由墓志看唐代取

---

①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② 唐耕耦《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唐代社邑》，《文献》1989 年第 1 期。

③ 刘淑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经幢研究之一》，《史语所集刊》第 67 本第 1 分，1996 年，145—194 页。

④ 刘淑芬《从本愿寺石刻看唐代获鹿的地方社会》，《劳贞一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兰台出版社，1997 年，119—151 页。

佛教化名号的社会现象》[1]等等，相信这方面的研究还会越来越多。在这方面，有待发掘的新材料仍有不少，气贺泽保规编《中国佛教石经的研究——特别以房山云居寺石经为中心》一书，即是利用近年全部公布的房山石经资料作为研究基础的[2]，而张总近年来利用中国学者便利的条件，一直穿行在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去搜寻新的石刻佛经材料，他贡献给本书的《陕西新发现的唐代三阶教刻经窟初识》一文，是他新发现的石刻佛经中最重要的一处，因为其中所刻唐代三阶教信行禅师所撰的三部经，虽见于三阶教经典目录，却不仅不见于诸本藏经，也不见于已知的敦煌写本和日本古寺所藏三阶教典籍，可以说是多年来有关三阶教的重大发现。三阶教在唐朝初年曾一度在社会上盛行，信行的思想对于民众的生活方式影响至巨，以致引起朝廷的注意，最后遭到禁止。因此，张总对于这处长安附近三阶教刻经窟石经的研究，必将推动有关唐代三阶教与民间社会关系的深入研究。

利用其他史料来研究世俗佛教信仰以及更广义的民间信仰，也是近二十年来的重要成果。在这方面，欧美学者从西方宗教理论来看唐代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问题，成果突出，如太史文(Stephen Teiser)《中国中世纪

---

① 耿慧玲《由墓志看唐代取佛教化名号的社会现象》，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693—723页。

② 《中国佛教石经の研究——房山云居寺石经を中心に》，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6年。

的鬼节》①、又《十王经以及中国中世纪佛教的炼狱观念之形成》②、杜德桥(Glen Dudbridge)《唐代的宗教体验与民间社会》③,等等。中国学者也有不少这类讨论发表,集成专书的有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④、贾二强《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⑤、又《唐宋民间信仰》⑥,严耀中《江南佛教史》⑦和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⑧,也都有一定的篇幅谈到地方信仰和民众信仰的问题,严耀中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文章⑨。在研究一种民间信仰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及其社会功能时,书写的文字

---

①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参看杨继东书评,载《唐研究》第 2 卷,1996 年,470—474 页。

②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参看杨继东书评,载《唐研究》第 3 卷,1997 年,483—486 页。

③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 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 i-ch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参看赵宏勃书评,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2 卷,2000 年,519—522 页。

④ 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0 年。

⑤ 贾二强《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

⑥ 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

⑦ 严耀中《江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⑧ 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⑨ 严耀中:《唐代江南的淫祠与佛教》,《唐研究》第 2 卷,1996 年,51—62 页;又《敦煌文书中的"平等大王"和唐宋间的均平思潮》,《唐研究》第 6 卷,2000 年,19—26 页。关于淫祠问题,还可参看 David McMullen, "The Real Judge Dee: Ti Jen-chieh and the T'ang Restoration of 705", *Asia Major*, 3rd serial. Vol. 1, 1993, pp. 1-81;黄永年《说狄仁杰的奏毁淫祠》,《唐史论丛》第 6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58—67 页。

经典往往具有局限性，因为在一个只有少数人才有受教育机会的社会里，宗教观念的传播在许多场合下与经典没有关系①，而绘画和雕像是这种民间信仰的重要传播途径。本书所收李凇《龙门石窟唐代天王造像考察》一文，就是他系列考察唐代龙门石窟、敦煌石窟、长安寺院的天王图像及世俗天王俑的第一篇论文，这项研究将对中国天王图像的发展、由来、形式与意义、审美趣味与文化观念等问题进行系统的讨论，而本文对龙门石窟天王图像及相关的天王信仰的研究，使我们对于天王图像的性质和功能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在一个只有少数人才有受教育机会的社会里，宗教观念的传播在许多场合下与经典没有关系，而绘画和雕像是这种民间信仰的重要传播途径。

除了属于意识形态的信仰问题之外，佛教也和实际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陈明为本书撰写的《沙门黄散：唐代佛教医事与社会生活》一文，利用传统文献、石刻材料、敦煌文书等，全面讨论了唐代佛教医药的具体内容，以及佛教医事与民间社会生活的双向互动关系，并分析了佛教医事与佛教戒律及现实政制的冲突，从而总结了唐代佛教医事的时代特征。这是从医学和佛教相结合的角度，来讨论佛教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这一研究模式也可以扩大到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他宗教领域，因此，本文在唐代宗教史研究上有举一反三的意义。

由于敦煌文书中蕴藏着丰富的有关敦煌地方社会的各种原始材料，其中尤以唐后期、五代、宋初的资料最为

① 参看 David Johnson ed., *Ritual and Scripture in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Five Studies*, Berkeley: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Project, 1995 所收论文。

丰富。近年来,敦煌文书的大量公布,使得学者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料来研究敦煌佛教社会史,在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1956)、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有关敦煌部分(1982)的研究基础上,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1]、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研究》[2]、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3],分别对敦煌的佛教依附人口、寺院经济、僧尼生活做了系统的考索。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整个中古时期中国佛教社会史都具有参考意义。

保存大量民间实际应用文献和文书的敦煌写本,在研究唐代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方面的功用还有待开发。

然而,保存大量民间实际应用文献和文书的敦煌写本,在研究唐代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方面的功用还有待开发。本书所收余欣《禁忌、仪式与法术——敦煌文献所见中古时代出行信仰之研究》一文,就是利用敦煌占卜类文献、具注历、愿文、牒状、入破历、契约等,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讨论中古时代与出行信仰有关的各种问题,包括出行禁忌、行神信仰、出门仪式、禳灾辟邪的诸般法门、为行人祈福的各种方式等,本文打破了敦煌文献和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之间的壁垒,揭示了敦煌数术文献在中国数术史研究上的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以及敦煌民众诸种宗教信仰的混杂背景,并使我们对于唐代敦煌庶民社会的生活方式有了具体的理解。

---

①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② 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研究》,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

③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有关唐代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景教的研究，最近二十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的研究着眼于中外关系，有的则偏重于宗教本身。在这方面，以林悟殊成绩最为突出，他整理出版相关的论文为《摩尼教及其东渐》①、《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②、《唐代景教再研究》③三部著作，对三夷教各方面的问题都有接触和讨论。在这样的学术研究背景下，林悟殊贡献给本书的《唐代三夷教的社会走向》，是他对蔡鸿生先生最近提出的"摩尼教异端化，火祆教民俗化，景教方伎化"这一概括性认识的展开论述，并对三夷教在唐朝的影响和最终消亡给予了合理的解释。

祆教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但由于祆教流入中国以后，其宗教性不如其他宗教那样强烈，因此有时很难对其宗教属性加以判定，由此也就产生了不少歧异的看法。本书所收荣新江《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与祆祠的社会功能》一文，在辨析有关胡人聚落首领萨保的史料基础上，利用新发现的安伽墓等考古资料，指出萨保的宗教信仰应当和聚落内部的大多数胡人一样，是祆教而非佛教，并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胡人祭祀祆神的宗教活动中心——祆祠的社会功能。

摩尼教也是当前国际学界的研究焦点，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利用吐鲁番发现的各种中古伊朗语和突

①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台北，淑馨出版社，1997 年。

② 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年。

③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厥语的摩尼教残卷,来说明相对完整的三种汉译摩尼教经典文字的含义,从而获知摩尼教融入中国社会的程度。马小鹤在发表了一系列摩尼教专有名词的不同语言对证之后,又根据吐鲁番新出土的粟特文摩尼教信札,为本书撰写了《粟特文'δw wkrw'ncmn(二部教团)与汉文"四部之众"》一文,分辨出摩尼教徒分出家男女弟子二部和在家男女信徒二部的做法,即汉文《摩尼教残经》用佛教术语所说的"四部之众"。此概念的确定,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敦煌吐鲁番摩尼教文献中的"二部教团"或"四部之众",从而对摩尼教徒与世俗社会的关系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有关唐代景教的研究文献早已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发现,甚至多少年来被当作景教文献加以研究的某些敦煌"景教"写本,都受到了真伪不明的强有力质疑,比如"小岛文书"可以肯定将被剔除于今后的景教研究视野。因此,对于明确属于唐朝景教文献的《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应当给予格外的重视。然而,经过学者三百年的研究,特别是最近发表的伯希和(Paul Pelliot)的详细注释[①],大家不禁要问《景教碑》还有多少研究余地?本书所收段晴《唐代大秦寺与景教僧新释》一文,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给我们带来了信心。她对照叙利亚文献所记录的景教的传统,在《景教碑》的佛教、道教词汇背后,

---

①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 by Paul Pelliot, ed. with Supplements by Antonino Forte, Kyoto: Scuol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and Paris: Colle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96.

找寻出唐代景教“寺”和“僧”的本来含义；并根据碑上僧侣的叙利亚语职衔，搭建起真正意义上的东叙利亚基督教会，使唐朝之景教教会的结构轮廓凸现：其设施以教堂为主，拥有主教、执事长等完善的组织结构，并且拥有一批信众。这篇从旧史料中读出新内容的文章，不仅增加了我们对唐代长安景教教团的认识，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唐代的宗教信仰与社会这一课题，内容丰富多彩，本书力图以深化的、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共同构筑一个比较综合的学术专著，希望能在此领域里迈出厚重的一步，在唐代宗教史研究上留下一个坚实的脚印，也希望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震撼效果，更期望开启一个个讨论的话题，吸引更多的学者来参与这一课题的研究。

最后，我在此向为本书贡献大作的各位同仁表示感谢，并且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原载《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 8 月）

二十一世纪的敦煌学

敦煌学:二十一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

1930年,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正如陈寅恪先生在文中指出的那样,在当时,“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刚刚从国外游学回来的陈先生,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指出了二十世纪敦煌学迅猛发展的趋向,诚可谓远见卓识。

敦煌学的发展,虽然受到材料分散、内容庞杂、语言多异等种种困难,但各国学者孜孜不倦,苦心孤诣,使敦煌学日新月异,加之敦煌文献陆续公布,敦煌考古也续有发现,到了八十年代,敦煌学一跃而成为世界学林中的一门显学。

事实也正是如此。就以关于敦煌的学术会议为例,1983年在兰州,1984年在巴黎,1985年在乌鲁木齐,1986年在台北,1987年在香港和敦煌,1988年在北京和京都,1990年在威尼斯、台北和敦煌,1992年在北京,1993年在香港和敦煌,1994年在敦煌和柏林,1995年在嘉义,1996年在成都和兰州,1997年在伦敦、布达佩斯和杭州,等等,几乎每一年都有综合的或专题性的敦煌学术讨论会召

开。明年(2000 年)6 月 22 日,将迎来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在此前后,北京、敦煌、蒙特利尔等地都将举办高水准的敦煌学国际会议。

此外,除了创办《敦煌学》、《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等杂志和专刊外,还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据我和赵和平先生在编辑《敦煌学大辞典》时初步统计,自 1980 年至 1994 年,海内外出版的敦煌学研究专著共有近四百种之多。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以主题检索的方式查有关"敦煌"的著作,映入眼帘的多达数百个名目。敦煌只是唐朝边疆的一个小州,但有关敦煌的著作远远多于唐朝的都城长安的著作。

敦煌只是唐朝边疆的一个小州,但有关敦煌的著作远远多于唐朝的都城长安的著作。

敦煌的魅力何在?敦煌学的研究范围有多广?

从陈寅恪先生《劫余录序》的上下文来看,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以后随着敦煌当地考古工作的进步,特别是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敦煌汉简、吐鲁番文书、西域文书的大量出土,以及海内外所藏敦煌绢纸绘画等美术品的发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敦煌学的内涵,扩大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和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

在这一范围内,仅就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来说,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比如有关历史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利用敦煌资料,来研究北朝隋唐均田制、赋役制、租佃关系、寺院经济、法制文书、氏族、兵制、归义军史、唐五代西北民族、丝绸之路等等,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同时,在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等学科,也利用敦煌资料,有程度不同的学术贡献。由于中国学者在八九十年

代的突出表现,可以说,在敦煌汉文文献方面,国外的研究者越来越少,中国的研究者越来越多。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一些出版社对敦煌写本的影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系列大型图录正在陆续出版,如《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加上编辑中的《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将极大地改变过去阅读资料的局限,而《俄藏敦煌文献》等首次刊布的新材料,也必将推动敦煌学许多领域的具体研究。

然而,从整个学术史的发展来看,在中国敦煌学的热闹背后,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学贯东西而又对敦煌文献做过深入研究的周一良先生,在《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序》中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中华书局,1984)后来,他又在《何谓"敦煌学"》中进一步指出:"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文史知识》1985年第10期)

目前的敦煌学研究,有一种就敦煌而说敦煌的倾向,把自己完全封闭在敦煌学的范围里,使敦煌学的路子越走越窄。

周先生的看法极有见地,敦煌学的确是一门不成系统的学问。但敦煌学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独特的研究对象,可以作为一门学问而存在。这里特别提请人们注意周先生提出这一看法的原因,是目前的敦煌学研究,有一种就敦煌而说敦煌的倾向,把自己完全封闭

在敦煌学的范围里，使敦煌学的路子越走越窄。我们切不可把敦煌学孤立起来，而应当利用各个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敦煌吐鲁番材料，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敦煌的问题，这样往往可以在自己所研治的对象之外获得更多的知识。

我们切不可把敦煌学孤立起来，而应当利用各个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敦煌吐鲁番材料，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敦煌的问题，这样往往可以在自己所研治的对象之外获得更多的知识。

敦煌资料的大量公布，使得一些个案研究得以深入，所以近年来对敦煌文献的分类研究，如书仪、变文、佛经目录、社邑文书、星图日历、俗语词、归义军文书等方面的工作，确实比前人更为完善。但我们没有像王重民先生那样的大家，我们对整个敦煌古籍还没有清楚的把握，也没有能够把世界各地的敦煌目录统编为一个分类目录，我们也没有像日本人那样编出一套《讲座敦煌》。在深入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目前敦煌学的研究有着忽视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和超出个案研究的弘篇巨制等问题。

现在我们距离二十一世纪还有不到一百天的时间，在即将来临的新时代里，敦煌学还能否成为世界学术的新潮流，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敦煌写本的编目、整理、校录、考释和敦煌学的个案研究，仍将在二十一世纪持续下去，而且相信会做得越来越精细。但从敦煌学的资料来看，还有不少可贵之处没有得到充分发掘，从大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还有不少课题可以开拓。这里仅从四个方面，来展望一下新时代的敦煌学。

一、中古时代的宗教史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圣地，敦煌藏经洞中出土的写本主体内容是佛教文献。藤枝晃教授曾经警告敦煌

巴黎伯希和敦煌写本丰富的世俗文书，把大多数敦煌学者引入到社会经济史和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去了，而忽视了敦煌写本的主题是佛教这一点。

学界，巴黎伯希和敦煌写本丰富的世俗文书，把大多数敦煌学者引入到社会经济史和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去了，而忽视了敦煌写本的主题是佛教这一点。日本学者曾经从宗派的立场出发，对禅宗、净土宗等不同佛教宗派的文献作过细致的研究，在这些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各个宗派间的关系、佛教宗派与世俗社会的关系、佛教教团与统治集团和下层民众间的关系等等问题，仍然有着广阔的天地。

道教是另一个重要的宗教史研究课题，因为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道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从被农民起义利用的“三张伪法”，变成李唐王朝的“国家宗教”，其历史过程值得深入探讨。敦煌文献中因为保留了许多南北朝到唐朝时期的道教佚经，使道教史的内容得到了相当丰富的补充。在这一领域，欧美和日本学者，贡献尤多。道教是更具中国特色的宗教，也和中国的政治、社会紧密相关，值得从历史的角度来深入研究。敦煌文献的另一特点，是具有唐代边疆的地域性和远离政治中心的民间性质，道教典籍也不例外。由此可以考察道教的地方特性和对西方影响的深度问题。

敦煌文献的另一特点，是具有唐代边疆的地域性和远离政治中心的民间性质，道教典籍也不例外。由此可以考察道教的地方特性和对西方影响的深度问题。

从西亚、中亚传入的袄教、摩尼教，对北朝、隋唐社会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袄教是古老的波斯发源的宗教，由于粟特人的中介而广泛流传于中国北方。粟特地区持续不断的考古工作和粟特语文献的陆续解读，使我们可以重新阐释敦煌吐鲁番汉文文献和图像资料中的袄教内涵，并由此扩展到整个中古中国一些现象的理解。吐鲁番出土了大量的中古伊朗语和回鹘语的摩尼教经

典，利用这些伊朗语学者解读的材料，与敦煌出土的汉文摩尼教经典相发明，仍是研究摩尼教在中国流行问题的重要课题。

二、唐朝各个阶层的社会和文化

敦煌莫高窟是今天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最集中而且最丰富的唐朝文化景观，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也是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最为集中和最为丰富的唐朝图书博物馆了。但在唐朝时期，这里不过是边陲城市周围的一所佛教石窟，而藏经洞文献，在我看来，也不过是敦煌十七个寺院之一——三界寺图书馆的藏书。不论绘画还是文献，都无法与同时期的唐朝都城——长安和洛阳相媲美。但不论长安还是洛阳，以及唐朝大大小小的州郡，地面的建筑现在都已经荡然无存，而中原和东南文化昌盛之区，由于没有西北干燥的自然保存条件，留存下来的文献往往都是出自社会精英阶层人物之手的著作，它们反映了唐朝的上层社会和精英文化，但这并非唐朝社会和文化的全貌。敦煌的绘画和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唐朝社会文化的立体图像，这里既有经师们读的《尚书》、《礼记》等儒家圣典，也有学仕郎抄写的《论语》、《孝经》练习册；既有高僧读的唯识学经典，也有老百姓听讲的变文；既有文人雅士读的《文选》和李白诗歌，也有农夫乡民唱的俚曲小调；既有艺术家创作的壁画雕塑，也有画工照猫画虎的平庸复写。我们从文献和绘画中，可以看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的不同景象。这样丰富多彩的立体画面，是在敦煌之外很难集中找到的，为社会史和文化史

敦煌的绘画和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唐朝社会文化的立体图像，我们从文献和绘画中，可以看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的不同景象。

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三、吐蕃王朝对敦煌的统治与汉藏文化交流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乘虚而入，占据了唐朝河西、陇右大片领土。自 786 年至 848 年，吐蕃王朝一直占领敦煌，对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阶段留存下来丰富的藏文和汉文材料，但由于古藏文资料的语言障碍和吐蕃时期十二生肖纪年法在文书系年上造成的困难，使得敦煌学界对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研究远远不能与其前的唐朝时期和其后的归义军时期相比。但随着大量古藏文文书渐渐有了汉、日、英文的翻译以后，必将推动这方面的历史研究。而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也正是吐蕃王朝从唐朝大力汲取文化营养的时期，敦煌文献中保留了大量的汉藏文化交流的史料，包括唐朝政治制度的影响，汉地禅宗的输入，其他宗教派别的渗透，等等课题，都可以由此而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

四、用本民族的史料研究西北民族史

敦煌不仅出土了大量的汉藏文写本，也有多少不等的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等语言文字所写的文献和文书，莫高窟的壁画上，除了与写本同样的文字外，还有晚期的西夏文和蒙古文。在这些语言文字当中，有些更是属于自十一世纪以来就灭绝的“死文字”，但它们记录了丝绸之路各个民族的历史，特别是操各自语言的本民族的历史。敦煌位于东西南北各民族交往的孔道上，

沿丝绸之路的各个古代民族,对于东西方文明的传播都有所贡献,这可以从敦煌出土的这些各民族文献材料本身得到印证。同时,由于这些民族传世的文献绝少或是根本没有传世作品,过去我们对于这些民族的认识都是来自其周边较大的政治、文化势力,如汉文史料中各个封建王朝正史的四夷传,观念上不免有所偏见,取材上也有不少限制。敦煌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大量各民族语言的材料,包含有大批文书档案,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民族的历史。但由于这些文书解读上的困难,真正的历史研究恐怕要等到二十一世纪才能充分开展起来。

汉文史料中各个封建王朝正史的四夷传,观念上不免有所偏见,取材上也有不少限制。敦煌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大量各民族语言的材料,包含有大批文书档案,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民族的历史。

我们乐观地相信,只要把眼界放宽、各个学科之间能够相互沟通,加强国际协作,取长补短,不断总结提高,敦煌学仍然能够在二十一世纪保持青春活力,继续开拓出学术的新天地。

(原载《辞海新知》No. 5,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年 6 月)

敦煌文献:新材料与新问题

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敦煌学之所以一直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而长盛不衰,原因之一是敦煌文献材料在不断地公布。

虽然说敦煌文献早在1900年就由王道士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但是,敦煌文献真正为人所知,应当是1909年伯希和(Paul Pelliot)带着他所得到的敦煌四部古籍的精品来到北京,出示给罗振玉等人。此后,由于罗振玉、蒋斧、王仁俊、刘师培、伯希和、内藤虎次郎等人的宣说和研究成果的刊布,使得敦煌文献的价值大显于世。

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不是一下子就都被发表出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只能像挖宝似的去巴黎、伦敦抄录或拍照,按自己的兴趣来研究。合中外学人综合来看,其中无疑以王重民先生的成就最大。他编纂或参与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古籍叙录》,一直到今天,仍为学界所利用。

自从六十年代初英国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公布主要藏卷后,学者们开始能够较广泛地研究敦煌文献的各个方面。由于中国的“文革”,日本学者在佛典、港台学者在四部书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七十年代末,收藏非佛教

文献类写本最多的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卷全部公布，极大地推动敦煌文献的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者，利用法图、英图和北图三大馆藏资料，在敦煌文献各个方面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九十年代以来，敦煌文献四大藏家的最后一家——俄藏敦煌文献开始全面公布，北图也开始发表内容可观的未刊资料，而中国各个小馆藏的资料也陆续公布出来，其中不乏文献精品，如北京大学、天津艺术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的一些藏卷。这些出版物为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的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全新的材料，但敦煌文献研究要保持其世界学术新潮流的地位，还需要我们思考新问题，利用新方法，做出新的贡献。

敦煌文献研究要保持其世界学术新潮流的地位，还需要我们思考新问题，利用新方法，做出新的贡献。

首先，在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即将全部出版的时刻，我们应当着手进行对敦煌文献的总体研究。照我看来，敦煌藏经洞文献原是属于莫高窟前三界寺的图书，是这个不大的佛教庙宇中供养具的组成部分。我们应当用中古佛寺文献构成的方式，来复原敦煌文献的原貌。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任务，是在各个馆藏目录和出版品目录的基础上，编辑一个接近原貌的分类目录。但这要求我们对中古时期敦煌佛教寺院文献构成和同时期其他地区佛寺收藏的入藏经典和藏外图书的情形，都有全面清楚的了解。

我们应当用中古佛寺文献构成的方式，来复原敦煌文献的原貌。

其次，在敦煌文献全面公布以后，应当在过去分类整理敦煌文献的工作基础上，再提高一个层次。把敦煌文献，特别是其中的四部书写本，按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来编排，校录出“定本”，使学术界拥有一个像标点本《二十

四史》那样的本子,把敦煌文献的研究成果贡献给各个学科,使敦煌文献成为人们都可以使用的材料。此外,适应新的学术研究需要,应当在作"定本"的同时,使敦煌文献电子化,制成电子版的敦煌文献合集。应当打破商业经营的观念,在国家资金或基金会的支持下,使电子版成为世界学界可以利用的新资源。

出土文献虽然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但大多数是代表着地方文献系统,可以前后发明,左右互补。

再次,敦煌文献是出土文献的一部分,和大体同时代的吐鲁番文书关系密切,也和秦汉以来的出土文献有密切的关联,因为这些出土文献虽然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但大多数是代表着地方文献系统,可以前后发明,左右互补。而且,敦煌、吐鲁番仍然不断出土类似的文献材料,为敦煌文献的研究不断注入活力。因此,应当把出土文献的特殊整理和研究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加以总结,甚至应当编写一些教科书,以便不断培养新生力量,同时也使在基层最早接触新出土文献的考古工作者具有最基本的方法和手段。

最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文献从一开始就散在世界各地,客观上也推进了欧美、日本学者在敦煌学领域的研究。由于近水楼台,不少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值得我们认真吸取他们的成果。目前,"海外汉学"是热门,翻译的著作也出版了许多,但这些翻译或介绍存在很多偶然性,所译介的著作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敦煌学方面过去译过不少法文和日文著作,但近年来却渐渐减少。要做好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应当有系统地把国外学者的权威著作和以论文形式发表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可以用翻译的形式,也可以用其他

的形式，把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熔铸到新的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当中去。

只有不断取用新材料，使用新方法，思考新问题，才能在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的学林里，保持敦煌文献研究的新潮流，让古老而残缺的敦煌文献，焕发出新的活力。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 年第 1 期）

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

目前我们非常需要真正的学术史,但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有两难。一是现代学者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而且能够名登学术史大雅之堂的人物,往往是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者,要弄明白他们的学术的来龙去脉并且给予恰当的评价着实不易,这对于和所研究对象同行的学者来说或许稍微好些,但对于常常是非同行的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者来说往往是个难题。二是现代学者人物众多,他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又极其错综复杂,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者大多与政治或多或少地有所关联,使得现代学术史的研究更加需要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和了解,这对于以中国近现代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来说或许易于着手,但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者来说却往往没有精力去翻检大量的近现代的报刊、档案等材料。

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即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

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一些敦煌学史著作,只是根据已经发表的研究论著来罗列成果,比如说某一年陈寅恪先生写了什么文章,取得了什么看法,如此而已,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即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要撰写这样的学术史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本文只就贯穿整个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问题,做一番清理,并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一、"可恨可喜"与"以德报怨"

由于清朝的腐败,敦煌的偏远,1900 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及时为中国学者所知。1907 年和 1908 年,藏经洞的精华先后被斯坦因(A. Stein)和伯希和(P. Pelliot)攫

取到手，运送伦敦和巴黎。不论斯坦因还是伯希和，在他们攫取到这些古老写卷的时候，就对它们的学术价值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也知道自己虽然付了一点钱，但获取这样巨大的宝藏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定是一种伤害。可是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他们拿去了多少东西，却了然无知。甚至就在1908年8月伯希和经过北京时，他在京师图书馆告诉缪荃孙说："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或许是伯希和所说对于关注中国四部典籍的清朝学者来说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也可能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实物，因此，缪荃孙只说了一句"奇闻也"[①]，而没有当回事。

1909秋，伯希和由河内再度来到北京，随身携带着大概是他正在研究而没有随大宗收集品寄回巴黎的敦煌写本四部典籍、古文书等。这次，罗振玉等人得以亲睹敦煌古写本的真貌，大为惊叹。罗振玉当时的心境，可以从八月十九日他给《时务报》主持人汪康年的信中看出：

> 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木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

① 引文见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戊申（1908）十月廿五日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5册，2118页。

毛实君，余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1]。

两天后，恽毓鼎在参加宴请伯希和的聚会后也在日记中说这些珍本"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2]。罗振玉、恽毓鼎的态度应当可以代表当时中国学人的真正态度，即法国人伯希和将敦煌古书捆载而去，是极其可恨的事。罗振玉觉得可喜的一点是，他们可以从伯希和那里影印、传抄其中"小半"部分，殊不知伯希和带到北京的，只是其敦煌所得汉文文献约五千件中的几十件而已，这还不包括当时中国学者不知道、更不了解其学术价值的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等各种语言文献和美术品。如果中国学者真的知道伯希和以及此前已经被斯坦因攫取到手的敦煌宝藏的真实情况的话，想必更是悲恨交加。

如果中国学者真的知道伯希和以及此前已经被斯坦因攫取到手的敦煌宝藏的真实情况的话，想必更是悲恨交加。

还有一个可悲的事情，就是罗振玉等人从伯希和处听说石室尚有存者之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自己亲自去一趟敦煌，而是向官府打报告，派甘肃巡抚去搜检。结果官府办理此事者马虎其事，让王道士窝藏了不少，路上还有遗失。可以说，清末中国的学者是书斋中的士大夫，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感，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训练，所以敦煌宝藏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

清末中国的学者是书斋中的士大夫，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感，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训练，所以敦煌宝藏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

①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169—3170页。

②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53—454页。参见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63—64页。

必然结果①。

大概由于端方的介绍，也可能是伯希和本人把这样珍贵的材料出示给要求观看的北京学者②，并允许大家拍摄、抄录，还答应把带回巴黎的卷子照相寄来，因此，伯希和这个“可恨”的西洋年轻人，却受到京师一批硕学鸿儒的盛情款待。同年9月4日，京师学者以侍读学士恽毓鼎为首，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招待会的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忞、学部参事兼大学堂毛诗教习江瀚、大学堂尔雅说文教习王仁俊、国子丞徐枋、大学堂音韵教习蒋黼（一作斧），还有董康、吴寅臣等，都是当时任职学部或在京师大学堂教书的一批著名学者③。对此，伯希和显然非常感动，他在巴黎做讲演时说：

> 同伴先归，所得之物大宗随之，余则视印度支那如故乡，睽隔多年，亟欲知彼中人事之变迁、学界之动作，乃往河内，留四月，复来中国，为购书也……巴

---

① 参看荣新江“Ye Changchi: 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IDP NEWS*, No. 7, Spring 1997, pp. 4—5；又作者《敦煌学新论》（敦煌学研究丛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82页。

② 关于伯希和是否主动给中国学者看敦煌卷子，仍然是个问题，参看孟宪实《伯希和、罗振玉与敦煌学之初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12页。

③ 与会名单见汪康年《汪穰卿笔记》、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原载《燕尘》第2卷第11号，1909年11月，此据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这些人物在京师大学堂中的身份，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31—346页。

黎图书国库支那书籍为十八世纪教士所搜集，甚不敷用……乃于北京、南京、上海三处买印本书约三万册。至是，邦人委托之事一律报命。正欲回国，而敦煌得宝之风声藉藉传播。端制军（端方）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制军人颇殷勤，屡次接见余，礼有加焉。至北京，行箧尚存秘籍数种，索观者络绎不绝。诸君有端制军之风，以德报怨，设盛宴邀余上坐。一客举觞致词，略云：如许遗文失而复得，凡在学界，欣慰同深。已而要求余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还中国。闻已组织一会，筹集巨资，以供照印之费云。此事余辈必当实心为之，以餍彼都人士之意①。

中国学者一旦知道了敦煌宝藏的秘密，立刻觉察出这是关乎中国考据学的一个生死问题。

从伯希和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学者一旦知道了敦煌宝藏的秘密，立刻觉察出这是关乎中国考据学的一个生死问题，所以在南京先见到伯希和的端方，先是想把其中的一部分买回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中国学者又集巨资，请伯希和代为拍照为精印本寄来。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人更是抓紧时间，前往伯希和寓所抄录他所带来的敦煌文献。他们抄录的文本和以跋语的形式所做的研究很快刊布，如同年 9 月 25 日罗振玉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②、年底以前王仁俊辑印的

① 沈纮翻译《伯希和氏演说》，载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之《流沙访古记》，叶 36－37；又见《敦煌丛刊初集》7，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198—208 页。

② 《东方杂志》第 6 卷第 10 期，1909 年，42—67 页。

《敦煌石室真迹录》①、年底或下一年初罗振玉辑印的《敦煌石室遗书》和蒋斧《沙州文录》及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②，构成了中国敦煌学，也是世界敦煌学的最初一批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不能不说是伯希和在材料上的恩赐，因此罗振玉说这是可喜的一面。

在招待会上，恽毓鼎代表中国学者的致词，表现了更为宽广的胸怀，即把敦煌遗文的失而复得，看作是整个中外学界“欣慰同深”的事情，所以才对伯希和能够表现出“以德报怨”的高尚态度。伯希和对此显然非常感激，所以对于中国学者提出的影印写本的要求，表示“实心为之”。事情也确实如此，伯希和陆续寄来一些四部要籍的写本照片，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1910 年，罗振玉编成《石室秘宝》③，首次刊行敦煌写本照片。1911 年初，刘师培撰成《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④。以后，罗氏又陆续在《佚籍丛残初编》⑤、《鸣沙石室佚书》⑥、《鸣

---

① 《敦煌石室真迹录》，宣统元年(1909)国粹堂石印本。

② 后两者均收入《敦煌石室遗书》，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诵芬室排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3 编第 6 册、《敦煌丛刊初集》第 6 册。

③ 罗振玉编《石室秘宝》，1910 年罗氏影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6 编第 10 册、《敦煌丛刊初集》第 9 册。

④ 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1911 年《国粹学报》第 7 卷 1 至 8 期陆续刊出，1936 年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第 63 册。

⑤ 《佚籍丛残初编》，1911 年《国学丛刊》摹抄刊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4 编第 3 册。

⑥ 《鸣沙石室佚书》，罗氏宸翰楼影印本，1913 年；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4 编第 5 册。

沙石室佚书续编》①、《鸣沙石室古籍丛残》②、《敦煌零拾》③、《敦煌石室遗书三种》④、《敦煌石室碎金》⑤等书中，刊布照片或发表录文，大多数是依据伯希和寄来的照片资料。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这些研究的重点在传统的四部古籍，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见的六朝唐人经籍写本，也有一些后世已佚的经疏、史籍、佛典、道书。

由于中国学者对伯希和的"以德报怨"，使得中国学者化解了"可恨可喜可悲"的怨愤，也消除了伯希和的顾虑，伯希和由此建立了与中国学者合作的关系，而且一直不忘向中国学者提供敦煌写本照片资料，如1916年7月，伯希和因到北京出任法国使馆武官而经过上海，将陆德明《尚书释文》照片出示给沈曾植和张元济等⑥。张元济后将此卷影印入《涵芬楼秘籍》(1918年出版)。王国维时已从京都回到上海，也见到此真迹⑦。伯希和的这种合

---

① 《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年罗氏印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4编第5册。

② 《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上虞罗氏影印刊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3编第7、8册，《敦煌丛刊初集》第8册。

③ 《敦煌零拾》，1924年上虞罗氏印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3编第7册、《敦煌丛刊初集》第8册。

④ 《敦煌石室逸书三种》，1924年上虞罗氏影印；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18册。

⑤ 《敦煌石室碎金》，1925年东方学会排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3编第6册、《敦煌丛刊初集》第7册。

⑥ 见王国维1916年7月27日致罗振玉信，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95—96页。

⑦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05页。

作的态度,对以后法国的汉学界影响深远。总的来说,法国的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大多保持比较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

伯希和的这种合作的态度,对以后法国的汉学界影响深远。总的来说,法国的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大多保持比较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

还应当指出的是,罗振玉在看到伯希和敦煌文献后,很快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京都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得到消息后,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十一月十二日东京、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上,发表《敦煌石室的发现物》,引述罗振玉的来信,对敦煌藏经洞及其发现过程,敦煌文书的价值等都做了介绍,还罗列了罗振玉寄来的书目。1909 年 11 月 28—29 日,在京都大学的史学研究会上,陈列了罗振玉等寄来的一些四部书、拓本、佛经的照片,并由京大狩野直喜等学者加以讲说,开始了日本的敦煌学研究。

由伯希和的北京之行,中国学者的"以德报怨",罗振玉的东国送书,我们不难认为,在清末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辱之际,中国学者以比较宽广的胸怀对待敦煌藏经洞宝藏的流失问题,开拓出敦煌学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舞台。可以说,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的敦煌学。

在清末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辱之际,中国学者以比较宽广的胸怀对待敦煌藏经洞宝藏的流失问题,开拓出敦煌学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舞台。可以说,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的敦煌学。

二、《劫余录》与"伤心史"

二十年代的中国,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如刘复(刘半农)的《敦煌掇琐》[①]、胡适的《荷泽大师神会遗集》[②]、陈

① 刘复《敦煌掇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北京,1925 年。

② 胡适《荷泽大师神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 年。

万里的敦煌考察[①],都具有开拓的意义[②]。然而,对中国敦煌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应当是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一书和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一文。

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是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敦煌经籍辑存会之约,在俞泽箴的帮助下,编成的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 679件的目录,分类编排,体制极佳,是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分类目录[③]。在当时编成这样一部分类目录,从学术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引起议论的是这本书的名称,因为它表现出强烈的批评意识,这里面包括对与中国学术界一直比较友好的伯希和的批评,因为陈垣的序中明确地说:"(光绪)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据说当时有友人劝陈垣在序中不要直接提名,陈垣回答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④]这虽然是后人追忆之词,并不一定那么准确,但确实反映了陈垣先生所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的观点,即反对西方列强掠夺中国文物。

---

① 陈万里《西行日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之一),北京,朴社,1926年。

② 具体的情况,见荣新江《北京大学与早期敦煌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1998)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35—336页;又《敦煌学新论》,102—106页。

③ 陈垣《敦煌劫余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北京,1931年。

④ 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154页。

这部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出版的目录在出版之前,在史语所内部是有一番议论的。据当时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李济讲,《敦煌劫余录》的扉页第二面有个英文名称,作"An Analytical Lis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回译成中文,应为《北平图书馆藏敦煌手抄卷的分析目录表》,"英文的名称,没有直接把中文的意思译出来,显然是义宁陈先生(寅恪)的主意,而不是新会陈先生(垣)的原意"①。

当时任史语所历史组组长的陈寅恪先生,在为《敦煌劫余录》作的序中称:

> 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②。

李济在引述这段话以后接着说:"所以'劫余录'的书名,只是'寄愤慨之思'的意思。但陈寅恪实在并不以此说为然。"③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界,"敦煌者,吾国学

① 李济《敦煌学的今昔——考古琐谈之二》,原载台北《自由谈》第19卷第2期,1968年;此据作者《考古琐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242—243页。

② 此文现收入《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266—268页。引文在267页。

③ 李济《考古琐谈》,243页。按,1999年7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姚大勇《"敦煌学"补正一则》,实际就是对李济文章的转述。

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被当作陈寅恪的名言，鼓动起许多学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学子们，抱着爱国主义的热忱，去改写敦煌学的伤心史。对陈寅恪序的误读，于大陆的敦煌学界来说，并非一件坏事，它确实推动了敦煌学在大陆的突飞猛进。但正如李济所言，这并非是陈寅恪的本意。

对陈寅恪序的误读，于大陆的敦煌学界来说，并非一件坏事，它确实推动了敦煌学在大陆的突飞猛进。

由此看来，陈寅恪不仅不同意陈垣的“劫余”的说法，而且这篇序言恐怕实际就是针对这个说法而写的。“或曰”者，应当就是陈垣和他所代表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北平图书馆所藏的“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只是一些糟粕而已，所以这个目录，也只不过是“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对此，陈寅恪举出一系列北图所藏有价值的写本，来反驳上述意见：

> 摩尼教经之外，如《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所载贞观时诸郡著姓等，有关于唐代史事者也。《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有关于佛教教义者也。《佛本行集经演义》、《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维摩诘经颂》、《唐睿宗玄宗赞文》等，有关于唐代诗歌之佚文者也。其它如《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中弥勒之对音，可与中亚发见之古文互证，六朝旧译之原名，藉此推知。《破昏怠法》所引《龙树论》，不见于日本石山寺写本《龙树五明论》中，当是旧译别本之佚文。唐蕃翻经大德法成辛酉年（当是唐武宗会昌元年）出麦与人抄录经典，及周广

顺八年道宗往西天取经，诸纸背题记等，皆有关于学术之考证者也。但此仅就寅恪所曾读者而言，其为数尚不及全部写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见之奇书佚籍已若是之众，傥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①。

陈寅恪早年曾长期游学欧美，回国后的1926—1930年一段时间里，主要就是从佛经翻译文学的角度，写了一些敦煌写本的跋文，其中也包括一些北图的藏卷②。因为他除了通晓西方现代语言外，又遍习与中国相关的各种东方语文，加上他对中国古籍和佛典的深厚功底，使他在敦煌学的领域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陈寅恪所数的这些家珍，如果我们一一予以笺释，即可深知其所提示文献的价值。但应当承认，陈寅恪当时还无法知道英、法所藏敦煌写本的真正内涵，相比而言，北图所藏虽然不能说是糟粕，但也无法与英、法所藏同日而语。陈寅恪序的价值，更在于他不认同围绕敦煌写本的外流而产生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情绪，而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是世界性的学术，是“诸国学者”可以“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的领域③。他的序言最后说：

陈寅恪序的价值，更在于他不认同围绕敦煌写本的外流而产生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情绪，而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是世界性的学术，是“诸国学者”可以“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的领域。

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借，宜益能取用材料

①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267页。

② 这些文章现在大多数收入《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参看陈寅恪撰，荣新江整理：《〈敦煌零拾〉札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2页。

③ 引文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266页。

> 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①。

这里虽然套用编者的话把国内的国宝称为“历劫仅存”，但更重要的是他继续强调了序言开始时所说的敦煌学是世界性的学术，需要国人努力推进。

陈寅恪的序文，可能是获得史语所的主要人物，如傅斯年、李济辈的赞同，所以这篇序文在原书作为史语所专刊出版之前，就在《史语所集刊》上先期发表了②。

对于这个书名，伯希和当然是明白其意的，并且曾在他主编的《通报》上表示了不满③。但这件事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已经建立的紧密联系，甚至也没有伤害他和陈垣的关系，从1933年伯希和到北京后两人的交往来看，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④。这里面也可能是陈寅恪、傅斯年等人斡旋的结果⑤。

伯希和确实在沟通中法学术界的交流方面，做了许

---

①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267—268页。

② 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1930年。

③ *T'oung Pao*, 28, 1932, pp. 481-482.

④ 参看桑兵《陈垣与国际汉学界——以与伯希和的交往为中心》，作者《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92—211页。

⑤ 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中国方面的部分有关记载，所以还不清楚事情的全貌，《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75页收有陈寅恪来函，告伯希和巴黎住址。刘乃和等著《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辽海出版社，2000）295页系于1930年9月31日（原文如此），若然，则陈垣此时和伯希和也可能有通讯联系，希望将来能在巴黎找到伯希和档案中保存的有关信件。

多有益的工作①。但是他攫取敦煌宝藏的事情,始终是中国学者不能忘怀的。所以,当他在1935年来北平选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的古物时,又一次遭到一批中国学者的联名反对。傅斯年出面代为辩解,声称:"论伯希和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②其实,仅敦煌写本一项,斯坦因用二百两银子买去一万多件,伯希和用五百两银子买去五千多件,虽多少不等,但手法相同,都是极其不等价的骗取③,所以傅斯年的这一说法并不能服人。伯希和与斯坦因的不同,更多地在于和中国学者的合作方面,伯希和是积极的,而斯坦因对于斯文赫定(Sven Hedin)与中国学术界共同组织中瑞科学考察团一事曾大为不满,直到1930年时,他还想单独一人再次进行中亚考古探险,攫取新疆宝藏,结果以失败告终。

对于自己国家的古代文献和文物,每一个有文化托命感的学者都会具有保护的意识④,这就是陈垣等学者把

---

① 参看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此据作者《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09—148页。

② 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2350页。

③ 参看荣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25—26页;又《敦煌学新论》,71—73页。

④ 陈寅恪、傅斯年都是中国最早的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成员,见《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并委员名单》(192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580—581页。

敦煌写本的流散称之为劫掠的出发点[①]。而一个学者,特别是那些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又把中国的学术看作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希望不要因为"爱国主义"的意气,影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这恐怕就是陈寅恪等学者不同意"劫余"之说,而强调敦煌学是世界之学术的原因吧。

三、伦敦留难与巴黎协作

在中国学者初步了解伯希和所获敦煌写本的时候,对于斯坦因的收获却不甚了然。1910 年 10 月 30 日,张元济自巴黎到伦敦,曾与斯坦因晤面,并参观英国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所获敦煌秘籍,商议影印其中的四部书,可能是想模仿罗振玉与伯希和之间的做法,结果没有得到要领[②]。张元济致汪康年信中也谈到此事,唯未提晤斯坦因事[③]。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张元济 1910 年 11 月 4 日给斯坦因的信,显然与其参观敦煌写本及影印秘籍事有关,惜尚未公布[④]。从斯坦因本人的态度来看,这样的事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对于这一大批敦煌藏经洞所获的汉文文献,斯坦因

---

①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于外人在敦煌的攫取行为的主流看法仍然未变,参看郝春文《如何评价 20 世纪初期外国"探险"队在敦煌的活动》,《文史知识》2003 年第 5 期,4—8 页。

②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年,90 页。

③ 《张元济书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53 页。

④ Éva Apor and Helen Wang eds.,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s of Sir Aurel Stein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Oriental Studies 11, Budapest 2002, p. 44.

原本是请伯希和来整理的，但伯希和先是答应，后来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于 1913 年表示难以着手。所以从 1914 年起，英国博物馆的汉籍保管员翟林奈(Lionel Giles)开始负责整理这些文献①。翟林奈出自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之家，汉文水平有限。1914 年，他发表的第一篇敦煌学文章《〈敦煌录〉译注》②，就遭到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的激烈批评③。翟林奈完全接受，并做了重新的翻译④。大概正是有这样一段学术因缘，所以当 1926 年胡适到英国博物馆查找敦煌禅宗文献时，反而得到了翟氏的特别关照，使得胡适在很短的时间里，有很大的收获。

但翟林奈并非对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向达、于道泉等先后访书英伦，都受到翟氏刁难。1936 年 2 月，向达在致中华书局舒新城、武佛航的信中，说到他当时遇到的困难：

> 弟来英目的在看 British Museum 之敦煌卷子，管理人为 Dr. Lionel Giles，前后见到两次，俱甚冷

---

① 参看 F. Wood, "Two thousand years at Dunhuang", Susan Whitfield and Frances Wood eds., *Tunhuang and Turfan. Contents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Documen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British Library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Ⅰ),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6, pp. 1—2.

② L. Giles, "*Tun Huang Lu*: Notes on the district of Tun-hua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4, pp. 703—728.

③ Suh Hu, "Notes on Dr. Lionel Giles' article on *Tun-huang Lu*",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5, pp. 35—39.

④ L. Giles, "The *Tun-huang Lu* re-translated",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5, pp. 41—47.

> 淡，且对人表示拒绝。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对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盘研究相询，彼亦表示拒绝。此种情形大有陷弟于进退两难之势。然既已至此，不能不极力想法，庶不致如入宝山，空手而反。现在拟托其它英国人代为转圜，将来研究一层或可有万一之望也[①]。

向达是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交换馆员到英国看敦煌卷子的，由于翟林奈的刁难，他只看了五百卷左右[②]，就不得不结束他的工作，更何谈他原本打算的“作一通盘研究”了。以向达的学术功底和相关知识的准备，他的英伦之行本来可以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可惜由于翟林奈的拒绝，他只写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和《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③]。向达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四十年代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万里孤征，开拓了石窟考古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新路，他在敦煌学方面的更大成就，奠基于他的两次西北考察[④]。

与伦敦的向达相比，同样是由北图派出的王重民，在巴黎的工作却一帆风顺。1934—1939 年王重民逗留巴黎

---

① 《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09 页。

② 成果见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 1 卷第 4 期，1939 年，397—419 页；收入作者《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195—239 页。

③ 后者发表于《新中华杂志》第 5 卷第 13 号，1937 年，123—128页；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240—251 页。

④ 荣新江《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7 卷，99—127 页。

期间，得以通览全部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一边编纂敦煌写本目录，一边做自己感兴趣的四部书、诗词、变文等方面的研究。他以后出版了《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卷①、《敦煌曲子词集》②、《敦煌古籍叙录》③，与向达等合编《敦煌变文集》④，与刘铭恕等合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⑤，可以说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是饱览巴黎藏卷的结果。而且，王重民还得到许可，为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拍摄了大量敦煌写本照片，清华的一份在日军侵华时被炸毁，北图的一份，总数有上万件之多⑥，这实际上是伯希和收集品的精华所在。照片中还有王重民和向达在英国和德国拍摄的敦煌吐鲁番文献⑦，这些照片为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可惜因为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五十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这些资料被打入冷宫，迄今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王重民在巴黎的成功，不能不说其中有伯希和等法

① 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一)、(二)，北平图书馆，1936、1941 年。

② 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 年。1956 年修订再版。

③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年。

④ 《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

⑤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年。

⑥ 参看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国家图书馆有关王重民所拍敦煌文献档案的价值》，“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会议手册，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2003 年 9 月，338 页。

⑦ 参看荣新江《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德国吐鲁番文献旧照片的学术价值》，“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会议手册，180—189 页。

国学者的大力帮助。伯希和还将自己私藏的敦煌石窟笔记出示给王重民,而且允许他全部拍摄,带回中国①。这种帮助也是互利的。王重民逗留巴黎期间,与戴密微(P. Demiéville)每周三聚在一起,共同研讨敦煌卷子中有关汉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争论顿渐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基本上是王重民发现并提供给戴密微的。1952年,戴密微出版《拉萨僧诤记》(后改名《吐蕃僧诤记》)时,首先就是感谢王重民的贡献②,这本书翻译并详细注释了有关禅僧入藏与印度僧人斗法的敦煌文献,在汉藏佛教史、汉藏关系史等许多方面都有贡献。此后,戴密微在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中,主要讲授禅宗典籍和俗文学作品,并不时发表一些相关的论文③,这些研究方向与他和王重民的学术交往不无关联。

不论是在伦敦受到刁难的向达,还是在巴黎受到善待的王重民,他们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的领军人物是抱着世界主义的胸怀来从事敦煌学研究的。

不论是在伦敦受到刁难的向达,还是在巴黎受到善待的王重民,他们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的领军人物是抱着世界主义的胸怀来从事敦煌学研究的。这可以

① 王重民《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中提到看到的经过,但未提拍摄之事,见《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24期,1936年4月2日;此据作者《敦煌遗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4—5页。这些照片的存在,见徐自强、王新《北京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照片整理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430—455页。

② P. Demiéville, *Le concile de Lhasa*, Paris 1952;戴密微《拉萨僧诤记》,耿昇中译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感谢王重民的话写在前言的开头部分。

③ 戴密微的讲课内容,在每一年的《法兰西学院年鉴》(*Annuaire du College de France*)中都有报道。也请参看 P. Demiéville, *Choix d'etudes bouddhiques*, Leiden 1973。

从他们两人在1948年12月举办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览陈列品中看出。根据同时印行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中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这个展览中关于敦煌学学术史的部分，包含中外学者所撰敦煌学论著的稿本、抽印本、原著，中外文兼备，其中也包括斯坦因、伯希和考古探险和研究著作①，表明向、王二位把他们敦煌考察的记录也看作是敦煌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十年代以后，直到“文革”期间，包括向达、王重民在内的中国大多数学者，在反帝爱国的政治背景下，继续从事着艰苦的研究工作。这段时间里他们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的《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是时代的产物，未必是当时学者的本意。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非学术层面的问题，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因为即使这些学者把自己的著作打上“爱国主义”的符号，最后也无法抗拒更强烈的政治热潮。向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王重民在“文革”期间含冤自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中国敦煌学的终止。“文革”期间，因为中国学者基本上被迫停止了他们的研究工作，所以那时只有世界的敦煌学，而没有中国的敦煌学了。

四、“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1977年，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开始复苏。二十多年来，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中国语言、

① 1948年北京大学印行。

文学、历史、考古、艺术、音乐、舞蹈等许多方面，都从比较低水平的起点，越升到世界同行的领先地位，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为国际敦煌学界所认可的事实。这些成就近年来有不少论著专门加以总结，不必在此费词，我这里主要想谈谈爱国主义在这二十年来敦煌学研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虽然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陆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但从五十年代以来爱国主义的宣传已经根深蒂固，一些学者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动力，正是爱国主义。比如有的敦煌学研究者就这样认为：敦煌文书出自我国，绝大多数是用我国文字书写的，所记载的是我国古代的史事，何以我们的研究反而落后于外国学者，因此，我们一定要赶上以至超过外国学者的研究水平。这样的爱国主义热情，必然迸发出极大的热量，鼓励着那一代的学者努力地赶超日、法、英等国的汉学家，也感染着他们的下一代敦煌学子，满怀爱国主义热情地去努力学习。

正好就在大陆敦煌学刚刚重新起步的 1981 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应天津南开大学之邀，来南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并油印发行了《敦煌学导论》。从全国各地来的不少学者和学生，包括现在已经在敦煌学中卓有建树的朱雷教授等，当时都到南开来听讲，可以说藤枝晃的这个讲座，对于中国大陆敦煌学的复兴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敦煌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藤枝晃在南开讲演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说在京都）。"这话一经传开，就使得许多充

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学者十分不满。笔者曾经向几位当时听课的中国学者询问这话的来历，他们都说这话其实是请藤枝晃来讲演的南开的某位先生说的，意在请大家重视这位一般学子还比较陌生的敦煌学家。在今天看来，这话无疑是个误传①。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在1981年的特定时代，那时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确实还不如日本，所以即使是这样说，也并不过分。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把这句话放到1981年那个极具爱国主义热情的时代，它必然反过来激励中国学者在敦煌学方面加倍努力，目的是要赶超日本，这在客观上无疑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现在回想起来，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大的敦煌学课堂上，我们听到的是老师的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的慷慨陈词，看到的却是老师手里经常捧着的那本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因为这是当时有关社会经济文献的最佳录文集。我们跟着老师按照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一字一句的释读，可是当我们要真正研究一件文书时，我们却要去读那波利贞、仁井田陞、藤枝晃、池田温、戴密微、贝利等外国学者的文章。无论如何，新一代年轻的敦煌学研究者，是在这种强劲的爱国主义热情鼓舞下，奋起直追，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确实在敦煌学研究的某些方面取得了成绩，中国已经可以说是世界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的中心了。

---

① 直到最近，朱雷先生还告诉笔者，藤枝晃的女婿石冢晴通先生还希望他在中国敦煌学界澄清这个误传。

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误读，就和“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误读一样，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敦煌学界影响深远，并非坏事，它促进了中国敦煌学的迅猛发展。

如上所述，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误读，就和“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误读一样，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敦煌学界影响深远，并非坏事，它促进了中国敦煌学的迅猛发展。但是，它也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日两国敦煌学界某些领域的交往，也阻碍中国学者吸取他人的长处。1988 年，在听说藤枝晃要来北京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后，会长季羡林先生特别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来打消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隔阂。季先生提出的这深具学术胸怀和眼光的口号，值得今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深思。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一方面应当肯定爱国主义对于中国敦煌学研究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应当警惕一种过激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因为它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并没有益处。这种过激的看法的立脚点，是认为敦煌文书绝大多数是用汉文书写的，所记载的是中国古代的史事。其实，敦煌文书中同样有极具重要学术价值的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文献，它们虽然不是用汉文写成，但绝大多数也是中国古代各边疆少数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不应当把它们排斥在外。同时也应当看到，敦煌宝藏中还有历史文献之外的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和中国民间宗教等方面的文献，而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以前不如欧美、日本学者，而且至今也没有超过他们，需要虚心向国外同行学习。如果只是把眼界放在一个狭窄的汉文文献的圈子里去争夺研究中心，其实却失去了另外的研究中心，而且会越来越把自己

如果只是把眼界放在一个狭窄的汉文文献的圈子里去争夺研究中心，其实却失去了另外的研究中心，而且会越来越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局限起来。

的研究领域局限起来。如果我们翻阅一下近年来的《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和不断出版的国内会议论文集或纪念文集，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题目越做越窄，而且往往只注重新材料的追求，而不去思考新的问题①。这样一来，所谓的"爱国主义"就会捆住我们的手脚，限制我们吸取国外同行的优秀研究成果，阻碍了中国敦煌学向更深更广的方面发展。

这一点在外人看来是很清楚的。2000 年，日本东方学会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将其西文刊物《亚洲学刊》(*Acta Asiatica*)第 78 号定为"敦煌吐鲁番研究"专辑，由资深的敦煌学家池田温主编。其中所收四篇论文分别讨论莫高窟早期洞窟、沙州回鹘与西回鹘王国的关系、敦煌的多语言使用、吐鲁番出土伊朗语写本等问题，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现了日本新一代敦煌学者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一向与中国敦煌学界非常友好的池田温教授在序言中说："尽管四篇论文所涉及的范围有限，但读者将能看到现在专门从事敦煌吐鲁番研究的日本学者，对于敦煌当地的事情甚至比中国本土的学者更富有广博的知识，同时他们对相关的西文论著也了如指掌。"这段话说出了一定的道理，它足以警示中国敦煌学界的同人，让我们开拓国际视野，积累超出敦煌本身的知识，并且对西文、日文的研究著作也能了如指掌。

池田温的序警示中国敦煌学界的同人，让我们开拓国际视野，积累超出敦煌本身的知识，并且对西文、日文的研究著作也能了如指掌。

① 参看荣新江《敦煌学：二十一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辞海新知》No. 5, 2000 年，65—71 页；又《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365—368 页，从历史学的角度提示了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此外像女性史、疾病史、儿童史等许多方面，都有开拓的余地。

五、小　　结

尽管学术可以是没有国界的,但任何一个学者却都是有国籍的。所以,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必然地会被自己或者他人看作是为国争光的事。一个中国学者怀着对"文化中国"的热爱,当然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总是希望保持发扬传统文化中优良的部分,而不希望中国文化走向灭绝。

换个角度来讲,各个国家自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当然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对于这种文化的优劣固然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总是希望保持发扬传统文化中优良的部分,而不希望中国文化走向灭绝。陈寅恪虽然反对学术上狭隘的"爱国主义",主张"世界的学术"这样一种理念,但同时他也希望国家能够尊礼像杨树达这样的学者,"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①,这正是强调要保持"文化中国"的"中国文化"。陈寅恪之不离开大陆和他晚年治学方向的转变,也和这种想法相关②。

学术上的爱国主义是个很难讲清的问题,在一个时期,它可能会对于某一方面的学术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在另外一个时期,它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的学者,对于另一个国家的学者的爱国主义可能不完全能够理解,而对于消极的"爱国主义"的批判有时却

---

① 陈寅恪《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260—261 页。

② 参看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156 页对其治学转变的解说。

又会招来批评。就敦煌学来讲,因为它本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资料纷繁多样,内容涉及许多学术领域,就语言资料一项,就有不同语系的文献,而且属于非常难解的古代语言,甚至是死语言,不是一个国家的学者可以承包下来的。所以,我坚持认为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术,敦煌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宽广的国际视野,而不应抱有一种狭隘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对于当前的中国的敦煌学界来讲,只有拓展领域,思考问题,沟通中外,才能既不负华夏之国宝,又能襄进世界之学术。

我坚持认为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术,敦煌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宽广的国际视野。

对于当前的中国的敦煌学界来讲,只有拓展领域,思考问题,沟通中外,才能既不负华夏之国宝,又能襄进世界之学术。

敦煌学书评四则

《曼涅尔海姆在中亚(1906—1908)》评介

本书是配合1999年5月19日至2001年1月7日在芬兰赫尔辛基文化博物馆(The Museum of Cultures,原芬兰国立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Finland)举办的“曼涅尔海姆在中亚(1906—1908)”开馆展览而编纂的,由八篇文章和大量图片组成,概要而全面地介绍了曼涅尔海姆的中亚考察经过和有关学术方面的收获。

相对于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和德国、日本的中亚探险及其收集品,曼涅尔海姆中亚收集品也同样是丰富多彩的,但却是研究比较薄弱的一个。过去,我曾经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一书中,根据已经发表的材料,概述了这个收集品的情况和主要的研究成果(149—153页)。然而,这是少有的几个我迄今没有机会亲自走访的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和文物收藏地,因此许多相关情况仍不明了。当我在*IDP NEWS*上得知这本书的出版以后,恰好我过去的学生蔡一平到赫尔辛基访问,随即托她代为寻找。承蒙她的帮助,2001年9月,这本图文并茂的出版物居然摆放在我的面前。

相对于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和德国、日本的中亚探险及其收集品,曼涅尔海姆中亚收集品也同样是丰富多彩的,但却是研究比较薄弱的一个。

收入这本题为《曼涅尔海姆在中亚(1906—1908)》(*C. G. Mannerheim in Central Asia 1906-1908*, ed. by P. Koskikallio and A. Lehmuskallio, Helsinki: National

Board of Antiquities, 1999, 128pp, Fmk. 120. 00)的文章,提供给我们不少有关曼涅尔海姆考察中亚的经过和收集品的详细情况,相信读者——特别是不易见到本书的中国读者一定有兴趣,故此简要介绍如下。

由 H. Lahdentausta、M. Parpola、P. Vainonen 三人合撰的《曼涅尔海姆在中亚》一文,主要利用曼涅尔海姆的日记,附以他的旅行记《由西向东穿越亚洲》(*Across Asia from West to East in 1906-1908*, Helsinki 1940),来详细描述他的旅行和考察过程,并且发表了大量曼涅尔海姆本人在沿途所摄的照片。他们比较客观地叙述了曼涅尔海姆考察的目的和过程,这里只能择要转述:

曼涅尔海姆原在沙皇俄国海军部任职,参加过日俄战争。1906 年春天,受沙俄总参谋部的指令,前往新疆、甘肃、陕西、山西地区,调查中国的军力状况以及清朝新政在与俄国接壤部分地区的贯彻情况。为了掩盖他此次旅行的军事目的,他同时接受芬乌学会(Finno-Ugrian Society)的资助,进行科学考察,还在 Antell 理事会的支持下,收集考古、人种,特别是中亚出土的写本资料,并对中国西北地区鲜为人知的民族和部落做一些考察和研究。他经过一番学术训练之后,于 1906 年 7 月 6 日离开圣彼得堡,7 月底到达安集延(Andizhan),与法国伯希和率领的考察队会合,一起进入喀什噶尔。由于两人在经费和指挥权上产生争执,曼涅尔海姆离开伯希和,独自率领两名俄国配给他的哥萨克向东南方的和田进行考察,而伯希和则向东北的巴楚前进。曼涅尔海姆在和田买到一些文物和少量写本,然后回到喀什过新年,并

清绘地图。

1907年初，曼涅尔海姆从喀什，经巴楚、乌什到阿克苏，然后越过木扎特山口(Muzart pass)进入特克斯河谷(Tekes valley)，访问了西蒙古(Kalmuk)部落。经过天山和伊犁河，他到达伊宁(固勒扎/Kuldja)，在这里，他才拿到俄国外交部从北京寄来的护照，“他的名字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书写，以避免中国官员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34页)。他随后经玉勒都斯河谷(Yulduz valley)到达焉耆，然后翻过天山，进入乌鲁木齐。

曼涅尔海姆下一站到了吐鲁番，访问了交河和高昌古城，发现它们经过此前探险家的发掘，已经破败不堪。以后，他经哈密，于11月到达敦煌，但只停留很短的时间。随后他深入撒里畏兀尔地区考察。在甘州过圣诞节后，经凉州到兰州过新年。1908年初，他短暂到拉不楞寺访问，遇到一些麻烦。又折向东，于4月底到西安。然后乘火车，经郑州、开封，到太原，在五台山拜会了达赖喇嘛，再经呼和浩特到北京，在俄国使馆中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撰写给俄国总参谋部的考察报告。然后经日本、俄国远东城市和西伯利亚回到圣彼得堡。

由于刺探军事情报是曼涅尔海姆中亚考察的第一任务，所以他选择的旅行路线和以搜寻古物为目的的伯希和探险队有所不同。

曼涅尔海姆总共走了14000公里，完成3087公里的路线图，绘制18座中国兵站平面图，收集超过1000件考古或人种学资料，拍摄1370张照片，收获不可谓不丰富。

通过以上根据他的日记所做的概述，我们清楚地了解到，由于刺探军事情报是曼涅尔海姆中亚考察的第一任务，所以他选择的旅行路线和以搜寻古物为目的的伯希和探险队有所不同。他为了绘制地图而特别要找寻南

疆通向俄国的一些山口,每到一地主要是调查地方官对清朝新政的执行、通信设施的改进、军队的彻底改变与否、工矿业的现代化、平民与军事学校的建立、禁烟运动是否彻底等情况(参看41页),而不是古物所在。

接下来的 Harry Halén《曼涅尔海姆男爵对古代中亚写本的猎取》一文,正是我们最关心的曼涅尔海姆收集中亚写本的情况介绍:在和田地区,他总共获得十一件梵文或于阗文残卷。在吐鲁番的交河和高昌古城,获得数量超过千件的汉文写本,除了《法华》、《华严》、《阿弥陀》、《金光明》、《涅槃》、《金刚》等常见佛典外,还有四世纪中叶所写《摩诃僧祇律》(No. 27)和《妙法莲华经》(No. 35),两件《仁王般若经》(Nos. 22、63)系591年奉高昌王之命而写,一件《阿弥陀经》不知名注本(No. 38),一件《大乘起信论注》(No. 143),以及《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No. 161)。非佛教文书很少,有一件是带有朱印的官府文书(No. 37)。曼涅尔海姆在七克台(Chiktym)等处获得的回鹘文写本,内容包括契约、具注历、佛教忏悔文和佛典(H. Halén 有专文"Die uigurischen Mannerheim-Fragmente 1-2",载 *Studia Orientalia* 51.4, Helsinki 1979, 9＋vii pp. 和 *Studia Orientalia* 67, Helsinki 1991, pp. 161—169)。此外,还有一些粟特文写本。他对德国探险队颇为抱怨,在1907年9月30日的日记中说道:"所有东西都已经被弄得很糟,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知道格伦威德尔探险队两年的逗留和发掘,使得这里遭受了新的毁坏。"他在1908年2月17日从兰州给 Otto Donner 的信中也说道:"在七克台有一个遗址,据说格伦威德尔

教授在去哈密的途中发掘了它，似乎当地百姓随后继续发掘，因为我从他们那里幸运地买到一件由三四叶纸组成的文书。”

Halén 还进而讨论了曼涅尔海姆为什么在吐鲁番买到这样多的写本，而却没有去走访敦煌千佛洞的问题。曼涅尔海姆是 1907 年 11 月 14 日到达敦煌的，在此之前五个月的 6 月 14 日，斯坦因攫取到敦煌藏经洞的一大批宝藏，捆载而西。可是，曼涅尔海姆只在敦煌停留了四天，就匆匆前往安西了，把敦煌宝藏留给了三个月以后于 1908 年 2 月到达这里的伯希和。曼涅尔海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不太明确的解释，好像他有意要把这些材料留给伯希和(参看 *The Memoirs of Marshal Mannerheim*, tr. by Count Eric Lewenhaupt, New York 1954, p. 55)。Halén 的解释是，曼涅尔海姆事实上并不知道斯坦因曾经到过敦煌，他可能认为自己是第一个到达此地的西方人，因而也就根本不清楚藏经洞发现写本的消息。他在 1907 年 11 月 20 日在安西写的日记中说，他本来是想去探访叫做“千佛洞”的庙，但由于野鸡等猎物太吸引人了，不能抵抗狩猎的诱惑而去猎获一对野鸡等，因此可惜未能两全其美。Halén 为曼涅尔海姆没有获得敦煌宝藏找到一个很好的解释，即他因为没有一个技艺高超的厨师，所以只能自己去射猎以改变他的饮食，而没能去千佛洞。正像勒柯克(A. von Le Coq)因为一个铜钱而决定不去敦煌一样(参看勒柯克《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陈海涛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年，101—102 页)，这里固然有一些偶然的因素，但曼涅尔海姆的主要目的是军事情

报而不是古物，这可能最终决定了他只是调查了敦煌城镇的基本情况，而没有走访千佛洞。由于不久以后斯坦因和伯希和因为敦煌藏经洞宝藏的获得而在欧洲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和学术地位，相形之下，原本可能分别走在斯坦因和伯希和前面的勒柯克和曼涅尔海姆，不免心理上有很大的失落感，并且在自己后来写的书中，为自己的"过失"寻找开脱的理由。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象，最早得知藏经洞发现消息的叶昌炽，在获得伯希和攫取宝藏的消息时的心理感受，不过他没有找理由开脱，而是深深地责怪自己（参看拙文《敦煌学的开拓者——叶昌炽》，*IDP NEWS*, No. 7, Spring 1997, 1—5）。

斯坦因和伯希和因为敦煌藏经洞宝藏的获得而在欧洲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和学术地位，相形之下，原本可能分别走在斯坦因和伯希和前面的勒柯克和曼涅尔海姆，不免心理上有很大的失落感。

以下 P. Varjola《文化博物馆所藏曼涅尔海姆元帅的中亚收集品》，介绍了曼涅尔海姆为考察所做的各种准备，并分类介绍了他从中亚不同民族那里获得的民族学材料，这些都是当时中亚民族实际使用的材料。S. Hornytzkyuj《曼涅尔海姆收集品中的宝石材料》，从内容和物质两方面，分析了和田等地发现的装饰性肉红玉髓珠子、雕刻的宝石、玉石和青金石。J. Janhunen《曼涅尔海姆收集的中国铜镜》，介绍他所获三件铜镜，都是明末清初的制品。I. Lehtinen《曼涅尔海姆收集品中的辫状垂饰》，根据照片和事物，分析中亚各民族的辫子状垂饰。

由于曼涅尔海姆晚于斯坦因几个月到达和田，所得一百多件陶雕与先前的考古、探险者所获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J. O. Miettinen《曼涅尔海姆收集品中的和田出土陶雕》，介绍了陶罐碎片上的兽面像、人物雕像、陶制小骆驼和猴子，并把它们和地中海、波斯、印度的同类形

象联系起来。T. Talvio《曼涅尔海姆收集品中的钱币》，总共有300枚以上，但由于博物馆中没有东方钱币专家，所以这批钱币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外界也不清楚。在英国博物馆汪海岚(Helen Wang)的帮助下，本文作者比定出其中大约250枚，其中包括76枚和田出土的汉佉二体钱、两枚高昌古城出土的突骑施钱、20余枚喀拉汗王朝钱币、14枚察合台钱币、94枚汉式钱币(从汉到清都有)，这里的汉佉二体钱是仅次于英国博物馆斯坦因收集品的第二大收藏，而汉式钱币中的“大历元宝”是唐朝安西都护府自己制造的钱币，也十分珍贵。

这里的汉佉二体钱是仅次于英国博物馆斯坦因收集品的第二大收藏。

总之，限于本书的文章是配合展览而做的说明性文字，所以大多数不够深入，但这些分类介绍曼涅尔海姆收集品的文章却给读者一个有关这个收集品的十分全面的描绘，而有些内容如写本、宝石印章、钱币，是建立在较新的研究或科学实验的结果之上的，为学者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线索，并打下良好的基础。

曼涅尔海姆考察队由于具有收集军事情报和收集文物的双重性质，而且又和1906—1908年同时在中亚考察的斯坦因、伯希和、格伦威德尔等考察队交织在一起，所以在西域探险史上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同时，由于过去学界对曼涅尔海姆收集品的研究不够充分，甚至其中的近千件吐鲁番写本迄今还没有公布图版，和田出土的古物和钱币也没有系统的研究，因此，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的研究也将有助于我们对于西域史，特别是于阗和高昌历史文献的认识。我们希望曼涅尔海姆收集品不仅仅以展览的形式公之于众，而且以图录的形式把其中的文

过去学界对曼涅尔海姆收集品的研究不够充分，甚至其中的近千件吐鲁番写本迄今还没有公布图版，和田出土的古物和钱币也没有系统的研究。

献和文物尽快公布给学术界。

有关曼涅尔海姆考察过程的研究，迄今为止学界只能根据他本人的记述来分析，本书也是同样。好在近年新疆档案馆编《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公布了一些有关其新疆行踪的原始档案，可以使我们从另类材料中，来看他的考察情况。详细研究，当别详他文。这里只想说的是，曼涅尔海姆的考察目的和收获，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8 月）

《〈泰晤士报〉上的斯坦因》评介

在汪海岚(Helen Wang)编《英国所藏斯坦因收集品手册》(*Handbook to the Stein Collections in the UK*)附录四关于斯坦因的论著目录中,有一个《泰晤士报》有关斯坦因报道的目录,这个目录的编辑促成了汪海岚另一项有关斯坦因的研究成果的问世,即把1901—1943年间《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百多篇有关斯坦因的报道集中起来,重新刊布,并做了必要的注释,附加了索引,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泰晤士报〉上的斯坦因》(*Sir Aurel Stein in* The Times, with an introduction, annotations and index by Helen Wang, London: Saffron Books, 2002, 164pp.)。

汪海岚在《导言》中,按照时间顺序,把《泰晤士报》所报道的斯坦因的主要事迹提纲挈领地做了介绍,并用斯坦因自己的著作和斯坦因与他人的通信加以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她根据牛津大学的鲍德里图书馆和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斯坦因与《泰晤士报》撰稿人的通信,指出斯坦因最早是通过《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Journal*)主编凯尔替(John Scott Keltie),希望把自己中亚探险的消息发表在《泰晤士报》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保存的两人间的往来通信表明,按照这样的安排,斯坦因定期把自己在新疆、甘肃的最新发现报告给凯尔替,凯尔替把

斯坦因最早是通过《地理杂志》主编凯尔替(John Scott Keltie),希望把自己中亚探险的消息发表在《泰晤士报》上。

这些情况缩写成短文，发表在《泰晤士报》上，而更为完整的报道则以斯坦因的名字发表在《地理杂志》上。最初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二十余篇报道就是这样出笼的，斯坦因由此获得了在大英帝国以及海内外声名卓著的探险家形象，在 1909 年 1 月 30 日的《伦敦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所登载的十五位世界范围内的探险家肖像中，斯坦因名列榜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泰晤士报》把斯坦因变成一个公众人物。汪海岚还进一步指出，这种公众形象对于斯坦因是多么重要，因为斯坦因深知这可以为他以后的考察筹集经费，这可以帮助他的著作畅销，这可以给他带来各种好运。

最初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二十余篇报道就是这样出笼的，斯坦因由此获得了在大英帝国以及海内外声名卓著的探险家形象。

这种公众形象对于斯坦因是多么重要，因为斯坦因深知这可以为他以后的考察筹集经费，这可以帮助他的著作畅销，这可以给他带来各种好运。

斯坦因获得如此多的荣誉称号和奖章，固然首先是由于他在中亚考古上的贡献，他为大英帝国攫取到如此多的文物宝藏，以及他在增进中亚历史、地理、考古等方面知识做出的成绩，但是，传播面广、影响力大的《泰晤士报》关于斯坦因的报道，无疑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这份报纸是政治家、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们餐桌上常常必备的读物。虽然斯坦因每次探险回来都先写出个人游记，然后再写厚重的考古报告，但即使是个人游记，也无法像《泰晤士报》这样畅销大英帝国乃至全世界。在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保存的斯坦因个人藏书中，有不少《泰晤士报》有关他的报道的剪报，也说明斯坦因对于这些报道的重视。

汪海岚在概述斯坦因第四次中亚探险时，也没有回避英、中两方面对斯坦因的不同评价，并以比较平和的心态，客观地摆出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学者的观点，她

也介绍了中国学者孟凡人先生的看法,来说明近年来中国方面对斯坦因及其考古学成果的不同态度(她还特意把孟凡人给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译本所写序言翻译出来,列为本书的附录二)。

我们应当感谢汪海岚的工作,虽然有索引可以帮忙,但是要在浩如烟海的《泰晤士报》中把有关斯坦因的材料翻看一遍,对于学者来说还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特别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讲,更是如此。现在,一册在手,可以很快知道同时代的英国媒体是如何报道斯坦因的探险事迹,如何评价他的工作成绩的。

这总计107篇长短不一的文章,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1. 关于斯坦因中亚及周边地区考古探险的报道:这些报道从1901年3月30日的《中国新疆的发现》(1——指本书所收文章编号),到1939年6月1日《古罗马的东方边境:斯坦因爵士的考察》(104),基本上把斯坦因一生中的考古调查和主要发现及时地做了报道,现在看来,虽然没有后来斯坦因自己所写的游记和考古报告那样详尽,但它们许多都出自斯坦因当时的实地报告(第一时间发回的现场报道),有些没有后来的润色,反而更加真实可靠。

1907年10月15日《泰晤士报》上的《斯坦因博士的中亚探险》系列报道之一,根据的是当年6月18日斯坦因寄自甘肃安西县的报告。此时斯坦因已经攫取到敦煌藏经洞的宝藏,但这个最振奋人心的消息斯坦因却只字未提。

我非常关注有关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最早报道,但遗憾的是,1907年10月15日《泰晤士报》上的《斯坦因博士的中亚探险》系列报道之一(9),根据的是当年6月18日斯坦因寄自甘肃安西县的报告。此时斯坦因已经攫取到敦煌藏经洞的宝藏,但这个最振奋人心的消息斯坦因却

只字未提。接下来1908年4月13日的《斯坦因的中亚探险》(10)的报道,是据1907年12月10日斯坦因寄自焉耆的信写成的,开篇处简单提到了1907年6月底以前,斯坦因在安西安排和装载他得自敦煌的写本、艺术品及其他古物。以后直到1909年1月23日《斯坦因博士抵达伦敦》(15)的报道中,也没有敦煌宝藏的消息。同年3月9日《泰晤士报》刊载的长篇报道《斯坦因博士的中亚旅行:考古发现》一文,详细记录了前一日斯坦因在皇家地理学会上的讲演,其中有一段斯坦因获得敦煌藏经洞宝藏的记录,并且提到29箱珍贵的写本和文物已经安全抵达伦敦。

关于斯坦因第四次探险,由于中国学者组成的古物保护委员会的反对,促使南京政府下令新疆省政府,将斯坦因驱逐出境,并扣留了所有文物。对此,《泰晤士报》有1930年12月29日《"新"中国与斯坦因爵士:驱逐的要求》(76)、30日《中国与斯坦因爵士:驱逐要求》(77)连续两天的报道,随后是1931年1月3日斯坦因的友人艾兰(P. S. Allen)为他的辩护:《斯坦因爵士在中国:致〈泰晤士报〉的编者》(78)。3月30日,《泰晤士报》发表了北京通讯员的报道《中国和她的宝藏·对科学家的阻碍》(79),略微详细地提示了古物保护委员会的要求。5月13、21、25日的《泰晤士报》,分别报道了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消息(81—83),宣布斯坦因的考察取消。斯坦因回到印度后,致信《泰晤士报》,该报以《进入新疆·斯坦因爵士的探险·来自南京方面的阻梗》为题(84),发表了斯坦因辩解的原文。由于王冀青先生的努力(参看王冀青《奥

莱尔·斯坦因的第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98—110页;又《中英关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物的交涉内幕》,《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242—257页),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新疆档案馆藏有关材料的公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编《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斯坦因第四次中亚探险经过和一些中英双方交涉的情况已经逐渐明了,但我们从《泰晤士报》所见到的英国方面对斯坦因的袒护可以看出,斯坦因虽然被驱逐出境了,但这场官司到底谁输谁赢,还很难说,其中问题之一就是斯坦因所获文物的原件,迄今不知所在。

2. 关于斯坦因获得各种荣誉称号或奖章的报道:我们过去对于斯坦因的中亚探险和考古过程有所了解,但是对于英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学术机构给予他的各种荣誉的详细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泰晤士报》对于斯坦因的每一次获奖的情况几乎都有报道,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斯坦因形象。

《泰晤士报》对于斯坦因的每一次获奖的情况几乎都有报道,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斯坦因形象。

3. 关于斯坦因著作的书评:包括对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址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 34)、《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 53)、《亚洲腹地考古记》(*Innermost Asia*, 69)、《在中亚的古道上》(*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88)等书的评介,也是富有参考价值的。

对汪海岚编的这本《〈泰晤士报〉上的斯坦因》评介到此结束,不过正如我在评论《英国所藏斯坦因收集品手

册》和《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目录》时所希望的那样，斯坦因的中亚探险以及有关斯坦因生前的有关报道，中国的报纸上也有不少，值得我们收集整理。徐俊先生知道我留意敦煌学史，多年前曾抄示一则有关斯坦因的记载，现转录如下，算是个开头。

清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9 年 10 月 8 日)发行的《东方杂志》第六年第九期《杂俎》类下，有《古籍出现》一条，文曰："英国斯丁(应即 Stein 的音译)博士，日前游历亚细亚中部，发明古迹甚多，而尤以古代书籍为最，有以木筒(简)刻成者，有铭刻泥上，以火烘硬者。千佛洞附近某寺所藏此等古籍，约五百立方尺，赫(斯)氏沿途搜罗，共得八千余件，计分十余国文字，贮以巨箱二十四，带回英国，以资考证云。"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7 卷，中华书局，2004 年 1 月)

《英国所藏斯坦因收集品手册》与《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目录》评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中国西北进行探险和考古工作的西方人当中，斯坦因留下的文化遗产恐怕是最为丰富的。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中国西北进行探险和考古工作的西方人当中，斯坦因留下的文化遗产恐怕是最为丰富的。由于他自己非常注意收集、保存这些材料，且生前就做出了许多妥善的安排，所以他的收集品、他的文字记录、他拍摄的照片、他与其他人的交往记录、往来通讯等等，但凡留在西方的材料，几乎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在欧洲，这些材料主要收藏在他为之服务的英国和他原本的出生地匈牙利。近年来，我们高兴地看到，由于汪海岚(Helen Wang)等人的努力，我们对于这两大收藏国的基本收藏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这就是本文所评介的两本非常有用的工具书的出版。对于学术界来讲，英国博物馆和英国图书馆等单位收藏的文物和文献材料的大体情况已经明了(参看拙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但对于有关斯坦因四次中亚考察的来龙去脉，除了他自己所撰写的著作之外，我们还知之甚少，特别是记录事情发生时的照片、档案、书信、日记等等材料，对于今后我们研究敦煌学史或者整个西北考古调查史，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而这两本书

记录事情发生时的照片、档案、书信、日记等等材料，对于今后我们研究敦煌学史或者整个西北考古调查史，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恰恰是在这方面给予我们极佳的指南。

汪海岚主编的《英国所藏斯坦因收集品手册》(*Handbook to the Stein Collections in the UK*, ed. by Helen Wang, British Museum Occasional Paper, No. 129,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1998, iv + 61pp., 以下简称《手册》)一书可以追因于1994年。当时英国负责保管斯坦因收集品的各个单位的保管员或图书馆员们,觉得有必要每年聚会一次,交流信息,于是从1995年开始,连续三年举办了"斯坦因日"的活动(前两次的情况见 *IDP News*, no. 3, July 1995 和 no. 5, Summer 1996 的报道,也作为附录收入《手册》)。在最后一次聚会上,确定各个收藏单位的保管员或图书馆员把自己负责的部分情况撰写出来,最后由汪海岚编辑在一起,于是结成了这本《手册》。

《手册》按单位名称顺序,分别介绍伦敦、牛津、剑桥的斯坦因收集品,每个单位下,依次简要介绍收集品的历史、主要内容、相关出版物、阅览途径、联络方式。由于出自众手,所以各个单位的收藏情况详略不一,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有不少过去无法知道的信息藉由这本小册子提示给了读者。笔者现在更感兴趣的是和敦煌以及新疆考古有关的学术史材料,而不是古代文物和文献材料,因为后一方面对上引拙著的补充不多。以下对前一方面的收藏情况略加提示,以飨国内读者。

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收藏的主要是1885—1925年之间斯坦因的家信,还有1913—1915年在中国西北探险所绘制的地图。

英国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务收集品部(British Library: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除了我们熟知的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西域出土文献外,印度事务部原藏的有关斯坦因中亚探险报告的出版和相关经费补助的档案,一些考古发掘的照片也在其中。而斯坦因在约19世纪90年代到1938年之间在中国、中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约旦拍摄的约11000张照片、底片、幻灯片,则收藏在该部的印本·图片·照片部(Prints, Drawings and Photographs Section),这些图像材料涵盖了斯坦因整个一生,特别是记录了他的考古调查过程,是研究学术史最好的直观材料。

英国博物馆中央档案部(British Museum: Central Archives)收藏有关于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与英国博物馆几任馆长的通信,主要涉及收集品及其分配问题,还有就是英国外务省与博物馆馆长关于中国方面反对第四次探险的往来信件和相关文件,这后一方面的问题是西北探险史的重要学案,王冀青先生关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探险的系列研究论文中,使用过这些材料。英国博物馆钱币与徽章部(Department of Coins and Medals)藏有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所获四千枚以上的钱币,这些钱币在斯坦因的三部考古报告的附录中都有著录,最近汪海岚在她的博士论文《丝绸之路上的钱币:约公元800年以前中亚东部的印证》(*Money on the Silk Road: the Evidence from Eastern Central Asia to c. AD 800*,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2)中,对这些钱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编制了《斯坦因收集的中亚东部钱币目录》(*Catalogue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Coins from Eastern Central Asia),极富参考价值,希望她的这本厚重的论文能很快出版。此外,该馆东方古物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Antiquities)藏有丝路南道和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壁画、雕塑、丝织品、木板画等考古艺术品;西亚古物部(Department of Western Asiatic Antiquities)藏有斯坦因在印度河上游和伊朗古遗址中发掘的材料。

在伦敦,除了英国图书馆和英国博物馆这两个集中收藏地外,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藏有一些斯坦因获得的荣誉证书和一箱用于考古报告的照片。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有数百封与斯坦因有关的通信,还有斯坦因绘制或印刷的地图。维多利亚博物馆远东部(Victoria & Albert Museum: Far Eastern Department)藏有 700 多件斯坦因中亚、敦煌所获丝织品。

牛津大学的鲍德里图书馆特藏与西方写本部(Bodleian Library: 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Western Manuscripts)可以说是收藏斯坦因档案最丰富的地方,这里有大约 450 箱档案,其中包括斯坦因给友人艾兰(P. S. Allen)、安德鲁斯(F. Andrews)以及其他学界友人写的大量的信件、家信、约 100 本 1899—1943 年间的考察笔记、1899—1940 年间的私人日记、有关考察的文件、考察报告和游记的手稿、照片等等,这些材料是研究斯坦因考古探险的最重要史料。珍妮·米尔斯基(Jeannet Mirsky)的《斯坦因:考古与探险》(*Sir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7；中文本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2 年版)、安娜贝尔·霍克(Annabel Walker)《斯坦因：丝绸之路的先行者》(*Aurel Stein. Pioneer of the Silk Roa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两本斯坦因的传记，都得益于鲍德里图书馆的收藏。

牛津大学出版社档案室(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rchives)保存着有关斯坦因主要著作《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 1907)、《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 1921)、《亚洲腹地考古记》(*Innermost Asia*, 1928)的往来通信及相关材料。另外，牛津大学地理学院(University of Oxford: School of Geography)有一些斯坦因捐赠的地图和著作。

最后，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写本部(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中，也有一些斯坦因和学者的通信以及家信，唯数量不多。

作为一本工具书，《手册》还提供了几个很有用的附录：附录二是《英国学术院纪要》(*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第 29 卷(1944 年)发表的关于斯坦因的长篇讣告，实际是一篇传记和对他学术贡献的肯定。附录三是从霍克《斯坦因：丝绸之路的先行者》转载的斯坦因年表。附录四是关于斯坦因的论著目录，包括斯坦因自己的专著、论文、书评，别人对斯坦因书的书评，有关斯坦因探险的报道，《泰晤士报》有关斯坦因的报道，斯坦因所获得的勋章和荣誉称号，有关斯坦因的传记、生平、讣告。这些小目录对于我们研究斯坦因这个人是非常有用的参考。当然这些目录主要是西文的，而不包括中、日

文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论著。

《英国所藏斯坦因收集品手册》的出版，直接推动了斯坦因收集品的另一中心——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的整理工作。由于匈牙利和英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作为三年研究项目的结果，2002 年就出版了艾娃 · 阿波尔（éva Apor）与汪海岚主编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目录》（*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s of Sir Aurel Stein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ed. by Éva Apor and Helen Wang, Oriental Studies 11, Budapest 2002, 350pp.，以下简称《目录》）。由于出生于匈牙利，斯坦因和匈牙利科学院的学者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他之所以到敦煌考察，就是因为受到匈牙利探险家洛克济（Lajos Loczy）的启发，因此，斯坦因很早就开始把一些书信和自己所藏的书籍捐赠给匈牙利科学院。1921 年，他把一些家信捐出。1922 年又把自己的部分藏书赠送给该科学院，因为二战的原因，这些书直到 1957 年才送达匈牙利。这些书主要是中亚、印度、伊朗学方面的，与他自己的考察和研究直接相关，没有太多的稀奇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书信、照片、手稿、校样、文件、笔记、日记、考察账单、著作分送目录、证书等等，与英国各地所藏的资料相似，但不相同，其中 4500 多幅照片和 1400 多封书信应当是最具学术史价值的材料。

更为重要的是书信、照片、手稿、校样、文件、笔记、日记、考察账单、著作分送目录、证书等等。

《目录》的主体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与斯坦因爵士有关的通信、手稿、文件和书评目录》，其实包括地图、笔记、日记、校样、抽印本。其中与 300 个左右的人和机构的通信是按人名的字母顺序排列的，便于查找，而且

这些书信是学术界尚未利用的重要学术史材料。

对于通信者的身份做了括注，每封往来信件都提示了地点和时间，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书信是学术界尚未利用的重要学术史材料，和英国收藏的许多斯坦因本人的信不同，这里大多数是别人给斯坦因的信，笔者非常感兴趣的是沙畹(E. Chavannes)、夏德(F. Hirth)、伯希和(P. Pelliot)、矢吹庆辉(Keiki Yabuki)等一些汉学家的信件，还有斯文赫定(Sven Hedin)、勒柯克(A. von Le Coq)、大谷光瑞(Kozui Otani)等一些西域探险家的信，中国人的信件很少，但第 44 页提到的张元济 1910 年 11 月 4 日给斯坦因的信，尤其引人注目。检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 年)，1910 年 10 月 30 日，张元济自巴黎到伦敦，在伦敦期间曾与斯坦因晤面，并参观英国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所获敦煌秘籍，并商影印其中的四部书，后未果(90 页)。张元济致汪康年信中也谈到此事，见《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 年，53 页)，唯未提到晤斯坦因事，匈牙利所藏张元济书显然与其参观敦煌写本及影印秘籍事有关。相关的手稿有关于古代和田著作的笔记一册(110 页)、1930 年 11 月至 1931 年 1 月的日记复写本(115 页)、1908 年 6 月 27 日所写有纪年的汉文写本目录(同上)、一批 1913—1915 年第三次中亚探险中打过交道的中国官员的名片(116—117 页，可惜没有排印中文而仅给出了拼音)。另外，斯坦因自己保存的论文或报道的抽印本，也有参考价值。

第二部分是《斯坦因爵士拍摄或收集的照片目录》，这是记录斯坦因生平和 20 世纪初叶中亚和中东考古的重要依据，正如编者所言，与英国收藏的斯坦因照片对

比，这里的照片最富价值之处是保存了大量1900—1901年第一次中亚探险所摄的照片，这在英国图书馆的照片收藏中几乎是空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所存也只不过是从《古代和田》上翻印下来的。《目录》对每帧照片都尽可能给出名称、拍摄的地点和年代，如果已经发表，则注明出处。我们知道，不论在《沙埋和田废址记》(*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London 1903)还是《古代和田》(Oxford, 1907)中，都不可能发表斯坦因拍摄的考古过程以及所获文物、文献资料的全部照片，而这些照片是我们研究古代文物、文献和历史时最有帮助的材料。比如本书中著录的大量丹丹乌里克遗址及其出土物的照片，许多都没有发表过，相信一定有助于我们弄清这个古代于阗国东北边境城镇——杰谢镇的一些遗留的问题。如果我们看看本书所附的有限的几张图版，就不难明了这批照片的价值，如328页一张敦煌写本的照片，有些还没有展开，对于研究敦煌藏经洞的原貌，颇有启发。希望将来这些照片能够像敦煌写本那样，通过IDP网站，供世界各国学者使用。

这里的照片最富价值之处是保存了大量1900—1901年第一次中亚探险所摄的照片，这在英国图书馆的照片收藏中几乎是空白。

这两本书编印都很精心细致，虽偶有小的错误，如《手册》第5页Hoernle书名“Manuscripts”应作“Manuscript Remains”；《目录》110页第9行“1986”应作“1896”，但无伤大雅。

读过这两本书以后，笔者不由地想到，有关斯坦因的档案，除了英国和匈牙利之外，恐怕就属中国最多了，可惜的是，我们还没有编制出有关的目录或者简单的指南手册来。可喜的是，部分有关斯坦因在西北考古探险的

档案原文已经公布。199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发表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英人斯坦因来华盗取新甘等地区文物经过的有关文电》,计16件,主要是1930年5月至1931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央研究院、新疆省政府关于阻止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并扣留所得文物的电文和相关文件(679—710页)。2001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编《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一书,发表了有关斯坦因的档案115件,自1899年5月3日斯坦因第一次申请入境,到1931年5月16日金树仁勒令前来做第四次探险的斯坦因出境,内容更为丰富,其中尤其以第三、第四次中亚考察的记事最多,可以和英国、匈牙利收藏的斯坦因有关信件和公私文书相互发明,应当等量齐观。但这本书是选刊,并非该馆所藏相关档案的全部,参看孙波辛《斯坦因第四次来新之经过及所获古物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中文档案为我们研究斯坦因的中亚探险,研究敦煌文献以及新疆文物的大量流失,将会提供有别于斯坦因本人撰述的另一视角,因此,我们热切期望中国有关单位尽早将有关的档案编目、整理,也希望有学者在这些档案整理出版以前,就能将其充分利用起来,澄清西域探险史、敦煌学史上许多至今使人迷茫的问题。

中文档案为我们研究斯坦因的中亚探险,研究敦煌文献以及新疆文物的大量流失,将会提供有别于斯坦因本人撰述的另一视角。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中华书局,2004年1月)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评介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出版，是敦煌学界期盼已久的事情。上海是清末民初以来学者、收藏家、书画家荟萃之地，通过各种途径从敦煌流散出来的写经文书，有不少辗转到了上海私人手中，有些陆续进入上海图书馆。因为上海的私人藏家眼界较高，而上图的专家更具慧眼，所以，我们可以推测，除了北京图书馆外，上图应当是藏有敦煌写本精品并有一定数量的收集的馆藏之一。1986 年，吴织、胡群耘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在《敦煌研究》当年第 2 至 3 期连载，使人略窥上图藏卷的名目。1990 年 2 月，曾经阅览过全部上图藏卷的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施萍亭女史，在日本东洋文库的讲演报告中，也谈到上图藏卷的情况，特别是来源和真伪问题（讲演稿由池田温译载《东洋学报》第 72 卷第 1·2 号，1990 年 12 月）。直到 1999 年 6 月，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的《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大型图录四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录馆藏全部敦煌写本 187 号，不仅为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献上一份厚礼，而且也大饱了当今敦煌学人的眼福。

上图藏卷主要是从一些私人藏家手中陆续得到的，其中有的是曾经任官甘肃的人士带到内地的，如 1911 年后任甘凉（今甘肃张掖）道尹许承尧及其子许家栻、1920

年暂护甘肃省省长陈訚、1910年任甘肃布政使何彦升(其子鬯威即押运敦煌卷子入京者)等家藏的敦煌经卷,这些官员近水楼台,所以很早就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敦煌写卷,其中不乏精品(有关这些人物的情况,参看拙文《甘藏敦煌文献知多少?》,《档案》2000年第3期)。也有著名收藏家历年收购的写卷,如叶景葵(揆初)、袁克文(寒云)、罗振玉、吴士鉴、龚心钊、吴曼公等人的收藏,还有后来买到的从甘肃流出的张维旧藏卷。这些人物都是很有鉴赏力的收藏家,他们所聚的材料,也有不少是相当好的资料。

定名工作是衡量这种大型图录的学术价值的最主要依据。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较之先前发表的《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简称《目录》),在定名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定名工作是衡量这种大型图录的学术价值的最主要依据。试看《目录》中的许多标作"写经残卷"者,大多数已经指实为何经何品,这在还没有《大正藏》光盘可供检索的时代,确实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还有像第066号背面,《目录》原题"不知名佛典",本书考订为昙旷《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颇见功力。

由郭子建、刘景云、王翠兰、夏颖四位合撰的本书《叙录》,对从图版上不能得知其详的写本尺寸、颜色等外观,定名依据、相关文献等情况的著录,为读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只可惜《目录》中已经抄录的长段今人题跋,《叙录》按统一体例没有照录,固然有原跋的图版在,但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讲,看录文比较方便,而且这些跋文和《叙录》著录的印鉴等是同组的东西,不应分开。

翻阅图版,有些写本确是精品。如第021号《妙法莲华经》卷六,有高昌义和五年(618)题记。孟宪实、姚

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1996年),曾推测题记中的“夫人和氏伯姬”,很可能是当时取代麹氏而执掌高昌王权的政变首脑之妻。原卷各品题下,有朱书“和夫人经”,是十分少见的做法,也说明这位和夫人不同一般。而且楷体字较一般写经浓重端庄,应当是高昌王国后期精心抄写的佛经之一,值得珍重。

第032号《妙法莲华经》卷一,有上元元年(674)写经题记,是唐朝宫廷写经,属于敦煌写经中的上品。

第028号《廿二问》,此即昙旷《大乘二十二问本》,《叙录》做“五代写”,似有未谛。背面《欢喜国王缘》,则当是五代所写。此件原为罗振玉旧藏,曾印入《敦煌零拾》,陈寅恪先生撰有《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考出故事所本(文载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论丛》第1卷第2号,1927年;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71页),其所藏《敦煌零拾》上的批语,也经笔者整理为《〈敦煌零拾〉札记》发表(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2001年,11页)。后原卷归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启功先生将此卷(自“谨案”至“国主乍闻心痛切”)与P.3375缀合,作为《敦煌变文集》的底本,改题为《欢喜国王缘》。同时,启先生还把同一文物保管委员会收藏的另一件《欢喜国王缘》(即本书第016号),取做《变文集》的参校本。现这两件写本都已转入上海图书馆,而印入本书。经过学者们数十年的搜索,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欢喜国王缘》,还是这三件写本构成的两个文本(见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1089—1101页),可

见上图本的珍贵。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第 017 号《唐人民间文书集册》是前人没有利用的新史料,包括《家书》、《葬经》、《僧正致都督状》、《卜筮法》、《分家契》(书仪)、《丁丑年赤心乡百姓郭安定雇驴契》、《开蒙要训》,可以补入相应的录文集中。

此外,第 034 号的粟特文、回鹘文写经,也是极其珍贵的。

从不同的学科研究的角度看,有价值的文书还有不少。如第 009 号佚名《律杂抄》一卷,较《大正藏》卷八五所据 P.2064 多三倍强。同号最后一种,所抄是未比定律书,对于佛教戒律的研究,可能更有意义。

第 019 号《天宝八载公文》虽然字数不多,但却是原本属于唐朝西州的一组文书中的一件。《叙录》有录文,但人名有的没有录出。按,府罗及和〔仓曹〕参军庭兰,又见于斯坦因在阿斯塔那墓地所获吐鲁番文书、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藏吐鲁番文书等,这组文书据陈国灿先生考证,应当都是属于《唐天宝八载西州仓曹检勘诸仓仓粮案卷》,其中普林斯顿藏卷之一的纪年是"天宝八载三月廿四日",亦有"府罗及(陈录做"通")"和"仓曹参军庭兰"署名(见所撰《美国普林斯顿所藏几件吐鲁番出土文书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5 辑,1997 年,113—114 页)。因此,上图的这件所谓"公文",应当是同组案卷中的一件,应当定名为"唐天宝八载西州仓曹检勘诸仓仓粮案卷"。

另外,018《书仪镜·凶》下、030V《新集文词九经抄》

一卷、114 裱纸上的海晏七言诗一首、141《玄藏法师十二月礼佛除罪文》和《秀禅师劝人药病偈》,以及 078《太玄真一本际经》卷二和 166《太玄真一本际经》卷十(存《称扬持诫品》第三至卷尾),都富有研究旨趣。

近年陆续刊布的敦煌小收集品,由于来历不一,所以难免其中会混入其他地方传存的古写经,因为敦煌卷子有名,所以不论是旧藏家,还是图书馆,都会把其他一些写本当作是敦煌写本。更有甚者,就是今人伪造的写卷,有时也会混迹其中,因此,辨别敦煌还是非敦煌写本,辨别真伪,是目前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辨别敦煌还是非敦煌写本,辨别真伪,是目前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施萍亭《敦煌遗书编目杂记二则·康有为与敦煌写经》一文,指出上图原编号 812442 金银字《妙法莲华经》卷六,很可能是中原传世写经,而非敦煌卷子(《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 卷,1995 年,321—323 页)。此卷上图《目录》作为敦煌写经处理,编作 085 号。大概接受施萍亭先生的看法,在本书中将此卷编作附三,做非敦煌经卷处理。

另外,第 029 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六四和第 063 号《妙法莲华经》,都是瓷青纸,用金粉写,似非敦煌写经。后者卷首有"弟子彰义军节度使钱宏信敬舍",应是传世写经,绝非敦煌写经。

第 152 号《中阿鋡经》卷第五,卷尾钤"法隆寺一切经",施萍亭(《东洋学报》第 72 卷第 1·2 号,93 页)和《叙录》都疑为日本古写经,可作定论。其印与日本奈良法隆寺藏写本所钤"法隆寺一切经"方型墨印完全相同(见《法隆寺とシルクロード佛教文化》,法隆寺,1989 年,75 页)。

上图有些卷子上有“木斋审定”、“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等李盛铎的藏书印,因为日本敦煌学家藤枝晃先生指称李氏造伪,所以值得注意。我过去在考察李氏藏卷的流散过程时,曾经对证出,上图这些带有李氏藏印的卷子,其名确实不见于李氏自编的《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稿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录文见荣新江《鸣沙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 年,115—143 页),似乎不是李家所藏得自甘肃运京的那批。而其中一些写本可以和《李木斋旧藏敦煌名迹目录》第二部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 年,散录六)中著录的一些写本相勘同(参看拙文《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鸣沙集》,109 页)。但是,拿《李木斋旧藏敦煌名迹目录》提供的信息和上图《目录》提供的材料相对照,有许多卷子无法对应。现在,随着本书的出版,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名迹目录》第二部分编作《总目索引》散录六的第 0601—0644 号,本书按照馆藏号排序,同时另编上图新序号于馆藏号前,这样的序列往往可以使我们看出入藏之前旧藏品分组情况,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对证出:散录的 0601—0631 即本书上图 106—136 号,散录 0638—0643 即上图 137—142 号,中间上图所缺的散录 0632—0637 六个号,《名迹目录》已经名言“此六卷为日本所藏唐人写经”,所以早已被剔除。散录最后一个号 0644《索铁子状》,现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馆,此点沙知先生早已指出,见所撰《跋上博藏敦煌平康乡百姓索铁子牒》,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 年,234—238 页。《名迹目录》所谓“梵文经两卷”,上图《目

录》原未著录，在本书编辑过程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府宪展先生曾寄给笔者复印件，经与黄维忠君合作，考出实为藏文《般若心经》。

这一部分据说是得自李盛铎的写卷，有的上面确实有李氏的印记，但我们并不能够因此就指其为假货，不论有无李氏印记，我们首先应当从内容上检验卷子的真伪。试举一例：

第117号《瑜伽师地论随听手记》卷首朱笔题：

《瑜伽师地手记》卷第六，六月十七日起首说，沙门洪真随听镜。

以下卷中依次朱笔题记为：

《瑜伽论手记》卷第七，七月五日说讫。

《瑜伽论》卷第八手记。《瑜伽师地论》卷第八手记。

《瑜伽论》第九卷，九月十七日说竟，沙门洪真手记。

卷末墨笔题记：

《瑜伽论》卷第十。

接着有朱笔题记：

上元元年十月三日说竟，沙门洪真手记讫。

下钤有"木斋审定"朱文方印。背面有朱笔"沙门洪真"骑缝押，尾钤"德化李氏木斋合家供养经"朱文方印。

按，敦煌写本中多有《瑜伽师地论随听手记》，据上山大峻氏研究，都是归义军初期敦煌高僧法成讲经的记录本，当时跟随法成听讲的学生有谈迅、福慧、法镜、一真、洪真、明照、恒安等，其中谈迅与福慧、法镜、洪真的三套

记录基本上保存下来，讲经开始于大中九年(855)三月前后，每月大约讲一、二卷(见上山《敦煌佛教の研究》，法藏馆，1990 年，219—230、244—246 页)。按照上山氏的结论推算，大中九年六月十七日开始讲《瑜伽师地论》卷六，正好相符。本卷还提供了卷七和卷九讲毕的时间，日本大谷探险队所获《瑜伽师地论》卷第七末，也有题记："大中九年十月，沙弥一真书记。"这是一真的笔记，可惜这个卷子目前已不知所在，也没有图版可以对照，这里所据为罗振玉发表的《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1914 年，收入《雪堂丛刻》)，颇疑"十月"为"七月"的误书。从敦煌本《瑜伽师地论随听手记》的序列来看，此卷为大中九年沙门洪真听讲记录无疑。可疑的是最后的"上元元年"的题记，这个年代即使按《叙录》所标放在肃宗的上元元年(760)，也是无法和敦煌全部《瑜伽师地论随听手记》相符合的。因此，这个"上元元年"的题记，一定是伪作。而且，我怀疑作伪者意中的上元，很可能是高宗的上元元年(674)，因为敦煌卷子中，有一批高宗上元年间唐朝长安的宫廷写经，最为精美，如本书第 032 号《妙法莲华经》卷一，即上元元年(674)所写。这件《瑜伽师地论随听手记》的伪题下，有李盛铎印，但这并不能证明就是李氏本人所钤，因为李氏去世后，他的藏书印流落到书肆，很多造伪者把李氏的真假印鉴钤在普通的卷子上，以谋取高价(参看拙文《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鸣沙集》，103—146 页)。总之，这件写本提供给我们一个真卷子、伪题跋的最好例证。

上海图书馆所得据称原为李盛铎所藏的这组卷子，

从内容来看,其中确实有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如经疏、疑伪经、禅籍、道经等;但从题记看,有不少题记都值得怀疑。在真卷上加年代较早的伪题的做法,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造伪方式之一。

最后应当提到的是,第 058 号《大乘无量寿经》尾题"贞观五年冬唐文英写",《叙录》已指出系伪署。第 169 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五一,有"永徽六年(655)"题记,池田温先生疑为伪题(1989 年 10 月 21 日来信)。

(原载《历史文献》第 7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7 月)